

导 言

我想向讀者介紹的这个国家一直到不久以前为止一般都称它为波斯。它的面积约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平方公里，几乎有三个法国那么大，可是它只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万人口，还不到法国人口的半数。

这一个地区的居民过去总是把他们的国家称为“伊朗”，用暴力统治了二十年于1941年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的前任国王礼萨·汗^①在1935年把“伊朗”这个名字提升为官方的名称，他以为以这种让步或者以类似的形式对居民的民族感的让步，就可以使他们忘掉他们民族的和社会的利益。

波斯这一个名字在历史上导源于这样一桩事实，最早的一批统一整个伊朗高原的部落是从波斯，伊朗的法尔斯来的。他们以传教士的身份利用他们的神学理论侵入到全国各地，他们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个善神和一个恶神，按照波斯人的想像，沃摩茨和阿利曼是这两个神的化身，他们永远在斗争着，据说这斗争将以善获得胜利而告终。

对于善一定会获得最后胜利的信仰使得伊朗人不断地跟一切恶势力作斗争，不断地在民族的道路上前迈进。伊朗在它的五千多年的历史经常被外来民族所征服；希腊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都曾经蹂躏伊朗的城市和乡村，毁坏伊朗的文化地区，成百万地屠杀伊朗的居民，但是这些外

^① 礼萨·汗(Riza Khan)，现国王之父，1925年改名礼萨·汗·巴列维(Riza Khan Pahlevi)。——译者

来的侵略者永远不能够摧毁伊朗人民的精神，他们最后总是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伊朗的文化抵御住了一切侵略者。

不管古代的和中世纪的侵略者，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和泰默让怎样的残暴，但是他们之中那一个都不如近代的侵略者帝国主义份子那样阴险暴虐，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今天正在压迫伊朗，伊朗人现在必须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分子的野蛮和灭绝人性的剥削。斗争的结局如何，这是无须乎争论的；但是说明一下斗争的条件还是有价值的，伊朗人民的斗争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伟大的争取自由斗争的一部份，这斗争将决定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为了给自己的同胞介绍某一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情况而去参观那个国家的外国人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西方的报纸和电讯社驻德黑兰的记者推广了一种最简便的方法。他们住在“国际饭店”，这是伊朗首都许多最华丽的旅馆之一，在这里进出的都是些最有钱的阔人、投机商、交易所的经纪人、将军、部落的酋长、王公的女公子、议员、部长等人。这些社会的“上等人”构成了这些记者们的社交中心。在这些外国记者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懂得这个国家的语言，他们跟这些所谓社会的“上等人”在一起抽抽烟喝喝酒渡过许多夜晚。记者中那些好呆在家里的人跟“伊朗人民”根本没有接触。这些记者和那些记者都是一模一样，到十点才起身准备去采访消息。有些人连忙打电话给他们的酒肉朋友打听“消息”，另外一些人去拜访一下宣传处的处长，不论是前者或者是后者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都到记者招待会去，这种招待会绝大部分是由一位部长以政府代表的身份来主持的。记者们从这位政府代表的无从查考的言论中寻找出他们觉得似乎有用的东西，然后加油

加醬把它写成一件聳人听闻的大事情，急忙赶到电报局去，把这些所谓“消息”或者“报导”用电报拍給他們的报館。这样一来他們就算完成自己的任务，只有那些最活躍的記者才認為有必要每月向一位正想为自己吹嘘一番的政客請求作一次会談。这种記者会談往往也是非常愚蠢的，証明那些政客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和問題一無所知，因此这种記者会談只是使看到这些报导的伊朗人各按各的看法引起痛苦的一笑或者滿意的一笑而已。

这是絲毫不足为奇的，用这样的方法使欧洲的讀者所得到的只是一幅关于伊朗的各种事件和現象的歪曲的圖画。1949年2月4日国王被刺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在事态演变的过程中經常有几十个西方的記者駐留在德黑兰，可是世界輿論界从他們那里听不到一点点有关这件使伊朗成为世界兴趣中心的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的幕后消息。当一个小国史無前例地对一个强国即英国贏得了光輝的胜利的时候，当一个多世紀以来在殖民地統治者的压迫下历尽千辛万苦的人民作出了英勇的壮举把自己从国内外的压迫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証明帝国主义列强是虛弱無力的时候，对于西欧的一般讀者來說这件占有首要地位的世界政治大事的根源还是一个秘密，虽然有几十个西方的記者打了几千公尺长的电报。这些記者的活动只限于在首都，他們的消息全靠那些社会“上等人”的言論，不懂得伊朗的語言使他們固执己見，他們对委托他們的人有义务把每一行报导都变成对苏联的攻击，因此他們所起的作用只是混淆世界輿論而已。

在我耽在欧洲的較长的一个时期中我曾經同政治家、作家、科学家、工人以及許多具有各种不同政治見解的工会

干部談到我們祖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不管我談話的對方對這問題抱着多大的興趣或者怀着很善良的想法，但是我可以確認，他們對於真實的情況和事情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一無所知的。我可以那麼說，一個普通的伊朗知識分子對荷蘭的了解要比一個荷蘭的政治家對伊朗的了解深得多。

不管他們的報導多麼片面而且一定是違背他們的意志的，這些外國記者到底還是達到了這樣一個目的：假使說不久以前一般的歐洲人一提起伊朗就聯想到波斯戰爭和波斯地毯，那麼他們今天只要一提起伊朗就會聯想到“石油”和“摩薩台”。

可是對摩薩台在伊朗人民爭取他們的獨立自主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估價十分明顯地表示出跟我談話的歐洲朋友對伊朗缺乏了解。他們之中有些人把摩薩台看作人民鬥爭的英勇的先進戰士。另外一些人把他看作美國人收買的代理人。一位演說家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聲稱，某些美國石油巨頭委派摩薩台充當反對英國石油資本家的角色，而摩薩台扮演得非常出色。摩薩台到底是人民的戰士還是美國的代理人呢？如果我們使抱前一種看法的人明了摩薩台、他的政府和隸屬於他的德黑蘭警察局長曾積極地參與了1951年6月15日無數愛國志士因此而犧牲的大屠殺，那麼他們會跟抱後一種看法的人同樣感到驚奇，因為後一種人不能夠理解這一個事實，為什麼就是這位首相毫不含糊地拒絕了杜魯門和丘吉爾倡議共同商討解決伊朗石油問題的條件的嘗試。

摩薩台的合法政府被警察和軍隊推翻之後，甚至美國的報紙也不隱瞞美國控制着這兩個部門，而且厚顏無耻地

公开承認美国的权貴們以他們的装甲車和机关槍唆使人家把伊朗的首相監禁起来。

摩薩台实际上到底起些什么作用，什么原因逼使他作出这样的血腥暴行，为什么他必然要失敗？

这是本書有責任解答的問題。这些問題不能跟伊朗的社会情况、伊朗民族爭取独立自主和社会正义的斗争、跟伊朗民族保衛和平事業的斗争分割开来。

因此我想尽我能力所及在这桩工作的范围之內描繪出我的祖国伊朗的真实概况。我相信这样做同时也有利于偉大的世界和平事業，因为認識被压迫民族的自由斗争的条件是使自由斗争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前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斗争的胜利却又是使世界和平得到最后巩固的前題。

第一章 矛盾

中世紀時候世界交通發生了變化使伊朗不再成為貿易的要道，使伊朗停滯在封建狀況中。帝國主義因為追逐市場才把這落后的國家重新拉入世界經濟的範圍之內，現在它成了貪得無厭的剝削欲望的犧牲品。其結果在伊朗跟在一切相似的被帝國主義所“開發”的國家里一樣造成了社會的和經濟的畸形發展；資本主義階層從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中產生出來了，伊朗的資本主義階層在帝國主義剝削的枷鎖中不能夠集中一切力量消滅封建制度，只能夠作為買辦資本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階級結成聯盟，根據這一聯盟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封建關係只按照資本主義階層的利益要求稍稍作了一些改善。伊朗生產力的殖民地性質的畸形發展有利於暴發戶和投機分子的興起。這些暴發戶和投機份子大多數是軍人，他們以“將軍”的身份掠奪了這一個或者那一個游牧部落而變成了巨富，也有的是投機商人，一筆“生意”使他們頓成百萬富翁；或者是封建地主和酋長的兒子，他們在做“大學生”的時候敗光了他們的上輩的土地，他們企圖作為“政治家”、工廠資本家和投機商人在伊朗的首都或者在別的首都增加他們上輩遺留下來的財富。他們逐漸地排擠封建大地主，封建大地主雖然沒有民族意識，但是他們還是始終愛他們的土地，他們雖然嚴酷地剝削他們的或多或少帶一點農奴性質的農民，但是他們家長式地保衛着他們的農民，使他們免于淪亡。新地主推卸掉他們所有的責任，但是任何權利都不放棄，他們把他們

新攫取来的庄园讓管理人來經營，自己却作為統治階級的最圓滑的代表一躍而為最高的國家官吏。他們拼命搜括，以便將來離開政治舞台的時候可以在國外享受他們掠奪來的財富。這說明了老是更迭政府，老是在議會里和國家機構里出現新人物的原因。

像這樣的人我可以舉出几百個例子，他們作為某一個統治集團的代理人被捧上政治舞台的時候，他們是一貧如洗的，可是今天在歐洲國家的最高等的療養地方却是跟西方世界的最大金融巨頭爭尚奢侈豪華。這兒所舉的只是許多例子中的幾個例子罷了！德黑蘭的議員馬基在戰前是伊朗的空軍上士，在那時候他的上司因為他的盜竊行為而不得不屢次痛打他。他毫無素養，只是一個庸才，戰後他忽然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自由戰士”，他寫了幾篇平庸無奇的文章攻擊已經死掉的國王的暴力統治，因為這時那樣寫法已經毫無危險了。他發表了一本關於一個被禮薩·汗在監獄里殺害的詩人的一生和著作。在加瓦·埃斯·薩丹乃政府時代，他是一個生活不甚富裕的小經紀人，忽然他成了德黑蘭西邊的一個城市阿拉克的議員，雖然在這個城里誰都不認識他，當地的居民誰都既不會看見過他也不曾聽到過他。剛一踏進議會他就另投一個主子，跟反對派摩薩台集團勾結在一起。摩薩台執政的時候，讓馬基做國會石油問題委員會的委員，後來又讓他做委員會的秘書長。他就以石油委員會秘書長的資格到阿巴丹去，自稱為“祖國的士兵”，沒收了英國人的石油工業方面的財產。摩薩台與國王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又重新掉換了他的東家，並且因此而挽救了他的無數的財產、房屋、汽車以及此後也許被捧上首相的寶座的机会。他的飛黃騰達的秘訣不僅是在於他的厚顏無

耻、卑鄙陰險，而是主要在于他終归只为一个主人——統治階級——服务，这統治階級往往通过这个代理人或者那个代理人来跟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那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結在一起，以便使他們能够反对人民而保护自己的剝削利益。

或者我們以阿馬第將軍为例子吧！他在礼薩·汗执政的时候还是一个穷軍官，現在据說只在德黑兰他就几百所房子，此外他也是魯来斯坦的最富有的大地主。如果人們听一听一个首飾商告訴我的話，那么他們就会明白阿馬第是怎样發財的。这个首飾商千准万确地說，他曾經在这位將軍先生的家里买了一批金首飾、金耳环和金項鍊，許多首飾都沾滿了人的血肉。

这位阿馬第將軍自从那次战争以来多次担任軍政大臣和伊朗的參議院議員，我現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許他又在担任国家的高級职位。如果人們知道他在对魯倫族进行的战争中获得了他的“战争荣誉”，那么就对这位“將軍”的財富的来源也就毋庸置疑了，这次战争的殘酷程度超过了每一个正直的人的想像力。他的暴行通过曾經訪問过魯倫族的美国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的报告才为人所知曉。英国人通过他們的代理人和間諜对这些暴行也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他們置若罔聞；美国人也只是把黑幕揭开一点兒，目的在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英国人在近东的地位。

投机取巧的暴發階層破坏了农村中的封建組織，其灾难性的后果对农民尤为深远，因此而使大批农民流亡到城市中来，因此也产生了根据 1928 年頒布的所謂“登記法則”而实行統計調查的后果。每一个土地占有者都必須在統計調查的时候把自己的不动产登記，因此在这次統計調查中成千上万的暴發戶获得了封建土地，还有成千上万的騙子

手充分利用了农村的恐怖状态和农民的愚昧無知分文不付地夺取了大片土地。他們在法庭面前以假文件或者以收买来的証人来証明这块土地或者那块土地許多年来就是他們的上輩的财产。通过这种方法一向是公产的大片森林和田地变成了某一个流氓的私产。

礼薩·汗本人就是这些匪徒的好教师。他从一位封建地主那里“購買”了一座庄园。他把这庄园登記了。地政局的官吏战战兢兢地問这块土地的边界在那里，国王的善于諂媚的代理人回答道：“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这样一来又是一公里多的土地归为国王所有。1941年他几乎把馬詹德兰全省都作为他自己的产业，他的财产按照美国的估計达两千万美元之巨。当这位独裁者由于人民的憤怒而不得不逃到英国人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一切卖給他土地的契約都取消了。跟那些被独裁者从封建地主手里夺去的土地一起，一些被国王非法强占去的公共的森林、田地和草原也落到了封建地主的手里；封建地主有真憑实据，他們証明1941年以后属于国王的土地先前是属于他們的。然而农民的处境并没有絲毫改变；封建地主或者地主的管家的皮鞭代替了国王雇用的管理人員的皮鞭。公地的剝夺曾使农民陷于困境，如今这种困境依然存在。

西方殖民主义者宣称，投机和欺詐、不惜采取謀杀手段的卑劣行为，总之一切卑鄙無耻都是全体伊朗人民的本性，这样做只是他們的左道旁門的尝试而已。这些卑鄙無耻的行徑表現出了在殖民势力人为地培植起来的紊乱的封建秩序中混杂紛乱的勾心斗角，在这场勾心斗角的斗争中伊朗人民只是受苦受难的配角而已。

不，伊朗人民不只是受苦受难的配角，而且也是积极的

反对者。伊朗的劳动群众、工人和农民、手工業者和店員、那些为一塊面包而做几小时苦工的人們在近几年来向全世界証明他們的以前似乎是永無限止的忍耐性現在快完了。他們以他們的慷慨激昂的英雄事迹，以他們的勇敢、不惜牺牲和坚定不移的精神跟那些卑鄙的例子形成一个对比。下面就是这些事迹的一个例子，这例子曾轟动一时，并証明了伊朗工人和在伊朗的先鋒队人民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进步的伊朗知識分子的团结一致，証明了他們的創造才能和行动力量：

1950年12月，在一次勇敢的奇襲中十个政治犯（其中絕大部分是人民党中央委員会的委員）被人从德黑兰的監獄中解放出来。監獄的房子四周都是很高的瞭望塔，塔上装备着的探照灯并有許多持机关槍的士兵在站崗，日夜都有騎警巡邏。关于这个越獄事件的經過，政府的有关当局只知道下面这样一些事实：在12月里有一天天气很冷，傍晚时候有一輛軍用卡車开到監獄的大門口。这一天是星期五，星期五在伊朗就像星期天一样，所以獄監长休假。一个值日的軍官替代他的职务，这位軍官是一个年青而又有能力的人。这十个犯人所在的政治犯監牢这一天也由一个青年軍官来管轄。后来根据报纸記載說，一个面貌端正手里拿着皮鞭的上校走下卡車，他要求跟值班的軍官講話。上校把一項書面的命令交給值日的軍官，按照这命令，載明在文件上的犯人必須毫不遲延地交付給他。上校坚持尽快执行命令，因为这些有問題的犯人是最高危險的分子，这桩事情必須尽量秘密地进行。他說因为这些犯人是很危險的，所以犯人應該在一处秘密的地方交付。值日軍官讓人把警察局长的公文的詳細內容記在公文簿上，然后把公文拿去，跟上校一

起走到政治犯監獄去。卡車跟着兩個軍官一塊兒進去。根據一個警察的說法，車子里有十個士兵。幾分鐘之後被捕的人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一個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的伊朗上尉軍官走出政治犯監牢走上了卡車。於是卡車開到監獄的大門口，在那兒上校和兩個值日軍官都上了車。軍用卡車往主要公路駛去，向左轉彎，車子就不見了。全案只延續了十分鐘，一直到第二天才為人覺察，因為這兩個值日軍官帶走了全部鑰匙，而且還割斷了電話綫。一切參與這樁案子的人都無從找尋起。

反對派利用這次奇襲對當時的首相拉茲馬拉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這位首相以下面這樣一樁事情來駁斥反對派對他的失職的非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法國的柯尼希將軍居然能夠逃出希特勒的堡壘，儘管希特勒那時不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政府的總理，而是全歐洲都在他的軍刀之下的統治者。國王對這樁成功的案件最感到不安；他加強了他的近衛軍，夜里在他的臥室前面必須實行戒嚴，他確實相信，那些用卡車把十個犯人從監獄里救出來的人民黨的黨員也可能忽然想起把他從他的宮里綁去。

這件事情在這一點上特別有趣，積極參加組織這次越獄的人，或者至少是與聞者起碼該有三十人；卡車上十個所謂“士兵”或者十個真的伊朗軍隊的士兵，十個犯人，這些犯人毫無疑問事先早就知道了，因為否則他們一定會抗拒解到別處去，這樣一來這次拐騙就不會這樣順利了，那為首的上校或者說是所謂“上校”，兩個值日軍官，六個或者數目更多一些人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以及隱藏這些被救者的愛國人士。因此至少有三十人預先知道這個計劃以及這個計劃的執行，可是一直到現在為止參與者之中沒有一個人

曾經泄露过一个字，然而这件事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發生的，在那兒在統治者的势力范围之內任何事情都不能保守秘密，在那兒甚至在秘密內閣會議上做出的決議几小时之后就泄漏出去了。

另外一件伊朗統治階級所干的拐騙案子可以作为一个对比。1953年3月今天的薩希迪將軍准备發動一次政变。他相信德黑兰的警察局长阿富夏吐斯一定会协助他。这一个陰謀被人民黨發覺了，也許是在最后一分鐘这位警察局长决定先撈一笔錢，然后再从这桩案件中脫身出来。他通过这批陰謀叛亂的匪幫中的一員要求一笔款子，他就不出来干涉，否則他就命令把所有参加这次叛亂的人都逮捕起来。他打算錯了；他被人綁出德黑兰——讀者們請想想，他是一个几乎到处都布滿警察的国家的警察局长啊！——后来他被人發現时早已身死气絕了。警察局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的局长被藏在那所屋子里，是誰把他騙到那里去的，他是在誰的汽車里被綁出城的，是誰把他謀杀的，他是怎样被掩埋起来的以及这整个的事件是誰在操縱的。这桩案子的同謀者是一个將軍、一个議員、一个投机商人以及其他的匪徒，这些人并未躲藏起来。

不，罪惡、賄賂、沒有原則性和殘忍这些决不是伊朗人民的本性，这些勾当是統治階級及其代表們的特权。所以在伊朗如果有人問起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政客的品质时，往往会得到这样的答复：“噢，是一个老奸巨滑的窃賊！”像这样的答复是很少的：“据說他不是窃賊。”整个的伊朗国家机器是一个投机、窃盜、不負責任以及懦弱無能的机构；这种說法听起来也許有些誇張，可是这話是这个国家机器的官方代表說的。如今侨居在美国的前警察局长摩薩也在不久以前

坦率地在記者面前解釋道，在反对人民党的斗争中必然不能取得成績，因为警察局里的成員有百分之八十是窃盜和貪污分子。从此以后在伊朗的革命团体中，在进步的报纸上，都把伊朗的保安机关称作“百分之八十”。在这期間已經死去的国王在首相陪同之下訪問伊朗宪兵部队的时候所說的話也是刻划得很深刻的。据說他乘此机会当着保安部队最高司令官的面对他的首相諷刺地說：“小心你的口袋，首相大臣，我們現在在宪兵司令部里啊！”号称“民族复兴”的薩希迪政府中伊朗財政大臣解釋得比較更加真实；他确認：“很遺憾，除了警察局和宪兵司令部之外，財經官吏要算是我們国家中名声最坏的官吏了。”

在軍事法庭上审詢摩薩台^①博士和他的陸軍參謀长里亚希时特別清楚地显示出那个經常發生变化的階層的卑鄙無耻和怯懦，伊朗的統治階級总是从这一个階層中选擢他們的代理人。在这次审詢中政府当局建議把这两个被告判处死刑，他們控告摩薩台博士，說他从1953年8月16日国王任命他为首相的那一天起至1953年8月19日他的合法政府被薩希迪發動的政变推翻那一天为止，曾經背叛国家背叛王室。摩薩台在审詢中完全承認他的所作所为，而且在1953年9月17日，这也就是說这时他已經被捕近一个月了，在檢察官面前还以合法的首相自居。所有在这事件中被傳詢的人——將軍們和大臣們——都表明他們是战战兢兢的胆怯者。因此政府当局完全可以这样来描写摩薩台政府的成員：“一部分是懦弱無能的人和不可救藥的但又是很殘暴的人，另一部分人是危險分子和犯罪分子。”如果說这曾經执

^① 摩薩台在1953年政变时被捕，伊朗軍事法庭以謀叛罪判处他三年徒刑，已于1956年8月4日被釋放出獄。——譯者

政二年多的政府不管怎样依然是伊朗一百多年来最强硬和在道义最無可非議的政府之一，如果說这政府不管怎样总算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利益，那么應該說这一切几乎全靠摩薩台个人的不屈不撓的坚决意志，摩薩台初起的一些行动給他的政府建立了威望，使得他的部长們在后来沒有机会可以从疾馳着的火車中跳出来。摩薩台創議由人民来决定是否要解散国会一事的結果証明所有的伊朗人民都在他后面支持他。

摩薩台政府的政治分析留待后面的一章来进行。在这兒我們只想来考察一下在上面談到过的軍事法庭审判中記錄下来的两个統治階級代表的胆小性格。我們还是只限于談談七十四岁的司法大臣罗特飞和四十四岁的參謀长里亚希的起家吧，因为前者絕不是統治階級僕从中最下流的人物，后者根据我个人的了解他甚至是一个誠实、高尚也許还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好人呢！

年齡使他占了便宜。他是司法大臣閣下，高齡七十四岁！在各个国王下面为司法事業服务了五十五年，他最后——在他坐上大臣的宝座之前——任德黑兰最高法院院长。1937年他忠于老国王的命令，对于一个由大学生和教授組成的团体的成員总共判处了三百年以上的徒刑，因为他們中間有許多入曾經讀过某一些書籍，从而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感到自己作为任职已久的伊朗最高法院的总檢察官和院长有足够的力量来处理許多工人和农民的生生死問題。可是現在，在一桩有丢掉脑袋危險的案件中自己被审詢的时候，他却在年輕的审判軍官面前縮成一团，变成一个哭哭啼啼卑躬屈节而又使人厭惡的胆怯者。他哭哭啼啼地說道：

“起先摩薩台博士請我奴才到他那兒去，他要我奴才担任司法大臣。奴才本来想拒絕他，但是为了不得罪摩薩台博士，我就以下面的話来表示我的拒絕(我对他說)：“您还是先去旅行吧。請您回来后再吩咐我做什么！”我感到他对我不高兴。他回来之后又談到这件事情。我不回答什么，直到他召我去，把职务委托給我。我建議他找另外一个人，这时他开始哭了。我被他感动了，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議。同时我提請他注意，我不是搞政治的人，我只管司法部。我想以此使他了解，政治方面的事情我不跟他合作，因为这些事情对于祖国是非常危险的。我跟这一切都毫無关系。”

我把大臣先生的講話打断一下，讀者想必不会見怪吧。大臣先生否認他的政治活动，从两方面来看他都是虛伪的；第一，执行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就有政治作用，第二，在伊朗所謂“政治”也就是受統治階級委托的一帮新的統治階級的代理人反对旧的执掌政府大权的代理人的陰謀，因为这批旧的代理人不再能够符合委托他們的人的希望。統治階級不仅通过这种“改組”阻止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且还阻止产生真正的反对派，以便在假民主的掩盖之下毫無顧忌地繼續劫掠人民。这位“不問政治”的大臣先生对于“政治”的艺术却有着丰富的、即使不一定是好的經驗：

1941年礼薩国王垮台之后，瀰漫着这样一种公开的意見，要求审查一下許多官員在礼薩国王专政的二十年中积聚起来的财产的来源。議會最后决定了一項法令，并在这位后来当司法大臣的罗特飞先生的領導之下組織了一个审查委员会。按照法令，这个委员会可以审阅有关全部官員的一切案件，还可以审查他們的财产情况。审查财产的法令第三章規定，不誠实的和受賄賂的官員都必須撤职。对議會

的决心感到惊奇的人應該知道，包括年輕的國王在內的統治階級目的在於借助這個法令把進步的民主團體和其他反抗組織中不被他們喜歡的人趕出國家機關去。此外人們還可以肯定，這件事決不會比義務教育法令做出更多的成績來，伊朗人口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都是文盲，光是在德黑蘭一地每年就有十萬兒童沒有機會上學，義務教育法令一點也沒有改變這種情況。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也參加執行這一個法令。援用這個法令那些當作穿着燕尾服的竊賊或者騙子被清除出去的官員，絕大部份都是親英分子，因此美國人希望以此來削弱英國在伊朗的地位，以便取而代之。

羅特飛先生於是在年輕的國王的支持下開始進行工作，好幾個月之後應該按照法令第三章來懲治的人的名單終於公布了。丑劇發生了；在這名單上有議員、大臣、將軍、行政長官、參議員、公使，真是一次盛大的集會。英國人並沒有睡覺，他們的人還是留在原來的位置上。睡着的倒是可憐的羅特飛先生；因為國王沒有喚醒他，所以他對國王懷恨在心，倒向了摩薩台這一邊，大臣的職位緩和了他的憤怒。大臣的職位發生動搖的時候，他又推說什麼都不知道，根本沒有這麼回事，把一切事情都推在這可惡的摩薩台博士身上。他現在完全脫離了摩薩台博士，並且聲稱首相甚至侮辱過他，因此他很難過，接着他繼續說：

“簡言之，在我奴才跟他之間並沒有政治合作。我只是起草法令。我根本就不讀報紙，為了保護我的神經使我可以安心做司法部的工作。我想設法把這座腐朽破碎的大廈（司法大臣先生指的是他管的那一個部）整頓一下。”

順便提一下他在這個部里的整頓計劃，他的計劃就是讓摩薩台經常把全權交給他，任他把那些劣法官小偷從這

一个城市調到另一个城市去。

“因此奴才并不是他的亲信。如果他（摩薩台）想反对王朝——但願沒有这会事，那么我連一点影兒也不知道。不仅我是这样，就是其他的大臣也是如此。”

辯白就在这种哀求可怜的哭泣声中繼續下去。他說他从不曾在報紙上發表过文章，他也沒有作过講演，他跟几个执政党都沒有联系，他已經七十四岁了，在夜里因为皮膚痒而失眠，他生肝病，还患內脏病、关节炎等病症。

無論如何他却是没有患过責任感过重的毛病。他既然跟首相意見不一致，他为什么还留在这政府里，对于这个问题他将按照这样一种精神来回答，假如他答复为什么他在1937年把那些無辜的政治犯总共判处了三百多年徒刑这一个問題时，他也会按照同样的精神来回答：

“我想如果我不得到他的（摩薩台）同意而引退，可能就得罪了他，他因此而不再給我工作，这样，像我这样一个穷人生活就發生困难了。此外我还害怕在我离开政府之后那些曾經被我斥責过的人会趁此攻击我。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穆罕默德·摩薩台博士又特別多疑。我必須考虑到如果我不得他的同意而引退的話他会怀疑我，他会向人民宣称我是一个間諜。那些被我惩办过的法官也可能跑到他那里去告訴他我罗特飞謀叛摩薩台政府。也許有一天早晨我突然被按照軍法第五条关到此地这一个監獄中来。”

这样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居然想改革伊朗的司法部！就是这种人，甚至比这种人更無能、更無耻、更胆小的人过去和現在决定着千百万农民、工人和市民的命运，他們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工具。

也許有些讀者会想，一个老而且病的人，他疲乏了，想

得到安宁，这样一件事能证明什么！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另一位正在壮年时代的里亚希先生吧！他四十四岁，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还是个工程师，他的思想应该是很合逻辑的吧，他还是参谋长，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往往应该是很坚决很强硬的。他以极端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劳动人民的时候是很坚决的。可是现在他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时候他的坚决的态度就软化了，他的举止与其说是由于胆怯，毋宁说是受着这样一种思想支配的缘故：往日在职时候的权力如今并不能够帮助他挽救自己的生命。

检察官把一纸命令摆在里亚希的面前，这纸命令是他在1953年8月17日国王逃出国的时候发布的。命令宣布：“从明天起在晚禱的时候暂时以‘愿上帝使我们伊朗的光荣永存不朽’来代替‘愿上帝使我们皇上的光荣永存不朽’，以‘我们的伊朗万岁’来代替‘我们的皇上万岁’”。里亚希承认他是这文告的撰拟人，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的亲笔底稿就放在面前，然而他以下面的话来为自己辩护，他解释道：

“这命令的真正起草人是摩萨台博士。8月15日我准备下台了，因此我只是勉强完成任务而已。我感到我不必对这道命令在军官们的行动中发生的严重后果负责，我满怀忧虑地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事变。”

检察官又把另一纸在1953年8月18日发布的命令放在他面前。这道命令说：“命令：有些人民党的党员企图在拥护国王的口号下来推翻政府，请您驱散他们，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这真是一个无比阴险冷酷的命令！事实上内阁在捣毁老王的纪念碑的人民群众巨大的游行队伍面前害怕人民

主运动得要命，因此內閣决定必要的时候用武力迫使这个革命运动变为一个無关重要的改良运动。摩薩台受了議員們、軍人們和幕后的美国人的假民主的言論的影响，不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反而害怕人民群众。摩薩台最大的錯誤就在于此，伊朗人民不得不为这錯誤付出巨大的代价。人民党的黨員在拥护巴格达的逃犯——伊朗国王——的口号下游行示威，这是一种可耻的謊話。这种謊話促使国家的武装組織憎恨人民党的黨員，实际上人民党恰巧是在“共和国万岁！”这个口号下站在正在發展着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最前哨。

現在我們再来听听总參謀长說的話吧！“执行摩薩台博士的命令这也許是我的錯誤……我根本就沒有想到我的責任，我只是像一架机器似的执行他的命令。我非常遺憾地承認我的作風是不对的，可是我可以向上帝起誓，我內心的信仰——尤其是在这些危机爆發的日子里——跟摩薩台博士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我奴才是一个軍人，按照我在軍旗前的誓言，我素来把保衛王座和王冠看作是我的任务。有关軍隊的命令毫無例外我全是从摩薩台博士那里得到的。1953年8月16日根据我的精神状况和我的神經情况我不能够工作，我时刻等待着把我撤职，使我能够从这种危險情况中脫身出来，这种危險情况我感觉到了，但是还是不大清楚。我極其遺憾地承認，我执行摩薩台博士的命令是我犯的錯誤，我不應該这样盲目地遵守服从上級命令这一原則。”

1953年8月19日冷酷無情地發出恐怖的大屠杀命令的总參謀长竟然說出这样的話来，摩薩台还想与这种人一起来跟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呢！

这些人是一定要失败的，荣誉属于伊朗人民，他们跟伊朗统治阶级的怯弱相反，作出了光辉的英勇榜样。1952年10月26日国王生日这一天举行的那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是令人难忘的。几乎在德黑兰全城，即使在最偏僻的市区，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反对国王和他的美国主子的标语。甚至在国王皇宫的围墙上人们也可以见到“打死卖国国王！”这样的标语，虽然有許多兵士日夜在皇宫的四周看守着。国王为了接受伊朗青年的致敬而进入德黑兰运动场的时候，憎恨他的浪潮向他迎头袭来。成千上万张印着反对国王的口号的传单在空中飞舞。广播员被人从扩音器那儿拖开去，全国都从无线电里听到“打死卖国国王！”这样的呼声。一位青年的教师，他是一个运动家，跳到运动场中间当着国王的面喊出人民对他的蔑视。警卫军官立即用刺刀对着那些青年运动员，向那些跟着喊叫的人和观众乱刺。国王不得不逃走，接着警察在全城开始了疯狂的大逮捕，甚至是无辜的妇女和女孩子都被捉起来。为了抹煞这次行动的群众性，政府当局声称人民党曾经分发假入场卷，一些“不速之客”就用这种假入场卷混进运动场。

在这些被捕者——青年工人、大学生、工人、工会的小干部——中间，有一个带着一架小提琴的青年也被关在一个警察局里。所有其他的被捕者，甚至是年老的妇人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决，而这位青年人却哭哭啼啼想通过对警官的卑躬屈节和阿谀奉承脱身出去。不管人家要听不要听，他跟任何人都说他是一个守法公民，从来没有犯过法。他老是向人赌咒发誓地说：“您一定认识宋特沙上校。他是我的亲戚。我是无线电台的乐师，请您放我出去吧！如果迟到了，我一定得付罚款……”。他在胡言乱语的时候把每一个

軍官都提升了一級，他把中尉称作上尉，把上尉称作少校，他的阿諛甚至那些軍官們也觉得太过份了，他們都拿他开玩笑。第二天早晨这个青年的母亲来了。大概有人已經告訴她，她兒子的行为多么的可怜。她公开地以她兒子的行为为耻，严厉地向他指責：“你瞧瞧別人，人家都不哭！你怎么能这样丢臉呀！”这几句話对这年輕的胆小鬼太刺激了，他开始瘋狂似的喊叫和哭泣。为这吵吵鬧鬧的声音所吸引的警察局的长官走进来了。值日監獄官把事情向长官报告之后，这位长官对在場的守衛軍官高声喊道：“唉，你們这些笨蛋，你們看不出这家伙跟人民党毫不相干嗎？他們决不会有这么一付可怜相。你們放他走吧！”

不，他們决不会像罗特飞先生和里亚希先生那样！遺憾的是摩薩台不依靠满怀牺牲精神的伊朗人民群眾，却依靠一小撮可怜虫，依靠一个幻想，伊朗人民群眾至今还是歌唱着走进集中营去，欣然地保衛着摩薩台。

第二章 伊朗劳动人民的境况

伊朗人民在过去两年内曾以团结一致的精神支持过首相和支持过首相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并且就是在今天也还以这种精神高喊着“拯救摩萨台！”以及“打倒卖国国王！”等口号。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回答是：这种精神是建立在这种见解上，即只有消除帝国主义对伊朗内政的干涉才是消除地主和买办阶级真正的权力的前提，并随此在国民经济同时向着各方面发展的时候创造了把劳动群众从无可忍受的情况下解放出来的极其必要的先决条件。

封建地主和买办资本家对伊朗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使伊朗的农民和工人深陷在一个不可想像的痛苦里。如果谈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群众的贫困，人们会认为，在满足劳动群众物质和文化食粮上的需要是不够的。在伊朗，贫困现象就不同了。或许欧洲人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希特勒占领的东欧国家的情况中找到这样的一种对比。我曾经有机会研究过伊朗中部和北部的村庄里的一些情况。里海南海边的吉兰和馬詹德兰的伊朗农民在他们的生活中很少吃到肉或者油类，谈到油类也只不过是羊脂而已。他们的饮食是米饭和茶；早上是米饭和茶，晚上仍是茶和米饭。根据中古时期的原则，农业生产需有五种要素，即土地、水、种子、牲畜和劳动力。对于这几种要素，农民很少能够提供出比劳动力更多的什么要素。所以提供其他几种要素的大地主要求得到收成的五分之四，而农民只能得到收

获量的五分之一，农民只有在極少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收获量的五分之二。

在伊朗，水这样一种要素与空气不同，它不是無人管理的；水屬於大地主所有。除去潮湿的海風引起丰富水量的那些多山的边区之外，伊朗是一个缺水的国家。重要的問題在于开发水源，可是封建制度和殖民地的剝削却阻碍着这个問題的解决，因为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哪里受到灌溉，哪里的土地就肥沃而多产。但是灌溉設備仍旧是中世紀的方式。在多水的山区鑿开一口井，井水就从地下导至所要灌溉的土地去。怎样引水呢？那就是在井和所要灌溉的田地之間按一定的距离挖掘一些垂直的坑穴，然后用平直的地下管道把它們联系起来。这种需要耗費極高劳动力的設備的做法，只有大地主才能办到。因为水也是屬於大地主的，而农民必須以收成的一部分支付水費，所以农民不得不另外以服徭役，清洗地下管道的工作才能爭得購水的权利。

在談到其他几种生产要素的时候，农民們同样是無法自立的；只有很少的人有一头牲畜。据伊朗报纸的記載，1950年在阿塞拜疆省有好几十万的农民自己是沒有耕畜的。如果他們迫于逆境，或者迫于歉收，而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不得不把准备好的种子耗尽的时候，那么他們剩下来作为唯一屬於自己的生产資料就只是他們的劳动力了，因而只能得到收获的五分之一，因为土地無論如何不是屬於他們所有。伊朗农民中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是耕种自己土地的所有者，而其余呢，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民是以封建依附的方式依靠大地主而生活。他們所得到的五分之一往往仅是五十五公斤左右的小

麦，一百零五公斤的大麦和大约三百到四百里尔现款（约合三块到四块美元）。就这点说来，把全家的劳动投入生产的五口之家必须靠这些钱过半年。一家农户的收入一月内达到一百五十里尔（大约是一块半美元）的也仅是少数。

因此土地、水和耕畜几乎完全属于一小撮人，他们以极残酷的方式剥削着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六百万的同胞；通常伊朗的大地主不是说他有多少多少公顷的土地，而是说他有多少多少村庄。在殖民主义阻碍发展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起着进一步支持剥削制度的作用；农民由于间接税和偿还大地主或者大地主的代理人那儿借的债务使他们陷入了更加深邃的依附状态。宪兵们天天在村子里出现，农民必须供养他们，否则农民们便会“因政治事故”而遭逮捕。关于伊朗宪兵们受贿的情况我已经报导过了，在战后这几年内许多身为人民党党员的农民只是因为他们太穷，不能满足宪兵的腰囊，所以都被关进监牢。

在多年荒蕪以后，农民们为了使女儿以及自己避免饿死而把他们十岁的女儿以一百里尔卖出的事并不希罕。伊朗各城市夜晚充满了许多卖淫妇，她们都是为了保全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生活，而被它们的父母从家里赶出去的姑娘。有时父母也同意，姑娘们与宪兵部队的一个军官或者与城市中的小工商业者订立一个同居时期，期满后她们仍然只能公开地做着同一种职业：卖淫为娼。这样的同居时期可以使父母们得到一千里尔，大约合十块美元，这些钱可以使家里的人在几个星期里免遭饿死。

住宅情况是不可想像的。人和牲畜同住在那些低矮而又暗黑的土墙小屋里。室内几乎没有窗户，满屋浓烟，而且经常供宿六人到十人。夏天室内，污浊而窒息，冬天潮湿而

寒冷。

处于这些条件，人们在伊朗北部各个省份中很少碰见一个年过五十岁的男人这是毫不足奇的。一个四十岁到四十五岁的男人已经是白头老翁，已经成了一个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孩子不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摇篮时期就已经死亡。在养了十个孩子的农家中能活下去的孩子几乎不会超过一个。百分之八十五的孩子不到十五岁就已死去了。

根据新马尔萨斯的“疾病是居民密度的一个上帝命定的调整器”的理论，统治阶级拒绝给人民以最起码的医疗保障，他们甚至对于在城市中好几十万人才只有一个医生的事实也感到无所谓。可以找得到大夫的村子是屈指可数的，而农民在到达一家诊疗所以前，他必须走过长达几小时的路程。假如农民确实碰到大夫，并经大夫同意为他诊治，为他开药方时，那么这个根本的问题才算有了开端。由于医药过于昂贵，甚至城市的中产阶级都不得不放弃医治，那么农民又如何能付出这笔医药费呢？欧洲的康采恩，伊朗的卫生大臣，各个区、局的首长们，最后还有小商人们，都打算在医药的价格上获利，而药价则随问津的多少而波动，所以上帝的传染病调整器并没有受搅扰，而这种传染病又是这样地慈悲，以致成千的“薄命的”穷人的生命都被它夺去了。伤寒流行病在伊朗各城市中可说是通常现象；天花痘疮也几乎是永无休止，1950年的夏天天花病就夺去了五万人的生命。再次担任卫生大臣职务的埃伯尔博士，他具有卓越的医药知识，但是他憎恨一切进步的东西，有一次，他坦然地认为，要是把伊朗卫生部关闭了，这对国民健康一点都不会有所损害，因为卫生部的预算费用和可供使用的大

夫絲毫不足以对国民健康起一点影响。

在伊朗，一个大夫与从事教学工作人員的情况稍有不同，他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收入，因此，許多高中畢業生願意學習医学这是可以理解的。怕大夫增加会打乱上帝命定的調整器，所以，每年只能讓一百五十到二百个大学生在德黑兰和外国受医学教育。在1953年对进入德黑兰大学医学院新入学的限制导致要求入学者的抗議，这些要求入学者受到整个大学生团体的支持，在大学地区开始罢課，并在那里为抵抗派遣来的軍警而建筑防御工事。大学終于被携带机关槍的兵士占領了，自从这件事情發生以来，軍隊便一直“監視”着这个德黑兰的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如果統治階級为了教育事業和国民健康而不得不縮減軍事部門，警察局和其他保安机关的預算所要求的整个伊朗国家財政的四分之三时，那么統治階級还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在伊朗的每个村子里，人們也必然会碰到相当多的盲人和殘廢者。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的材料記載，有百分之九十的伊朗居民身患粟粒性結炎膜。在伊朗，有些城市以“盲人城”著称。百分之九十的伊朗人患瘧疾，患肺結核的有百分之六十五。

許多农民試圖避免这种痛苦和飢餓就逃进城市里去。如果他們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們便作为乞丐流落在公路上和大城市里。許多住在边区的农民都逃到国外去，他們在那里以他們的勤勞来換取一种合乎人道的可以生存下去的生活。許多逃到苏联去的伊朗阿塞拜疆的农民，在那里勤勉地工作着，并且成为集体农庄的領導人或斯达哈諾夫工作者，过着一种幸福的生活。大批农民逃离伊朗农業的原因除了生产完全殖民地化之外，还因为伊朗，这个曾經輸出大

量农产品的国家，在战后几年内被迫由外国輸入小麦。在1936至1937年时，伊朗还能够輸出五万多吨大米，可是在1950至1951年时仅只能輸出二百七十吨；在1941年时，羊毛輸出尚达到一万一千六百吨，到了1950至1951年时仅只能輸出一百吨了。

讓我們現在来看看进城寻找工作的农民的情况吧！受到殖民地阻碍的工業只能吸收自由劳动力中的極有限的一部分，所以只在建筑業中有一些工作空額。特别是冬天当許多农民竭力寻找少数工作空額的时候，一个在建筑業中工作的农民平均每月只能賺七百五十里尔，約合七元五角美元。拿这些錢只能在德黑兰从容地吃上十五頓飯。由于一間房子的房租最低限度需要五百到六百里尔，因而工人只得滿足于建筑工地的一个角落，一个茶室或者一所伊斯兰教教堂里的一角，在那里，他既沒有被单。也沒有墊褥地度过了許多寒冷而潮湿的夜晚。这种情况特别是指那些在冬季来到大城市的农民而言的，他們为的是要在城里把錢积儲到夏天的时候，多到能供养他留在乡下的家庭的程度。一个在城里有比較固定工作的工人一般說来，所賺的錢只够維持个人的生活。如果他有家庭，那么在他扣除了需要耗費工薪百分之三十五的房租后，他所剩的一些錢是不足以保持其微弱的工作能力的。所以即使他并不因政治迫害而牺牲的話，那他也会因为很快的衰弱下去而死亡。

在1946年阿巴丹罢工以后，伊朗內閣被迫宣布了一項劳动法令(关于这次罢工我們将在下一章中仔細研究)，这一劳动法令試圖对各个省份規定出一种最低薪标准。可是这个法令直到今天还没有实行；雇主們仍旧經常利用职权，根据自己的决断来規定工薪。社会立法是根本沒有的，由于

受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統治階級認為有足夠的力量去鎮壓工人運動和工會，因而工人們在他們鬥爭中所獲得的，即所謂勞動法和一個社會保險法，至今仍舊無法生效。有些法令，比如 1946 年 5 月 17 日頒布的禁止十歲以下兒童勞動的法令在此種情形下自行取消了，因為雙親們指望那些應受上述法令保護的孩子們的微薄收入來維持家庭生活。所以在織地毯的工場里，許多六歲到十歲的孩子們整天價蹲伏在工作檯上，他們的腿勁也不能動一下，有時候一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時，這就對女孩們的身體的發育有所損害，致使大多數女子不能生兒育女，許多女子往往在分娩時死去。以額外津貼照顧失去丈夫的母親，對病人或者老年人的照顧，以及對孕婦實行工傷保薪等條例都是一概沒有的。孕婦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反受到無情而殘酷的解雇。女工的工薪只達男工的百分之五十。即使如此，婦女工作的機會仍然很少，因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家庭是依賴丈夫的低微工資過活的，丈夫不僅需要供養他自己的家庭，而且也還需要照顧他的雙親，根據中東一般的習俗他也還必需照顧他的叔母和祖母。可是在此情況下一個工人的每日工資卻很少超過三十六個里爾，拿這些錢今天還不能買到一公斤白糖。一公斤麵包就要值六個里爾，而一公斤肉更要值到四十到七十個里爾。

工人們住在矮小而簡陋的土屋里，好幾個工人，有時多達十人在這種小小的屋里像牲畜般擁擠在一起，屋後有一個小水池用作洗滌水槽。年復一年，無數因其雙親無力送他們上學的無人管束的孩子們就死在這些水池里，因此人民就以這些無罪而死亡的孩子進入天堂而自慰。許多母親有時因贍養者的失業先殺死他們的孩子然後自殺，她們

也就采取这种办法急速进入天堂；这是一种更可怕的死亡。假如工人被开除（企业主是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任何工人无限期地抛在街头，必要时加上罪名，說被开除者属于人民党）假如工人是这样被开除的，那么他便得不到最低微的国家接济。在伊朗，一百多万人的失业是殖民地国家受压迫的最确凿的证据，帝国主义国家的新聞記者故意把这个見証加以忽略。所以說故意的，是因为摩薩台博士曾有一次邀請这些外国新聞記者們去參觀德黑兰城南區，可是人們在西方的報紙上一点都沒有讀到他們的观感。而在这种事件上，只需一篇报导就足以駭人听闻了。被封建的一资本主义社会抛弃的人生活在地窖中，他們既沒有家具，也沒有被服和褥垫，衣衫也是襤褸不堪。在这种灾难中他們依賴血汗生活，而姑娘們把自己卖出去只值几根香烟錢。

失業現象在增大着。这种失業現象在美国殖民政策的影响中增长着，美国人通过一切使伊朗的經濟完全依附于华尔街的办法来为他們占有这个国家的石油財富鋪平他們的道路。那些美国“顧問們”的主要任务在于鏟除英国的势力和在于对苏联进行間諜工作，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到1950年便不得不拿出一百多万美元，美国的出口商人就是在这些“顧問們”的袒护下，逕直用那些伊朗本身能够在某些現有的現代化工厂和家庭工業中制造的貨物泛滥于这个国家，他們还用那些仅仅为了滿足大富翁們的奢望和为了吸取迫切需要的外匯的奢侈品泛滥这个国家。自从1980年以来，伊朗就拥有有二十五个大工厂和二十万个錠子的一个相当發展的棉紡工業。仅在伊斯法罕就有九个大紡織工厂，有一万多工人在这些工厂里工作。这些工厂自然是不能与美国紡織品的大量輸入相竞争的，所以伊斯法罕、設刺

子、大不里士和其他的城市里的許多工厂就不得不关闭停業。那些几世紀来依靠家庭工業而获得面包的許多手工業工人和小工商業者也都同样地淪为乞丐。伊朗軍事部还在战前就有了自己的制鞋厂和縫紉厂，伊朗的士兵們穿着用伊朗料子做的制服。今天呢，几乎这一切的貨物都是从美国来的了，而且这些貨物还美其名称作“援助”。1948年美国在伊朗买进价值十亿零五千八百万里尔的貨物，那时，他們自己的供銷物只达到三亿五千二百万里尔。1949年情况就完全顛倒过来；美国运到伊朗的貨物达到二十亿零九千五百万里尔，而从伊朗只买去一亿二千二百万里尔的貨物。这种有計劃的刮尽这个国家的外匯潜力的做法在战后就已开始，它使伊朗政府对于美国战时貯存在伊朗的未用的战争物資必須付出一千万美元，这种搜刮手段导致幣值的不断下降以及生活程度的經常增高。1945年时，三十个里尔还能抵到一塊美元，可是今天却要九十六个里尔才合一塊美元，1945年仅值二百五十里尔的一双鞋子，今天必須付七百多个里尔才能买到。自从战争以来，房租甚至增漲了三倍到四倍，而那时，工資和薪俸几乎依旧毫無改变。和粮食价格几乎無法比較，因为粮价經常不断地增漲着。结果是每年总有好几百小工商業者、手工業工人、職員和工人們以自杀来結束他們的生命。

伊朗的統治階級从人民的極端痛苦中吸取資本的方式特別显著地表明在两种情况中；这两种情况在伊朗是作为一种制度来实行的。在战时和战后的几年內許多貨物必須实行配給了，其中也有糖。因为在乡村里沒有戶籍报表，而在城市里統治階級为了分配購物証就利用了一种巧妙而聰明的办法，禁止人們上街領取，使人們必得耽在他們的家

里，然后發票的人来分發。可是伊朗的城市居民只有二百万到三百万人，其余的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六百万人却是生活在乡下或者是屬於游牧部落的。那么誰應該在乡下分配食物呢？自然是他們那些先生們，也就是封建主、大地主、游牧部落的酋长。但是这些大人先生們却以超过規定价格在黑市上非法出售糖并因此騙取了百万錢財。人們不得不考慮到，茶和糖对伊朗农民說来并不是享受品，而是生活資料。有时一口甜茶是唯一帮助农民維持生命的東西。

第二个例子說明 1949 年的灾荒时期。由于歉收，几百万人受到險遭餓死的威胁，因此政府決定向美国購買小麦。但价格是那么高，以致政府只能为南方的省份弄得数量極少的一点点。当美国粮食运到的时候，麦子已經霉烂到人們不得不把它倒到水里去的程度。随着二万吨含有霉菌食粮的“援助”，美国人在 1949 年末把一种新的植物病輸入伊朗，这种植物病所起的效果就是促成經常依賴美国的粮食供給。面临着美国的这种陰謀詭計，伊朗最反动的政治家之一薩希迪的政府迫不得已向苏联請求真誠的援助。苏联政府声明准备供給十万吨小麦，随后双方締結了一項貿易協定，当时一个身为伊朗政府全权代表的名叫瓦黑普—查德的伊朗富商接受了这些粮食。伊朗的英国代理人想用一切方法使貿易条約的締結成为泡影；我們暫撇开英国代理人的这种無数陰謀事件不談，我們的确知道，这位所謂富商在这桩交易中賺得了几百万托馬^①，而薩希迪首相和国王的妹妹阿希拉夫也刮进了一笔为数十分可觀的款子。

^① 托馬(Toman)是伊朗金幣名。——譯者

为了分配粮食以及为了检查阿塞拜疆省的經濟和社会情况，政府派遣了一个委员会到这个地区去，这个委员会是在大臣希克馬特的领导下，它握有特別的全权。在大臣的报导中有的說：“几世紀以来，阿塞拜疆从来还没有处在这样一种危險而困难的境地；如果不立即采取改善經濟境况和消除失業現象的步驟，阿塞拜疆的命运将和波斯灣沿岸同样处在絕望的情况中。”

誰要稍許認為，根据这个报导会采取一些措施的話，他就誤解了这种报导的意圖。这些报导只是在緊張的局势中为緩和輿論而作的，以后它便在任何一個秘書室里消失。但是阿塞拜疆的农民还是没有粮食吃，胡拉桑的农民仍旧希望在軍馬廐中找到一些沒有吃过的谷粒，而住在南方的农民仍旧依賴晒干的飞蝗和磨过的枣子核来度日，所有这些农民都还穿着他們破烂的服装，穿着几乎不能遮体的和几乎無法辨認衣衫过去的样子的破布烂袄。他們的鞋子或者是他們的靴子對他們說来只是一种穿着走路的工具而已。在北方，他們光着脚板連續几小时在北方寒冷的泥濘的稻田中工作，當他們在夜晚回家的时候，他們总要把僵硬脚放在火上烤几分鐘。

难道是他们习惯于这种生活了嗎？有誰慣于餓死呢？假如人們不能为自己弄到粮食的話，那末他最終便要為生存而向別人乞討。所以就有成百的要飯的农民流浪在街頭。如果偶而有一輛汽車停在一个村子里，車子就会被要飯的人們、剛剛学会跑路的孩子們、被几乎走不动路的老人以及男人和妇女們包圍起来。見到許多乞丐的欧洲人幸灾乐禍地搖搖頭并且說道：“一个懶惰的民族！”不，这是一个堅忍的民族，这个民族慢慢地理解到，如果人們工作不能得

到粮食，人們便不得不为爭得粮食而斗争！但他們只是开始理解到这一点，在战后的几年內，無數次的农民暴动証明了这一点，劳动群众越来越强烈地对土地的改革表示要求，也証明了这一点。

伊朗全国的可耕地几乎完全是屬於大地主的，其中有不少的大地主占有几百个农庄或者更多的农庄，有一部分农庄是他們在一生中从来沒有見到过的，因为他們是在伊朗的大城市中或者在里維耶拉^①海濱或者在佛罗里达度过他們的日子。他們反对在农業中作任何改进，首先，因为改进要有較大数目的投資，其次改进意味着侵害他們的权势，他們的反对使得他們成为帝国主义殖民統治者的天然盟友，殖民統治者对于依賴国生产力的發展和帮助根本不感兴趣。

伊朗統治階級和帝国主义主子間的均等利益在战后有一时期因华盛顿的政策而發生矛盾。华盛顿的机构那时力图削弱英国在伊朗的地位，展开了一場反对英帝国主义在伊朗的最强大的盟友，也就是說反对封建主的激烈的宣傳，这时有人甚至确切地說，“一千个家族吮吸着全国的鮮血”，連官方的“美国之音”也声称道：“伊朗的貧困的原因在于統治階級的腐朽。当人民在詛咒灾难和痛苦时，这一千个家族却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当国王作为杜魯門总统的客人訪問美国时，这些攻击便立即終止了，国王在美国不仅被看做牧童似的讓人摄影，而且也使美帝国主义者清楚地了解到，他們同伊朗封建主結成联盟能够更好地达到他們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的目的。美国人理解到，要胜过英国人所

^① 里維耶拉——法国东南和意大利西北地中海沿海風景地区。

給的賄賂，要為封建主的幾個寵兒們在“第四點計劃”的行政機構中弄些重要的職位，並且以推薦一個“由上而下的革命”的辦法來保持他們進步的面目，他們使國王成為這種革命的執行人。國王把一些由其前輩掠奪去的農民的土地賣給幾個富農，便認為他的任務完結了，此外，國王沒有驚擾那些本來嘲笑過改良詞句的封建地主們。在政府中的人員，百分之八十的國會議員都是大地主或是他們的代理人，這一事實以及意識到他們與殖民統治者的共同利益都使得他們對他們的權力不會受到侵犯這點是不會懷疑的。當他們僅能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進行選舉時，那些百分之九十五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們就只能排着隊被帶到選舉地點去，農民們在威脅中被迫“選舉”為農莊主所中意的人。誰反對，誰將被打死或者在任何一个農莊主的土牢里死去。蘇爾法加黎家族中的最著名的代表是伊朗國會的副主席，在這個家族的產業中包括有地牢，那些長年拷着鐵鏈的農民都痛苦地死在這些地牢里。

沒有什麼措施能夠稍微改變伊朗的真正當權者依然是受帝國主義者支持的大地主的事實。那些在表面上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公布的法律又有什麼用處呢？法律的實施是掌握在反對法律的那些人的手里，所以實施仍是空談。例如在1946年，伊朗的聯合政府公布了一項法令，根據此項法令農民的賦稅應降低百分之十五。但這個法令從未實現過，即使依靠其權勢規定最少降低賦稅百分之十的摩薩台也不得不補充証實道，在公布法令和實施法令之間有天壤之別，只要權力的現實基礎，即生產資料一直為某些人所占有的話，而那些人的特權是應該受到某些法令的限制的。

所以事實一再證明，解決伊朗問題的鑰匙是在於真正

的土地改革，这一見解由于人民党的坚持不懈的宣傳工作而为越来越多的农民阶層所理會，这种見解还漸漸地为农民的自發起义提供了一个統一的斗爭方向；不仅如此，这种見解还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統一的行动。所以一个真正土地改革的要求对大地主来說是一种挑釁，作为这种要求的最坚决的先鋒战士的人民党是封建阶級最瘋狂的攻击对象，这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人民党給伊朗人民指出，劳动人民在城市和乡間的共同敌人是竭力为了利潤而維護其权勢的帝国主义，是在任何形式下極力支持反动派的帝国主义。人民党就奠定了工农联盟的基础。迫使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放弃“民主”的剝削方式的伊朗群众运动在成长着，正像1953年8月19日血腥的改变所証明的，它使越来越多的阶層加入到斗爭中来。

第三章 伊朗的工人运动

在伊朗，像在一切的附庸国家中一样，一个广泛的民族运动的展开是与工人阶级的兴起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虽然工人运动的斗争有许多鼓舞人的事件，虽然这一斗争在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中导致一次伟大而有决定性的胜利，可是我在这里不打算写一部伊朗工人运动史；在工人运动的组织遭受禁止，他们的领袖，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①的总书记礼萨·罗斯塔已经两次被判处死刑的今天，有谁愿意冒险写下一部记录八年来遭到当权的剥削者最残酷压迫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呢！因此我不得不局限于这点，即就我所掌握的几件有特性的事情来给读者们介绍一个梗概，也就是介绍一下伊朗工人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有什么样的发展，他们以怎样的一种英勇气概和怎样的一种牺牲精神，来完成他们团结和领导被压迫者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以及他们如何忘我地为了整个人民的事业和为了和平而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伊朗工人阶级的代表在第三届世界工联大会上（1953年10月10日至21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的发言中指出，他身为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在今天能够读书写字，并能代表伊朗弟兄们的要求，这都得归功于工会运动。这个普通的伊斯法罕的建筑工人从一个不会读写的工人成为工会领袖，成为联合全世界工人运动中最知名的领袖的世界大会

^① 即伊朗工人和劳动人民工会中央联合委员会。——译者

上的报告人，这对伊朗工人的發展道路說来是有代表性的。这种發展情况值得注意，因为伊朗的工人运动还是年青的。

第一批伊朗工会是在1918年产生的。那时，印刷工人，排字工人和鞋匠为了因結一致更有效地表达他們的工資要求和縮短工时的要求，而創立了与工会很相似的一种組織。随着这些第一批的工会組織的建立，后来在一系列的商業和工業中心，比如在勒什特，巴拉維港和德黑兰建立了許多較小的工人协会。此外，1927年在伊朗就已有六個活躍的工会，而石油工人工会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政府的殘酷迫害时建立起来的。

除石油工業外，伊朗受到殖民地工業化只是在1930年才开始的。第一个步驟是建筑橫貫伊朗的鐵道，这一建筑在1928年开始，在1937年結束；它把伊朗的鐵道网扩大了一千四百公里。鐵路的全长在1947年达到約二千八百公里。在1929到1930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机把一大批的伊朗农民赶进城市去。資本主义的貿易和封建地产，为了使自己免担風險，双方都使世界商品大市場上物价的波动加倍地压在农民身上。为了逃避飢餓，农民們都涌进城市里去。在城市里有少数几个富翁由于农民的貧困而产生的手工工人和小工商業者的貧困而更进一步發財了，这些富翁为了無限增大他們的資本在寻找新的投資可能，因为这些資本暫時在商品貿易中找不到有利的交易。他們在一个受到限制的工業建設中找到了这种投資可能，在这方面失業和飢餓的农民們的極便宜的劳动力使新的企業有利可圖。到1932年时，在伊朗已經建立了九十三个股份有限公司，有資本十四万三千零九里尔，到1942年就增漲到一千九百零二个股份有限公司，資本有二百二十三万九千八百一十里尔。自

1930年以來，在這個基礎上首先發展了紡織工業；1940年時，紡織工業已出現具有二十萬個錠子的大棉紡廠二十五個，二萬五千個錠子的毛織廠八個。伊朗紡織工業的重心是在伊斯法罕城，那里有一萬多個工人在九個棉紡廠和毛織廠中工作着。戰前在德黑蘭開始建築的一個更大的紡織廠由於帝國主義競爭的加強，還一直沒有建成。構成伊朗工業另一個重要部門的是年產三萬五千噸的現代化制糖廠，糖的產量是不能滿足居民的需要。

除去這些較大的工業部門外，還應該提到德黑蘭的一個大煙草工廠，一個相當發展的水泥工廠，一些肥皂，火柴，制鞋和橡膠工廠以及一些制革工廠和麵條工廠。

戰前幾年內為了建設重工業，政府曾採取了初步的措施，可是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反對，這個計劃就沒有實現；根據與克虜伯訂的一個條約，到1940年應該在克萊蒂建成的一個鋼鐵廠至今還不能從事生產，雖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已為它花去一億多美元。煤礦的開采也因同樣的情形未能實現。

縱然有一切殖民主義的枷鎖，國家的工業化還是有了進展，特別是輕工業部門方面；1929年伊朗才有三十萬產業工人，到1941年已達到六十萬人左右了。

必需指出的是，工業化不是根據一個按照伊朗民族利益的計劃來完成的，而是僅僅按照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們的掠奪欲及其代理人即統治階級的利潤欲來完成的。戰前，希特勒的代理人按照他們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目的就曾授命這樣做過，他們這樣做時候，受到國王的热誠支持，這個國王不僅是最大的地主，而也是最大的工業家，他是服從他的委託者的任何示意，以便能夠不受阻礙地填滿他的腰囊。

但是工業化在這種情況下也給其餘的大地主以損害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獲得的一筆不可想像的財富的機會。他們身為一些信用企業的當事人可以从國家那里借到大量的工業貸款，然後他們再把貸款以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借給商人，這些商人雖然要付高額的利息，但他們從工業的企業經營中還能得到利潤，因此也就樂於接受。

伊朗國家的工業化是被迫向前的，在這種工業化中獨裁者變成了億萬富翁，一些大地主們增加了大量的財富。全副武裝的受國王命令的兵士們從許多母親的懷抱里強奪了十歲的女孩子，把她們趕進卡盧斯和布希爾的紡織工廠中去。誰要是不能或者是不願意從事指定給他的工作的話，那他就得痛遭鞭笞。全國沒有任何報紙，沒有任何政治的和社會的組織能保衛這些勞動奴役者的利益。那時，甚至於資產階級的黨派也被禁止，工人團體的任何企圖都受到懲罰。如果有人試圖建立一個政黨，那就被認為是背叛國家的行為。但是把東方的野蠻政策與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新策略結合起來的統治階級的最瘋狂的暴政也不能窒息工人階級和進步知識分子對社會平等權利的要求。1918年到1928年間，不斷或多或少地發生過工人們有組織的嘗試活動，工人們試圖以共同的行動來改善他們的境遇。比如德黑蘭繪圖行業的工人們，伊斯法罕的紡織工人和阿巴丹的煤油工人都曾以堅決的罷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鬥爭，雖然他們為了贏得勝利而不得不犧牲許多的領袖。石油工人在1921年的巨大罷工中就曾作出他們英勇的光輝范例，這次罷工被視為伊朗工人運動的最光榮的鬥爭之一。那時被捕的許多工人們直到1941年仍困憊在伊朗的牢獄里，或者在極困苦的情況下過着放逐的生活；謀殺工人領袖海時雅西也就

是这个时期的殘暴行动。在 1936 年有五十三名自由战士、工人、大学生、医师和手工工人追随着这位英雄，这些自由战士以泰奇·爱朗尼博士为首試圖組織民族反抗运动以反对国内外暴君的殘酷迫害，也就是从他們的行列中后来涌现出一批人民党的領袖和無数的工会領袖。

像爱朗尼博士在法庭前的辯护詞中所說的，因为当政者“害怕工人二字好像魔鬼害怕聖水一样”，于是他們便把那些領袖关闭起来，但这些領袖并没有因終年受到拷打而屈服。只要他們活着，就会战胜拷刑，当伊朗产生联合力量以及在他們从牢獄中释放出来以后，他們会立即着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再行建立工人組織。这些工人組織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中央理事会的任务是要把一切其他自發形成的工会以及把由英伊石油公司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所監督的組織团结在一个統一的领导下。大多数有組織的工人，但也有許多未組織起来的工人們，都响应 1943 年 5 月 1 日工会中央理事会的統一号召同意一个統一的組織。在同一天的公报中，宣布建立伊朗全国工会的一个統一組織，名为“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到 1946 年共有一百八十六个工会加入了这个中央理事会。这个組織的主要机构除去全国工会的代表大会之外，就是由代表們从他們之中选举出来的四十五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理事会，以及由中央理事会选出的十五名委員組成的执行委员会。礼薩·罗斯塔被选为中央理事会的总書記，他是因参加 1921 年石油工人罢工而被关闭起来的工人領袖之一。1945 年大約有二十万工人組織起来了，1946 年已經有四十五万工人参加了組織，这就是說，伊朗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加入了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

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力量使他們有可能貫徹他們的重大要求。他們經過努力，終于達到了提高工資，承認八小時工作制度和支付加班工資等要求。那些有組織的工人們也不斷地貫徹着他們其他的一些要求，如取消童工，不論種族和性別保證同工同酬，在法律上承認工會和罷工權，每周工作六日制和假日工資照付等。

這些成果加強了工人階級的自覺并使中央理事會在人民中獲得一個越來越廣泛的基礎。統治階級及其英國同盟者們警覺到這種危險。最初他們企圖以分裂策略來阻止工人運動，而後來當這種策略因工人們的警惕而失敗時他們便用警察武力。所有這些企圖都失敗了。據官方詳細的估計，1946年5月1日在由中央理事會組織的五月大會中全國有七十多萬人參加了示威遊行。在這幾次示威遊行中，表明了人民的力量和戰鬥準備是團結一致的，這種團結迫使政府承認工人的國際鬥爭日為節日。

這些成果也就證明了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是伊朗工人階級的真正代表，所以世界工聯便在1945年7月6日邀請中央理事會參加10月1日在巴黎舉行的大會。中央理事會決議派遣四名代表前往參加，可是有兩名代表被逮捕，而其餘兩名代表在巴黎大會四天以後，也即在1945年10月4日才被政府批准允許去巴黎。中央理事會在11月7日被接納加入世界工聯。

這時，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沒有放棄通過建立一個附屬於他們的工會組織來分裂伊朗工人階級的願望。他們的代表在世界工聯大會上對中央理事會是否有資格加入世界工聯的問題，提出異議，世界工聯立即決定派一個委員會去伊朗，以便就地調查各個代表對於這個有問題的組織的

會員成份、活動、獨立性和民主形式發表聲明的正確性，這一決議當然只能在第二年才可實現。

這時，從德黑蘭傳來了緊急消息。伊朗工會中央理事會總書記通知世界工聯說，1946年5月1日武裝的警察襲擊示威群眾，在阿巴丹爆發了一次巨大的罷工，警察和軍隊向工人進攻，許多工人領袖遭到逮捕。這些消息促使世界工聯執行局再次商討伊朗工會問題，世界工聯總書記路易·賽揚隨即受到委託去查證伊朗的工會情況并向世界工聯作報告。

7月20日路易·賽揚來到德黑蘭。經過對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工會的工作方法仔細的考查以及與各個工會領袖接觸以後他報導道，伊朗工會中央理事會按世界工聯的規章來說是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他並且說，應該承認中央理事會總書記札薩·羅斯塔是世界工聯理事總會的委員。這個決定後來在理事總會的布拉格會議上被批准了，世界工聯承認中央理事會是伊朗工人的唯一民主的組織。這樣，英國石油托拉斯的計劃也失敗了，因為英國石油托拉斯實際上是這些到巴黎去提出抗議的所謂“工人領袖們”的組織者和資助者。

伊朗工人階級的領袖在他們從專制者的牢獄中釋放出來後立即着手建設一個強有力的工會組織；與他們的領袖一樣，伊朗工人階級在其權利和組織受到殘酷壓迫的年代里並沒有失去他們的戰鬥精神。如果我願意試把1941年以來工人們的戰鬥活動作一詳細的敘述，那麼我就會超出本書的範圍。因此，我必須只限于証實下列這几点：所有這些戰鬥活動都是因參與活動的工人們底難以想像的困苦情況而產生的，所有這些戰鬥活動全靠着工人們光輝的團結精

神，所有这些战斗活动都是跟英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激烈的頑抗的决斗并且都以工人們的胜利为結束。

独裁垮台以后，伊朗工人們初次較大的罢工是財政部和司法部建筑工人的罢工。紧跟着的是市政厅建筑工人和德黑兰紡織工人的罢工，阿塞拜疆制革工厂的罢工，伊斯法罕的两万紡織工人的罢工和 1945 年基尔曼沙，阿巴丹和阿哈德雅里石油工人的罢工以及最后在 1946 年 7 月石油工人的大罢工。

在我叙述伊朗这些最大的罢工以前，我感到有必要先对当时的条件作一簡短的描述，英国石油托拉斯的工人們是在这种条件下为他們的股东老板卖命的。

在上一章中，我已把伊朗工人今天的境况叙述过了。那时，石油工人們的境况还要更加恶劣。如果考虑到阿巴丹的特殊情况，尤其是考虑到在夏天气温一直上升到五十五至六十度的令人难受的暑热的时候，那么，石油工人的工資远不及一般的工資水平。伊斯法罕和馬詹德兰省各城市的工人們起碼有一座茅屋或者至少有一所小的，虽然是簡陋的住宅，而石油工人們的“家”却是用鉛皮，草席或是厚紙板做的四椽牆构成的。阿巴丹是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是离城百米的工人們却是生活在不可想像的条件下。五十多年以来，英伊石油公司剝削着五万到八万工人，可是石油工業中的工人們没有一个能够回想到这种企業中二十年前的劳动情况的，因为在二十年前进入这个地獄的人，早已死去了。工人們还經常处于最殘酷的警察統治的压迫之下。这公司在整个时期內不仅以他們的暗探来监督工人，而且也統治着这个地区的一切国家机构、警察和部队。这个有好些年支持过一个身为政府官員而只听从公司暗示的米士

巴一法特米，虽然亲英报刊認為他为石油大亨們服务的統治是不可忍受的，可是却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把他撤职。1945年末，石油工人工会加入了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在1946年举行的巨大的5月示威的压力下以及在1946年5月10日阿哈德雅里工人們發动的胜利的罢工的压力下，石油集团允諾阿巴丹工人提高工資并建造适当的住所。可是他們并不想实现这个諾言，相反，他們的目的是在爭取時間，以便首先阻止阿巴丹工人們的罢工，然后粉碎他們的工会，使罢工最終成为不可能。从这件事情中他們获得了一些經驗：对政府或人民施加压力的有效方法就是發动这些或那些游牧部落去进行恐怖活动。6月23日在阿拉伯部落酋长們的一次聚会上，根据在場的英国間諜的指示作出了这样一个決議，决定以襲击阿巴丹工会大厦来粉碎工会准备进行的石油工人总罢工。根据決議应在7月15日进行襲击。工人們走在这个卑鄙的計劃前面，他們提前在7月14日开始罢工，以此打乱游牧部落的所謂“联盟”的恐怖陰謀。

早晨六点鐘，石油工業各工厂都停工了。随着十多万名工人和職員都罢起工来。几万名手工業者和商人为了表示与工人們團結一致，他們关闭了他們的商店也参加了工人們的罢工行列。罢工的范围、罢工者的齐心协力以及中等階層与工人們的要求的一致性都表明：伊朗工人运动已經起了質的变化。伊朗民族第一次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英国人自从半世紀以来第一次感到这些“沙頁普斯”(Sahibs)，就是說感到这些“統治者”是不可靠的。他們丢掉面子，并且不得不叫他們的汽車駕駛員做他們的保标。

我願意在这里复述一下一个伊朗女子的报导，她是英

伊石油公司一位高級職員的妻子，那些日子她是在阿巴丹亲身經歷的。她深為那種鼓舞最普通的伊朗工人的精神感到驚訝和感動，當她在對我講述在罷工期間她的女傭人的態度時，她幾乎激動得流淚；她說：“那女傭人是一個在加工工廠工作的工人的妹妹。我從未覺察，她的政治傾向是什麼。她善良而柔順，雖然有時候有些固執。她剛把茶水放上，工廠的汽笛就響起來，表示罷工開始了，她立即把煤氣關閉，徑自離屋去了。兩天以後我在大街上碰到她，我感到她的性格好像完全變了；她的固執現在表現成爲一種驕傲的優越感。當我自願借給她一些錢的時候，她斷然拒絕。她說，工會會幫助她，此外她也能靠貸款到商人那里買到東西。況且最終還有人民黨在這裡。她會在罷工結束以後還能得到她的錢。我回答道，她在我那里是按計日工資受雇的，如果她不工作了，那麼她也就不可能再得到工資了。她紅了紅臉，但卻給了我一個想像不到的答復，像這樣一個細弱的，平時非常膽小的女子居然會作出這樣的回答來；她說：“為什麼我們不工作呢？我們工作——我們罷工。尊貴的夫人，我們可也是人呀！”我對她說，我不打算與她爭論這點，“恐怕你們斗不過英國人吧！”“怎麼斗不過他們”，她說，“在阿哈德雅里的工人們也實行了他們的要求。如果我們大家像現在這樣團結一致，那麼我們就能對英國人表明，我們是主人。我們大家將得到我們的工資。而您也將付給我工資。”她的態度是有意識的或者只是重復她哥哥對她說的話，那我就知道了。無論如何，她的自覺態度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因此，我特別懂得尊敬和愛戴這位姑娘。”

是的，這次罷工不僅爲了要提高工資和改善住宅，這次罷工同時是反對英國人干涉伊朗內政的一次同心協力的抗

議。工人們要求驅逐英國代理人，這些代理人的唯一的任務在於在政治上監督工人，要求解散英伊石油公司的諜報組，要求解除英國代理人米士巴—法特米政府官員的職務。

雖然英國殖民主不能阻止罷工的開端，可是他們卻企圖以暴力來絞殺它。根據他們最初的計劃，在7月14日至15日的夜間他們在伊朗警察局的幫助之下把五百多名全副武裝的阿拉伯人運到阿巴丹來，這些阿拉伯人就在7月15日襲擊工會辦公地點，對急急趕來保護工會的工人開火。工人們憤怒地自衛，並進行了一次正規的，持續兩小時之久的戰鬥。在這次戰役中死四十六人，傷一百七十人。工人們赤手空拳對付襲擊者的步槍和手槍，最後匪徒被工人們趕跑了。一個供給公司糧食的承包商，名叫哈達德的匪首死在當場上。政府派了一個委員會去阿巴丹。委員會答允審查工人們的要求；而公司面對着工人們不變的戰鬥決心聲稱願意支付工人們罷工時的工資損失。那個女傭人的話是對的。如果英國人打算在7月末把兵艦開到波斯灣，並用幾個師的兵力來加強巴士拉的據點，那麼油田上的血腥戰鬥會引起整個伊朗人民的注意，並對英帝國主義者激起無限的憤慨。帝國主義者就在道義上打了一次很大的敗仗。

1946年7月，蘇塞斯坦發生的流血事件，揭開了伊朗人民永無休止的鬥爭序幕，鬥爭是為了反對英國在伊朗的殖民統治。這些流血事件鞏固了取消英伊石油公司是从帝國主義者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的必經之途的信念，而且使得伊朗石油工人反對英伊石油公司的鬥爭不再被視為仅是石油工人應盡的任務，而是被看做整個伊朗人民的事業。

这样一来，伊朗工人的斗争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统治阶级及其帝国主义盟友的恐怖和报复手段也随着尖锐化起来了。虽然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是压迫者攻击的主要目标，然而这种恐怖手段也是针对一切民主组织的。利用谎言和中伤，英伊石油公司宣传部企图把工人和他们的工会隔离开来，“美国之音”也通过德黑兰广播电台来为英伊石油公司服务。他们在伊朗部队进入阿塞拜疆以后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方式来与工会斗争，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放弃采用分裂工会的手段。所以，加瓦埃斯·萨丹乃的民主党企图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会，虽然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在“民族解放”的幌子下，法西斯匪帮所施行的恐怖压力也不能迫使工人们参加伪工会组织；虽然大多数国营工厂的厂长和私营企业主与警察局串通一起来反对中央理事会的有组织的工人，而且开除了一些有名的工会会员，可是他们却不能促使几百名工人们脱离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

伊朗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在一份电报中把政府及其幕后人的阴谋告知世界工联总书记，并提议对这种情况作一次调查，以证明由政府对工人阶级及其合法的工会提出的责难是否属实。根据这个提议世界工联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伊朗去，这个代表团在1947年2月底到达了德黑兰。为了使代表团对检查这些情况成为不可能，以及使代表团处在既成事实的面前，执政党在1947年2月13日组织了一次对德黑兰工会中央理事会办公厅的袭击，其时雇佣来的匪徒们在警察的掩护下破坏房屋，毁灭文件。同时有人导演了一幕“重新选举”中央理事会的丑剧。他们想通过这次选举来伪装一下。欺骗世界工联代表团，说目前的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不再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也不再获得他们的信任了。

世界工联代表团的团员在他们到达时立刻受到政府代表的接待，并为一群间谍和工人叛徒所包围，这些人企图阻止他们与工人群众接触。代表团的团员们为了亲眼查证各城市和各企业中工人们的生活情况，便坚持在全国作考察旅行。因此政府代表们阻止不了世界工联代表团在各地受到的友好接待，不能阻止工人们通过对世界工联和对工会那时的总书记的欢呼来表明他们真正的意见，不能阻止他们对于真正的工会表示忠诚。工人们此外还获得机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代表团的团员们知道他们的贫困和痛苦。虽然政府预先作了布置，可是世界工联的代表们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出，谁在伊朗为工人的事业而斗争，工人信赖谁。在对伊朗工人们的生活情况和他们所受的压迫作了仔细的调查之后，世界工联庄严地宣布，它承认伊朗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是这个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唯一合法的组织，因为中央理事会受到大多数伊朗工人的支持。

伊朗当权者想以政府御用“工会”来破坏中央理事会的威信，他们这种徒劳无益的努力反映在下面的事实里：1945年伊朗政府第一次参加了日内瓦国际劳动局的工作。那时，中央理事会的二位工会领袖以“技术顾问”的名义参加了伊朗代表团。在第二年伊朗派了一个纯粹由政府代表组成的代表团，1947年所派的“工人代表团”的成员全是些由政府组织起来的和受政府监督的工会的代表。这些政府派的工会那时参加了黄色国际，可是在两年以后它们因缺少成员就解散了。

因此，反动派认为粉碎中央理事会最后办法只有封闭中央理事会以及逮捕他们的一些领袖，包括逮捕他们的总书记礼萨·罗斯塔。罗斯塔被提出公诉，但是在工人们的

逼迫下到預審結束時他被人用一百萬里爾的保證金保釋出來，後來，在1949年2月4日行刺國王的事件發生以後在缺席審判中他被判處死刑。以後，他就在秘密狀態中生活着，中央理事會也轉入了地下，但是任何中立的觀察家都可以肯定說，這在過去的五年中並沒有妨礙伊朗工人階級的統一，而是更進一步地鞏固了。在中央理事會被禁止活動之後，為鎮壓有組織的工人而進行的肆無忌憚的暴行只促進了一樁事：使工人們改變了他們的鬥爭形式，並沒有挫敗他們的力量和毅力。1946年7月發生的流血事件使得他們完全清楚地認識到，如果他們能夠發動全體人民並且領導他們和國內外壓迫者的強權進行鬥爭，他們才能夠貫徹他們的要求。

早在1949年年中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公開的工人階級組織。除去這個雖然被禁止的，但仍舊出版的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報紙“勝利報”外，還計劃出一份新的公開的報紙，這份報紙雖然在形式上與前者不同，但是事實上却是完全像“勝利報”一樣代表工人們的權利的。1951年3月和4月發生了新的罷工，這些罷工像這年的五月節一樣不僅鼓舞了許多工人從事新的行動，而且也動員了更廣泛的居民階層為民族事業而鬥爭。

伊朗工人階級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權利的鬥爭歷史是一首有待於記錄下來的英雄史詩。1949年2月4日事變以後，即刺殺國王這一天以後，也就是說統治階級實行政變的這天以後，沙伊紡織工廠工人們舉行了第一次罷工；1951年五萬石油工人舉行大罷工，伊朗各工業城市中也隨之而爆發了表示團結一致的示威遊行；七百名火車司機為了爭取實現勞動法也實行罷工；1951年3月伊斯法罕七萬示威者

举行了巨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切都是伊朗人民必然获得胜利的斗争的各个阶段。

尤其是伊斯法罕的示威游行和随之而来的4月30日在同一城市中發生的示威运动证明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多么紧密地与全体伊朗人民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另外一种相类似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广泛的居民阶层被卷入到反帝陣綫中去。在伊斯法罕，由于便宜的美国貨物充斥伊朗市場，使許多紡織工厂倒閉了，工資再度急剧降低，可是这时物价却不断地上漲着。許多企業主都破产了，失業現像到处瀰漫着，这种現象是人們自1930年紡織工厂建立以来未曾見到过的。經濟状况的衰落也把手工業者和小工商業者卷进它的旋渦，整个城市都充滿了对帝国主义的和国内的剝削者無限的憤慨。当1951年4月30日警察为了威吓其余的工人和以此来阻止人們紀念五月节而逮捕了几名工人时，就暴發了一次自發性的示威游行，几乎該城的全体居民都参加了。乘着装甲車的警察和軍隊被派来了。有一名警察拒绝对游行示威者、他的兄弟姊妹們开枪，因此他被他的上級當場击毙。一个工人投身到机关槍上去，这样他就堵住了杀人的凶器。工人們手無寸鉄地对付着一輛装甲車，把它推倒在街道旁边的壕沟里。此后，当伊斯法罕最大的封建主之一，薩雷姆—埃特—达萊威胁着要派他的武装匪徒来襲击这个城市时，工人們以总罢工来答复他，工人們在他們的战友被釋放时才恢复工作。

在第三屆世界工联大会上，伊朗代表在报告中特別指出这一事实，就是說伊朗的工人們虽然受到一切的迫害，却把自己組織起来并进一步發展了工会运动。他用几个例子說明了他們的胜利：

賽姆納紡織廠的工人們向廠長提出了全體職工的要求，當警察逮捕了一些工人的時候，全體工人們進行了總罷工，這次大罷工迫使他們在三天以後釋放了被拘禁的工人，迫使他們接受了一切要求。伊朗工會代表的發言人還舉了下面一個例子，他說：“雖然統治階級的現行法律規定禁止二個人以上的任何集會，可是1953年卻有兩萬多名工人于規定的時刻在工會門前集會，在那里，人們在群眾的歡呼聲中掛上工會的招牌。因此，當局不得不默認工會工作是合法的。”

工人們爭取改善生活境況的鬥爭和伊朗人民的自由鬥爭連結起來是多麼必要，工人領袖在其報告中借助兩個例子指出了這一點。1952年五千名鐵路工人企圖通過一次罷工來實現他們的工資要求。雖然這次罷工準備得很好，但卻以失敗而告終。為什麼呢？在罷工的時候，全體伊朗人民正忙于從事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與英國諜報中心的普遍要求比較起來，仅限于提高鐵路工人工資的特殊要求就大為遜色了。由於他們的要求受到限制，罷工者孤立了。第二年德黑蘭玻璃廠工人由此獲得教訓；他們與企業主共同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在這次示威中，他們抗議輸入與伊朗產品相競爭的美國商品。鞋廠工人們關心這次抗議並不亞于做鞋的手工工人和無數其他的工商業部門。因此，玻璃廠工人的行動和他們禁止輸入這類美國商品的要求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贊同，廣大群眾迫使政府公布一項爭取得來的輸入禁令。

手工工人，小工商業者，尤其是農民加入爭取共同利益的戰鬥也無疑是工人階級最大的成果之一。1953年在伊朗發生的二百多次罷工中，全體勞動人民與罷工者表現了團

結一致的精神，這種精神使伊朗警察局為了粉碎罷工長久以來認為有效的方法完全失敗。警察局採用的方法是以包圍罷工的企業，特別是罷工者所占領的企業，阻止任何人把水和食糧供給罷工者。隨着圍困之後，以大量拘捕來襲擊工人。倘使罷工者僅僅依靠他們的家庭和某些附近企業工人的幫助，那他們往往被迫而投降。建立全體勞動人民的團結就使這種橫暴策略幾乎完全失去效力。這種團結精神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1953年7月德黑蘭煤磚廠二萬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持續了十一天並以罷工工人的完全勝利而結束。德黑蘭居民視這次罷工為他們自己的事業，他們抱着最大的犧牲精神以糧食、衣服和金錢供給兩萬名罷工工人。許多工人把整個一星期的工資給了罷工者，還組織捐款，為了捐款他們動員了他們的孩子們。其他的居民也表示了極大的犧牲精神，一位水果商人把他的全部存貨，一驢車的貨物捐給了一個女募捐者；把水果運給罷工工人的出租汽車司機拒收車費。一個老嫗帶來一罐飯，她說：“這原是我的晚餐。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全體勞動人民的這樣一條統一戰綫必然獲得勝利，而且它也確實獲得了勝利。

正在壯大起來的工農聯盟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當權者對於聯盟的實現也起了相當大的推進作用，其時由於當權者在城市里公布了現行法律就經常不斷地迫使工人們在鄉下舉行集會，工人們在那里認識了農民的問題和苦難，而且也使農民認識他們的問題和苦難，由此就奠定了互相體諒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一個鞏固的統一戰綫就建立起來了。從工人們的經驗中農民們又懂得，只有共同的行動才能導致勝利，因此從前曾解散過公開的或秘密的農民協會的村庄里又產生了這類的組織，這些組織在跟大地主鬥爭的時

候从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那里得到一个堅強的支柱，在农民那方面也一再積極幫助工人們进行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伊朗工人階級深知他們在爭取伊朗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他們怀着足以自傲的心情，以更堅強的决心来証实他們能够起这种作用，来实现路易·賽揚的話，世界工联总書記路易·賽揚在第三屆世界工联大会的报告中对伊朗工人們說：

“在我們之中，你們看到我們伊朗的同志們，他們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来到我們这里。他們中間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坐牢；可是謀杀和追捕，封鎖边境和各种刺探都沒有阻止他們到这里来参加第三屆世界工联大会，也不能阻止他們現在跟我們在一起。請允許我，同志們，以你們的名义向伊朗人民和伊朗英勇的工人們致敬，伊朗人民为了他們的独立正在进行一場艰巨的，但是偉大的斗争，一場和平的，但是一定会获得胜利的斗争。毫無疑問，伊朗人民由于自觉地團結在爭取民族独立的民族陣綫中最終将会成为他們国家的財富的主人。”

第四章 伊朗的农民运动

在上一章中，我已簡短地叙述了伊朗农民的境况，說明了一小撮大地主掠夺着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六百万的劳动农民，指出了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的农民占有自己的土地，而其余的农民耕种着地主的土地，指出地主大多在某一个豪华的疗养地方揮霍农奴劳动的成果，說明了甚至水也是属于地主的，农民除去非繳不可的地租外也还需服劳役。这种劳役并不限于前面提及的清理灌溉河道，而且在某些地区也包括为大地主或是其管理人从事建筑工作，提供他們的耕畜，有时也許是一头驢子，去为地主的某一建筑事項和类似的劳役运送物资。这种隶属关系还表现在这里，农民不許生产他所需要的东西。这些限制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是为了地主的盈利。如果地主自己打算种植一种有希望获得較大利潤的作物，那么他就禁止农民种植这种作物。举例說，在諾夫桑德楊农民不許种植楷树，但是农民必須为地主栽培楷树，却不能分享他們的劳动成果。在某些地区农民也还必須在服劳役时耕种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农民必須在这塊土地上生产規定的农产品，最終他們連一点东西都分不到。虽然摩薩台在1952年夏天企圖通过法令取消一切劳役；可是这个所謂法令却因下面这一个条款而失效，即規定只要劳役工人自己同意就可算作例外。試想一个劳役工人敢于拒絕同意地主嗎！某些地区的农民还在受地主的束縛，未經地主同意不得离开他們的村庄。在其他一些村鎮里仍旧不允許这村青年与邻村的青年結婚。

今天伊朗农民的隶属关系在根本上不亚于他们中古时期的难友们，他们的负担只有更加加重，因为资本主义使他们听任高利贷者的摆布。伊朗农业问题专家奥斯托万，在半官方的政府报纸“知识报”上证实说，农民在收获前穷苦得不得不把他们所得的那一部分在收割前就拿出去作抵押。因此，1945年马詹德兰省的农民每借二十七公斤米在收获之后必须交付一百二十公斤。

对大地主来说，农民是最便宜的劳动工具，因而地主根本无心在他的土地上改善生产条件，譬如建立费用浩大的灌溉设备，使用人造肥料或机器辅助工具。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耕地得到充分的灌溉。在十一年的时间只有六百二十二架拖拉机运来伊朗，今天只使用二百五十架，收成也相适应，每公顷收获大麦和小麦五百公斤到六百公斤。但受损失的不是农庄主；因为农庄主生产的越少，产品的价格越高。不幸的是那些出不起这种价格的居民。1860至1861、1869至1872、1879至1880和1915至1917年代不断发生的饥荒变成夺去千百万伊朗人生命的大饥饉。因此在1869年到1872年十分之一以上的伊朗居民都移居国外去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十九世纪末每年有二十万农民从阿塞拜疆、苏塞斯坦、基尔曼等省和从伊朗南部沿海地区逃往巴库、高加索、印度和伊拉克去。关于出口事业的衰落我也已经指出过了。

先前我已讲过这些遭受到不可想像的剥削的受害者的悲惨命运。资本的“解放”加速人们的贫困，这从统计数字上可以显明地看得出来。有人指出，政府百分之七十的开支是从农民上缴的直接和间接税中筹措来的，然而这样巨额的税收，一里尔都未施惠于农村。因为大地主大都不住在

乡下，所以从他们那里也就不会有一个里尔流入农村中去，尽管他们的收入都是从农村中得来的。在城市里，当劳动人民的团结行动引起某种变化以前，仅有一个村镇有诊疗站、图书馆或体育俱乐部，至于说电灯或者是真正的卫生饮水就完全不必提了。在馬詹德兰，九十个村庄只有一所学校，而这所学校也只收男生。因此，第四点计划的間諜代理人在最近侵入到伊朗的农村，給伊朗农民加添了新的負担。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伊朗农民中發生了一次思想方面的大变化。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不是沒有影响的。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認为地主享福，农奴挨餓是自然的、永远只得忍受的話，那么現在来自邻国的消息使他们們听到，在那里，农民与工人阶级結成的联盟已經消除了这种情况。这就給予他们以新的希望，鼓舞了他们并使他們充滿改变他們境况的願望。这种願望集中成为某些要求，大地主和国王的压迫同时也大大地加重起来了，国王發展成为全伊朗最大的地主。

当 1941 年国王的独裁政治崩潰时，伊朗农民长期忍辱的全部仇恨在馬詹德兰省自發的暴动中表現出来，在这些暴动中独裁者派人建筑的房屋和宮殿受到了襲击和焚燒，也有些大地主断送了性命。在第一次憤怒平息时，农民們認識到，通过这样的自發行动是不会得到什么結果的，他們还認識到人民党代表的那些新的力量是正确的，这种力量教导說，只有跟压迫者作有系統的和有組織的斗争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轉变。这个見解立刻为城市中工人們的經驗所証实。

因此，农民們滿怀热情跟随着人民党，人民党自从在 1941 年建立以来就以全力来防止农民因单独行动而分散他

們的斗争意志，就以最有效的方法来集中这种战斗意志。大約在1945年左右农民运动开始在受人民党支持的农民联盟中采用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几百万农民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全国都建立了这种农民协会，在馬詹德兰、吉兰、胡拉桑、耶斯特、伊斯法罕、基尔曼和法尔斯各地都有。虽然各个省份中風土情况各有不同，在具体要求中有某种区别，可是主要的要求到处都是一样：土地改革、調整生产的分配，取消实物地租和取消劳役等。

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吉兰农民运动那样强大，致使害怕农民拒絕繼續向地主繳租的大地主們在人民党参加运动后同意普遍降低农民地租百分之十五。1946年在农民运动的压力下加瓦·埃斯·薩丹乃公布了一項法令，這項法令宣布农民联盟和吉兰大地主間私下訂立的局部性的协定在全国範圍內生效。如同我曾經說过的一样，虽然這項法令一直沒有取消，但却从未得到国会的批准。

1949年以前的那几年，縱使受到一些挫折，但是仍然可以說农民运动的一系列胜利是这几年来特点。这种發展不仅惊动了地主，而且也惊动了殖民主，他們都認為他們的利潤受到了威胁，于是再度結成联盟，以便阻止农民运动的發展。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攻击和鎮压一切民主組織，农民联盟也包括在內。可是这种鎮压沒有使农民的要求銷声匿迹；农民协会經常不断地出現，利用一切机会提出土地改革的要求。在1950到1951年不仅是个别的地方上的农民协会，而且伊朗农民的全国組織，农民联盟也要求实现1946年8月公布的关于降低地租的法令。在1951年，运动再度大規模地展开，以致許多村庄上的农民干脆把大地主或者他們的代理人赶跑了。在無数地区，企圖以武力保持封建秩

序的宪兵和为了他们家庭的粮食和生活而斗争的农民发生了流血冲突。在德黑兰附近费拉明县迪亚福—阿巴德区农民们队在路轨上，阻止粮食外运，直至他们的要求实现为止。在这些斗争中，农民们表现了鲜明的齐心协力精神和决心。1952年这些斗争更进一步尖锐化，尤其在伊朗西部的省份中更是如此。例如在库尔德斯坦省农民们夺取了农庄主的土地，在荷尔曼村农民们驱散了一个集会，在这个会上宪兵和大地主们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在桑拿达伊区农民和宪兵也发生了冲突，因为农民们坚决拒绝缴纳任何地租。在塔基斯坦，在喀斯文城附近农民们拒绝所谓“国家财产分配委员会”的代表进入他们的村庄，因为他们有理由把委员会看作是保护大地主特权的一种工具。与委员会要把被前任国王夺去的地产分给富农分子的任务相反，农民们要求重新在那些土地上耕种的权利，在前任国王夺去这些土地之前，他们曾在那儿劳动过。塔基斯坦的居民用尽一切办法来保卫他们的权利，坚决反对那些想要贯彻委员会决议的宪兵和大地主们。

研究这些事件就说明，这些行动不再是一些局限在地方上的自发性的措施，而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举例说，如果某地的农民竟然能把地主或他的管理人赶出村庄的话，那么这些农民就到邻村去，促使当地的农民效尤他们的榜样而且还帮助他们。所以，在许多村庄上大地主被赶跑了，收成由农民没收了。由于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所以那时农民在这一切行动中只是要求实现他们缴给地主的地租降低百分之十五。虽然这种要求只是一种微小的变革，然而这究竟是一种变革，农民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伊朗第一次出现了农民统一战线，农民

統一戰綫第一次与工人階級結成了聯盟。

这个聯盟在 1949 到 1953 年間又日益証實了它的作用，唯有依靠工人的帮助农民在斗争中才能获得胜利。每当农民們見他們的要求不能达到目的时，他們往往带着他們的牲畜和工具到附近的城市中去，在那里，他們为了以他們的要求去轟击政府或者个别的議員在劳动人民的支持下举行了巨大的示威游行，在政府机关前面提出他們的要求或者占領邮电管理局。虽然政府当局和官員們往往对这种事不加理睬，可是由于工人們表示与他們團結一致，农民們往往对自己的力量获得新的信心，这种信心使他們在多数情况下有力量把大地主或是他們的代理人赶走，并把收成加以沒收。工人与农民的團結也表明在工人階級無数的帮助行动中，比如在学校建設上，在建立衛生机构上和为了在乡間提高社会觉悟及文化水平的各种措施上。

三年以前，青年工人和青年大学生們初次發起一項对农村居民有極大好处的运动。他們分成大大小小的組下乡去，給乡民們带去愉快的艺术表演并与他們討論問題。在第四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期間，包括二千名青年的十七个这样的“队伍”被派到德黑兰近郊的各个村庄去。当警察和宪兵攻击这些和平队伍时，这种队伍便分做五人到十人的小組，他們帮助村庄上正在建設起来的青年組織，并且与他們保持着經常接触。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促使他們展开了一項强大的农村群众工作。在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青年中自动产生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已經开始發展起来了，农村青年的積極活动已成为进步的强大动力。德黑兰附近哥尔得斯达村的农民今天之所以能在較优裕的情况下生活，主要須归功于青年人。青年們把大地主赶出村子并

沒收了“他的”谷物。青年們的積極性推动他們去貫徹一个起示范作用的計劃；他們把灌溉土地的水道增加三倍，建筑了一所学校，一个运动場，鋪設了一条穿过全村的大道并且还利用沒收得来的財產丰富了乡間的文化生活。一个巨大的农村节日就証實了伊朗农村青年的才能是全面發展的，他們中的最进步的代表从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带回了推动青年工作的新的动力。

自然，所有这些成就不是沒有牺牲就达到的。許多富有热情的青年遭到迫害、追逐、监禁和杀害。可是农民子弟和城市中的工人子弟一样清楚地懂得，如何进行自衛，采取什么在当时必要的手段去战胜統治階級对付进步势力的反攻。城市和乡村之間的越来越强大的團結也一再在这里表現出来。

我在別处已經指出工农联盟絕不仅仅是有利于农民，像任何真正的联盟一样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农民支持工人的斗争，因而对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事也不是希罕的，費拉明地方植物油煉制厂的罢工就是一个例子。农民們深刻認識他們所受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在他們土地上所做的破坏活动之間的关系，这使得他們把工人階級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当作他們自己的胜利，并把他們的斗争提到爭取民族独立和爭取和平的更高的阶段上来。

第四点計劃代理人的活动对于促进伊朗农民的認識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們的行為使得农民們認識到，这个美国組織旨在在乡村巩固封建制度，根本不关心徹底解决农民的痛苦生活这一重要問題，这个問題牽涉到大地主和無地农民之間的关系，如果对这問題进行一番認真研究，那

么最后一定会归结为要求实行全面土地改革。可是帝国主义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土地改革，以便使这个国家成为剥削对象和它的侵略性的霸占世界计划的战略基地。农民们亲眼见到美国人在掘井，然后又填塞，农民们相互问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工人们回答说：一旦反苏战争发生，这些安装在军事要地的地下水库就要为侵略军服务。

所以，近几年来伊朗各村镇上不断发生反对第四点计划的代理机构的示威游行，这是不足为奇的。在里海沿海地区美国人因害怕 1953 年 8 月事变而不敢进入这些村庄。在葛尔干和在德黑兰近郊，农民们一再使那些用来放映反苏和挑拨战争影片的放映机成为废物，并在大多数第四点计划组织扎营的村庄中，农民房屋的墙上贴着：“打倒帝国主义！”以及“打倒卖国国王！”等标语。

农民运动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反帝的思想意识的觉醒增强农民的战斗力，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这些事实迫使统治阶级时而作些虚伪的让步，以便麻痹农民的战斗意志，使得其中一部分农民保持中立。统治阶级作了这样一些虚伪的让步，他们颁布了关于降低缴付给地主的地租，关于分配过去独裁者夺去的财产以及关于一再允诺的土地改革等各项法令。在 1952 年 8 月，当摩萨台政府通过法令再度降低了农民地租百分之二十时，又一次表明没有一项措施和诺言是真心诚意的。虽然其中只有百分之十有利于农民，其余的都用作建设和发展村镇的基金，可是这时，因帝国主义的参与和摩萨台的垮台，统治阶级再次感到自己已经强大得足以把这条法令连同摩萨台的一切其他法令重新一起取消掉。

分配前国王的财产，目的也是为了欺骗农民。当今国王

的父亲所夺去的财产被出售掉了，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富农阶层来分裂伊朗农民阶级，在于今后更有效地战胜伊朗农民。要是把这种手段认为是一种土地改革，这是对无地农民的一种嘲弄，是对百分之九十的伊朗居民的一种嘲弄。

伊朗农民目前的处境是难以忍受的，早晚一定会酿成一次灾难。庸医决不会使得病情好转。因此，农民也不愿受这种虚伪改革的欺骗，今天进行这种虚伪的改革是为了明天的倒退。他们要求的是真正的土地改革，是要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他们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可是光是土地不能帮助他们。他们进一步要求在技术方面和经济方面给他们必要的帮助，以便他们能从缺水的土地上得到收成去养活他们自己和人民。这不是不可能的要求，因为这个富有的国家，足以保证一个古老的有文化的民族过一种合乎人道的生活。

今天农民们越来越理解到，他们只有把他们的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与全体伊朗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他们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来越多的农民理解到，由于在封建制度时期农民的落后，由于农村中劳动人民失去勇气才使得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伊朗人民遭到失败。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使农民有了领导，无产阶级的战斗使农民对群众的力量有了新的信念。在工人阶级中他们找到了巩固的随时准备帮助他们的支柱。工业无产阶级同时也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在为他们的事业赢得农村中的劳动群众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顺利地结束这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与进步知识分子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以前的成绩也确实证明伊朗的工人阶级是有能力负起这一使命的。

第五章 人 民 党

如果今天在伊朗有一个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人民陣綫的話，那末它的存在是和人民党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在我看来，要叙述伊朗的反帝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就不能不提到人民党在这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关于人民党的詳細历史到现在还没有写出来；所以下面簡短叙述它的成长和工作时我基本上根据我的朋友，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員，伊拉茲·爱斯剛德里在“近东”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束曾引起世界政治局勢的剧烈变化，政治均势不再存在；沙皇俄国崩溃，代替它的是年青的苏維埃国家，这国家放弃了沙皇帝国主义所要求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就这样在伊朗人民面前，經过了将近一世紀的奴役，打开了一条通往自由独立的道路。可是伊朗人民这口气松得太早了。沙俄的退出角逐更加刺激起当时曾用軍隊全部占領过这个国家的英国来吞并伊朗。但1919年一条有关的条約的实现打消了这种計劃；伊朗各省，阿塞拜疆、吉兰和胡拉桑的暴动和全国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又教訓英帝国主义說，直接殖民統治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英国被迫自伊朗撤出軍隊而滿足于把它造成一个附庸国，在这件事上做它的听話的帮手的是大地主們，这些大地主，看到了邻邦俄国农民的解放而害怕起来，他們准备做出任何卖国的勾当，并且甘心服从任何一个能保証他們对人民施行無限制的威权的人，在英帝国主义者方面，極不願伊朗人民通过了民族解放而从他們的社会枷鎖中解放出来，因此，英国殖民主和伊朗

反动統治階級間就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同盟關係。

為了不讓這種可恥的勾結遭到人民的破壞，就需要一種獨裁，並且如果統治階級和它的帝國主義後台採取一種獨裁制度，他們得找到一個獨裁者，他們在伊朗在一批人格掃地的份子中發現了這樣一個獨裁人物，那個丘八光棍札薩·汗，他那種無恥無賴使他能夠在二十年期間用欺詐、詭計和殘酷手段來充當反動派的代理人來滿足他的托付者的願望。在伊朗缺乏一個足以負起領導人民群眾的責任的工業無產階級，缺乏各種政治的組織，這都使他便於欺騙人民和扼殺每一個正在萌芽中的民族運動。

二十年代末期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隨着一些災難的後果在勞動人民方面引起了無數反抗運動和農民起義、獨裁方面以最殘酷的恐怖行動來對待勞動人民提出的改善處境的要求。這反映在下列事實中：1931年有兩千以上的政治犯在伊朗監獄里受折磨，一百五十個農民被槍殺或絞殺，這危機可也引起了伊朗工業化的開始，因此喚起了唯一能團結全體伊朗人民去反抗國內外壓迫者的力量，獨裁政權用來對付伊朗工人階級的要求的瘋狂恐怖足以證明伊朗的工人階級已認清了他們的历史使命，試回憶一下在1936年那一次包括五十三位教授、學生和工人的一批人的入獄事件、統治者斥責他們開了共產黨會議、辦了共產黨雜誌、他們的領袖，愛朗尼博士，原是柏林大學學生，經過沒有人道的拷打在1940年2月死於德黑蘭獄中，他的幾個朋友，即屬於這五十三位勇敢的保衛伊朗人民權利的戰士，和愛朗尼博士一起在獄中渡過漫長歲月的，今天都是人民黨最重要的領袖人物，如黨的總書記，物理學家拉德馬內什博士，杰出的外科醫師雅斯地博士，法學家伊拉茲·愛斯剛德里，作家

他巴利, 工会會員布格拉替, 名醫巴哈拉米等。

所以能在伊朗組成一個進步的黨的成分是早就存在的, 這個黨必須在力量對比起變化時誕生。這種變化隨着蘇聯加入反“軸心國”戰爭而發生, 蘇聯的加入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和解放的特質, 並且產生了以蘇聯為核心的反希特勒聯盟。在紅軍的打擊下並且由於紅軍輝煌的勝利, 反動力量遭受慘重的損失, 而爭取自由和獨立的戰鬥力量則得到增強, 紅軍的每一個勝利都意味着帝國主義者們的削弱, 而帝國主義者們彼此間的矛盾和殖民制度的危機則又助長了被壓迫人民的鬥爭, 所有這些發展以及蘇聯戰鬥部隊在伊朗的出現使群眾爭取伊朗境內實力關係起根本變化的努力得到一個新的高漲, 三天工夫人民的暴動就把警察國清除掉, 凡通過群眾運動未能恢復自由的爭取人民權利的先驅戰士, 根據1941年10月7日伊朗議會通過的特赦法, 所有的政治犯都得釋放。剛一獲得解放, 這些工人領袖們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們就決定, 把群眾的這種努力以一個巨大的政黨來聯繫在一起。無數老自由戰士就馬上加入了這個“人民黨”, 伊朗資產階級革命的傑出的戰士之一, 蘇賴曼·莫生·愛斯剛德里, 就是這樣加入的, 一個臨時的包括十五個委員, 以建設和領導組織為任務的委員會也告成立, 這個黨的宗旨在綱領第一條內總結為三項原則:

1. 人民黨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進步的知識分子的黨。

2. 這黨是進步的和民主的; 它爭取一種土地改革和大地的分配, 以及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民主化並且維護工人和勞動群眾的利益。

3. 黨是一個反帝組織並且反對外国的任何對伊朗內政

的干涉和反对伊朗的殖民地化和奴化。

党首先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法西斯主义在进行工业化伊朗时曾起过很大的影响。

由于发展上受到阻碍，伊朗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对于本国生产的工业配备不断增长的要求；而由于农产品输出降低引起的外汇的缺乏迫使政府和原料不足，而正在谋求倾销市场的法西斯德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希特勒德国极愿促进这种关系，因为这样做是可以配合它把所有苏联的邻国，伊朗也在内，造成反苏据点的计划的。1940—41的对德贸易就占全部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四十八。希特勒在伊朗的政治影响也就相应地加深，以致伊朗政治经济方面的反苏倾向的代表也愈来愈活动得利害。这种反苏倾向，经巴尔都·封·设刺赫斯和沙赫特南博士德黑兰的访问巩固后，完全符合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方针，英国在伊朗市场上的利益远远落后于它在伊朗石油上的利益并且也知道这些利益受纳粹的威胁，不如受伊朗人民的威胁大。

第二次大战爆发前那几年的法西斯宣传不但蛊惑了统治阶级和某些政治集团和议会议员，而且也拿它的敌视人类的思想毒化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小公务人员。人们想用对法西斯亲善来表示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许多渗透了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集团错误地把法西斯主义当作唯一可以驱除英国在伊朗势力的力量。这种幻想的危险，当法西斯军队北面从高加索，西面从埃及接近伊朗边界时，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人民党临时委员会最重要的决议之一，因此就是，宣布向德帝国主义者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向群众说明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在全国，特别在阿塞拜疆，那里即便法西斯宣传

已在商人群中，在知識分子及小工業圈子里獲得特別穩固的基礎，反法西斯委員會也紛紛成立；1941年底還不顧政府和統治階級凶惡的制止出現了一種反法西斯報“馬爾多姆”。這個以後就成為人民黨的官方機關報的鬥爭刊物所起的開導作用馬上在全國發生效果。好幾百久已成為法西斯主義狂熱信徒并把法西斯主義視為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唯一有效力量的知識分子認清了自己的錯誤而加入了人民黨。

人民黨在成立後很快獲得了工人和廣大知識分子群眾的信任，以致它在短時間就擁有四千多黨員。它之所以獲得普遍的同情，除了它所提出的要求足以表示群眾奮鬥的目標外，下面的事實也是一個原因，就是，黨的領袖們大部分是工人和知識分子，他們在獨裁時期由於他們的反帝活動而遭政府逮捕或放逐。用來向政府作猛烈反抗的黨的傳聲筒，一個報刊，它的創辦使黨能接近越來越廣大的人民誠實地向他們報道世界歷史性的重大事件並使他們擺脫獨裁和根深蒂固的幻想的蠱惑，黨是成長了並且在德黑蘭外也獲得立足地，省聯盟紛紛成立人民黨不久便在全國站穩了腳。

黨積極地和年青的工會合作，以求把它們組織成爲一個統一的、巨大的、戰鬥性很強的組織，這是它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當英國的代理人在依照英國工黨的藍本成立一個社會民主黨的企圖失敗後已經把某些工業部門的工人在機會主義的路綫上組織起來時，這個任務就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在某些城市里自主的工會自動地成立起來，它們是需要聯合起來的；為了粉碎英國代理人一手造成的組織的分化企圖，首先必須揭穿它們的假面具，並且同時向國家，

向帝国主义的特权人，向本国的帮手展开英勇的、争取满足工人的要求的斗争。在这个真正的工会的斗争里，人民党和它的在工会运动中的积极成员都表现为工人阶级的负有使命的领导者。仗着他们的帮助成立了工会中央委员会，它的忠实的，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努力，获得了各工会会员的同情，使他们加入了中央委员会并且一九四三年团结在伊朗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内。

党的另一任务是反对独裁政治的代理人的斗争。当战争爆发后政府下台，国内没有一个进步的组织和党派能组织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上台的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又给倒台的独裁政治的代理人铺好了爬上国家机要地位的道路。问题是在去阻止这些民族叛徒和屠杀无数伊朗爱国志士的刽子手们再得到政权，如果他们已经重新窃据要津，必须驱逐他们。因此由于人民党的发动，不顾政府当时颁布的戒严令，在1942年2月8日，人民党精神之父，爱朗尼博士逝世纪念日，德黑兰发生了一次群众示威游行，二十年来群众又首次控制了伊朗首都的街道并且向庇护下台的独裁者那些帮凶们和助长他们继续活动的政府发出他们反抗的呼声。由于这个使群众又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力量示威，有杀害许多自由战士罪行的前警察总局长和警察总局政治部的另一些帮手，还有负杀害爱朗尼博士的责任的典狱长终于被捕并付诸审判。

在这些胜利的标帜下，1942年6月举行了第一次德黑兰党会议。根据戒严法令，人们不准集会，治安机关有权使用武力冲散任何集会，但是一百二十个代表不顾这个法令接连几天地在一个私人住宅里会聚，却并未被警察当局发觉，直到党的号召和会议的决议公布后警方才知道有这么

一回事。

會議的結果使党的基柱得到本質上的巩固。在會議上詳細討論了政治和組織問題，通过了党的暫行規章，批准了临时委員會的反法西斯政策并且肯定了这委員會已經对动員伊朗人民向法西斯作斗争做出決定性的貢獻。會議要求伊朗工人加强对反希特勒联盟的支持以反抗法西斯并議決了下面的行动綱領：

1. 組織一个广大人民阶層都有代表在內的民主政府。

2. 徹底执行伊朗宪法关于公民政治自由和人权的規定，取消 1929 年 5 月頒布的法律（按照这法律，建立任何一个貫徹共产主义的目标和一种共产主义的策略的党派，或其目的和策略是反君主政体的党派都被認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样一种組織的成員得做以三年至十年的监禁，并且按照这条法律的解釋任何三人以上的团体都将視為一个党派）；修改选举法和規定妇女选举权。

3. 在农民間分配公产和独裁者的地产；合法承認八小时工作制和制定一种保障工人权利的法律。

會議強調干部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通过極广泛的宣傳党的原則来巩固和群众联系的重要性。因此會議決定成立一个負責發動和宣傳的部門并發行一种新的报刊作为党的机关报。这些組織性的決議奠定了已經存在的各組織在全国地区成为广泛發展的基础和成立新团体的基础。新选举出的德黑兰委員會經委任去作开好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并直到那时为止执行中央委員會的职务。

在伊朗历史上首次产生了一个新型的党，一个劳动人民的斗争組織，依靠着劳动群众，符合着伊朗的情况。

在第一次德黑兰會議的时候党已拥有四千成員，这里

面百分之八十是工人，其余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党已支配着在吉兰、馬詹德兰、阿塞拜疆、胡拉桑和伊斯法罕等处的省联盟，其他地方的联盟不久也将追随它们的榜样。

党和它在工会里的代表以及它的刊物坚决地保证实行民主改革和肃清国家机构内的亲法西斯代理人和反动份子，这使党首先获得了独裁时期受罪最大的工人們的信任。

人民党的这种吸引力由于它的斗争的胜利而加强，由于党联合伊朗紡織業中心——伊斯法罕工会作斗争，工人的工资就在三年內增加到三倍于战前的标准。通过有党作全力支持的罢工运动，在伊斯法罕和馬詹德兰的工人們胜利地貫徹了八小时工作日并且迫使企業者讓他們支配使用工作服和衛生設備并替他們付医藥費。由于始終鼓励工会全力斗争的党的不懈的努力，工人們克服了企業者頑强的反对而取得了罢工权。这样党便巩固了它在工人階級中的地位并且通过了宣傳工农联盟获得了国内越来越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同情。

群众們要求肃清一切独裁的残余，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和苏联建立經濟和文化的关系；可是反动派对每一个进步的發展加以破坏并且用民主的外衣掩飾了他們对人民的要求的破坏。当时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它們以“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正义的战士和信徒”，“劳动的人們”，“自由战士”高高姿态来爭取人民的同情。可是伊朗人民却憑它們的行事来鑒定它們；这样它們便馬上被看出来是以仰仗美英帝国主义者為立場的。因此，它們在那些一直被它們的花言巧語所蒙蔽的人們面前也就給揭穿了真面目。这样它們只是助成了人民党的抬头，人民党为人民利益的正义斗争說明了它是伊朗劳动人民的唯一的真正

的代表。

人民党在这个斗争中的胜利不仅使伊朗的反动派，也使英美帝国主义者感觉不安，他们一心一意地要把伊朗政治角逐场上的这个新生力量消灭掉，他们想利用一个将军，阿尔发来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府，阿尔发和英国驻德黑兰大使以及伊朗国王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阿尔发把他的自称为“民族运动”的党徒们派到至今还是人民党的一个堡垒的伊斯法罕去，为使这个工业中心中立化。这将军的党徒一连几个月地煽动着人民，直至工人们在某一天经过了一系列流血的事变后突击了法西斯叛徒的中心，“民族运动”的首脑部并以他们坚决的立场强迫叛徒的头子接受他们的要求。

阿尔发将军失败后英国人又弄出另外一个傀儡来，要他制造出“一个能完成战后特殊任务的，稳定的伊朗”。这个新角色是1931年以来一直住在外国的山也特·齐雅特·丁是1919年曾用政变来打开一条独裁之路的家伙。人民管他叫做英国代理人第一号。这个“伊朗的政治家和爱国者”曾在伊朗干了一些祸国殃民的活动后退缩到巴勒斯坦。现在又有人想到他久经考验的本领来了，用一切宣传伎俩把他当作一匹好马拴在厩里，替他准备了一个衣锦“还乡”，把他捧为议会委员和“祖国党”的领袖。山也特·齐雅特·丁企图做得比阿尔发将军狡猾些；在一次会谈里他郑重声明，他一贯反对独裁并且是苏联的一个朋友。他想就这样来证明苏联在伊朗多么受欢迎，伊朗的人们多么满怀希望地瞻望着苏联的胜利。他可也就这样证明了他自己是多么的卑鄙无耻，因为像他那样一个人民最可恶的敌人，一个死命拍英国人马屁的奴才也居然厚颜无耻地戴上亲苏的假面具来

誘騙人民。

人民黨認清這種煽惑活動的危險性，它揭穿這個“愛國者”在戰前曾以英國臣民自居並以英國臣民的身份參加過阿富汗的一個會議。黨委會對人民群眾發出的的一個號召揭發了反動派要想通過這個代理人而達到的真正目的。黨用有力的示威遊行向他展開的鬥爭贏得了許多還保守着中立的，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的擁護，他們已經認出山也特·齊雅特·丁是英國的代理人 and 獨裁政治的鋪路者。

山也特·齊雅特·丁却仍然能用他那些煽惑性的，要人念念不忘於“民族傳統”的號召吸引了一批落后分子在他的周圍，他們認為回到聯邦政治制度和恢復伊朗的“哥拉”(Kolah, 大概是伊朗的一種帽子——譯者)來代替歐洲的硬帽是解決國家迫切問題的途徑，這樣便在競選第十四屆“國民議會”時人民黨與山也特·齊雅特·丁的黨羽間發生了一場劇烈的鬥爭，這些黨徒們已組織了一些半軍事性的組織，並受着政府、大地主和大商人們充分的經濟上的支持。在南部的英占領區，選舉反帝的議員是不可能的，每一個候選人要在二十四小時內驅逐出境。但在紅軍駐扎的北部地區却展開了一個自由競選，在這競選里大地主們和其他的反蘇派的競爭活動絲毫不受阻礙，正如事實所證明，無數瘋狂的反動分子能尽情地爭取獲得當選的票。

雖然黨在南部地區遭受到種種的障礙，雖然選舉制是這樣地不民主，雖然對方用盡種種狡猾的手續上的技巧，人民黨仍獲得了二十萬票，這些票由於不民主的選舉制度當然只能使它獲得八席議員，可是這個成就是黨的一大勝利，使它在伊朗歷史上第一次在1944年2月26日開的議會里獲得八個工人，農民和民主知識分子的代表，八個堅決的擁

护社会正义、反帝反法西斯的战士。此外，十四屆議會議員的成分是大地主(70)，大商人(13)，厂主(2)，記者(9)，律師(6)和教会人士(12)。許多不是大地主的議員都抱着成为大地主的願望，并且已經开始去实现这願望，他們在議會里的职权便利了这种願望的实现。所以議員摩薩台博士于1945年3月26日称議會为一个賊窩，并且在5月16日再一次的声称：“这是一个賊窩，我現在来証明这事”。

对于这些堕落分子，这八个人民黨議員始終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他們始終不懈地維護着工人階級和民族的利益，他們揭穿了統治階級的操縱行为并使人民相信人民黨的政策的正确性。他們虽沒有能使議會証明山也特·齐雅特·丁的竞选为非法，但他們却做到把这問題交給群众去討論；群众們在議會处理这个問題时用种种示威行动在議會門前表示他們的要求。

1944年8月1日第一屆人民黨代表大会便是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六十八个在地方會議上选出来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在日程表中列着一些組織上的問題，黨章的最后批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監察委員會委員的选举，以及一些政治問題，此外还有議會內党派对于政府的立場問題和对山也特·齐雅特·丁的党徒及其恐怖策略的斗争問題。

虽然代表內有比例上数目相当大的知識分子，工人还是占大多数，一个后来显出是帝国主义者十足狡猾的代言人的原形的，名叫馬列基的教員，对中央委員會采取敌对的立場，他利用他那部份正当的对組織上的缺点的批評作为对中央委員會委員誣蔑的借口，来暗中損害黨的統一。正如我們后来会看到，这馬列基所采取的策略在1948年事实上也引起了党的分裂，但是黨通过了一次全面的討論，揭穿了

这詭計的用意而克服了这次分裂。

反动派想利用党代表大会来宣傳他們的反党言論的這些初次企圖并沒有限碍大会工作的胜利。大会給予了討論被压迫群众运动的主要問題以及交流党在以往的斗争中所获得的經驗的机会,大会决定,在2月里逝世的党書記苏賴曼·莫生·爰斯剛德里死后不选举党領導、党章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改,中央委员会的三个委員被委任以領導的責任。

大会上有一个石油工業方面的工人作了一个关于英伊石油公司厂工处境的詳尽的报告。他的报告暗示党必須在国家的南部地区展开一个以“向南前进!”为口号的工作。

經過对政治情况的正确分析后代表大会把党的战略归结下列几点:

1. 国家最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
2. 主要的打击必須針对着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特別須針对着独裁政权的最积极的代表,山也特·齐雅特·丁。
3. 此外还必须联合一切民主力量来截断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路和保衛伊朗議会的宪法。

从这里,对于党就产生这样一項任务,便是,在国会的斗争場所里支持进步的少数,加强对亲英派多数的斗争。因此党便用尽一切方式支持了一个由具有自由思想的記者构成的組織,这个組織以“自由前綫”的名义号召向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山也特·齐雅特·丁作斗争。这个斗争单位的成就是巨大的;無数报章,甚至許多自由思想的議員,在群众的支持下,向英国的独裁政治候补者作坚强的斗争,这候补者終于被迫撕下对苏友好的假面具而向人民党和所有的民主組織采取公开的敌对态度。这样一来他便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任何立足点而英国人和伊朗的大地主也就势必

把他撤銷而將他的最親近的幫手沙埃特提升上來頂替他。為了在背後支撐他，又替他組成了一個以“愛拉得也·邁利”為名義的新黨，糾集了一批幾乎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國家高級官員和議員的分子會同着一些收買來的恐怖政策分子來向人民黨展開鬥爭。整個活動由英國人來領導，美國“專家”密爾斯包也支持他們，這個專家會由伊朗議會得到國家經濟和財政方面的種種特權。

沙埃特的這個“黨”在成立不久以後便着手去完成他的任務，用挑撥來給當權者以進攻人民黨的借口。恐怖政策的匪徒，經伊朗陸軍參謀部武裝和大地主們的經濟資助後，向人民黨和工會的辦事處襲擊，接着美國將領許瓦次考夫和美國“專家”密爾斯包就下逮捕和鎮壓黨的命令。在紅軍駐在地的北部地區他們想製造騷動；在帝國主義者們可以為所欲為的南部地區，他們向一切進步力量展開肆無忌憚的恐怖活動。

對於這種暴力統治，當時美國進步黨的領袖亨利·華萊士作這樣的聲明：“在兩個美國官員，阿倫和許瓦次考夫的幫助下，伊朗最進步的黨受到壓制和攻擊；工會遭襲擊，工會的辦事處被搗毀，伊朗自由運動的領袖遭迫害，許多人被監禁，有的被放逐，自由戰士則成百地被槍殺，成千地被驅逐出境到遼遠的地區去流浪挨餓”。1940年作為總統候選人贏得兩千多万票的亨利·華萊士認為他對“阿倫的謊言，說什麼美國反對干涉伊朗內政，引以為恥”。

可是所有這些暴行和報復手段卻遭遇到勞動人民堅強的反抗意志的回擊。黨和工會的領導使他們甚至於能夠通過一系列的罷工，如在馬詹德蘭、伊斯法罕和德黑蘭等地，而改善了他們的物質條件，這樣，他們的勝利又促使工會和

党的組織巩固起来并且加速在全国的發展。

人民黨議員在議會里利用每一个机会去揭發現存政权的根本缺点，統治階級的腐敗，政府的騙人的措施，政府通过国家机器濫用它的公开职能，揭露被压迫階層的苦难和不幸以及帝国主义者可怕的影响和該死的活动罪行。在伊朗議會政治史上人民黨議員的态度还是新鮮的事情，他們不跟腐敗的一面同流合污，表現着严格的紀律和絕对的純潔并且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出鮮明統一的立場。这在伊朗是从未有过的；人們已習見議員們都随着他們个人的利益和他們所服务的那一群的指示而改变态度。沙埃特的繼承人伊朗首相巴亚特，在1945年4月就这样声明过：“我承認，要在議會里获得和保持一个固定持久的多数是不容易的，事实上要接受議員們的一切提議，也就是說要答应私人的和不合法的要求对于一个有原則的大臣來說是很困难的，这些建議很少符合国家的利益”。

可是人民黨的議員在他們的两年議會任期內却始終保持一貫明确；在任何情況下都符合党的要求的态度。这种党綱与黨議員态度之間的一致使人民黨議員起一种大过于他們的数目所能决定的影响。当首相，巴亚特的繼承者，哈契米宣布他的政綱时，人民黨議員的有力的論据迫使他在二十天之后下台，有五位議員还作了十五小时的發言来揭穿隱藏在他的政綱里面的統治階級的計劃。人民黨的議員反对由議會地主階級多数組成的政府；并且有两次，一次是在巴亚特的例子上，一次是在加瓦·埃斯·薩丹乃的例子上，支持了反对派首相的竞选。人民黨議員的贊同任命这两个首相曾在党内引起剧烈的辯論，這場辯論党总書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大多数代表所采取的立場加以总结。

人民黨議員在議會中有力的鬥爭，黨在人民群眾中日益提高的威信，有組織的工人群眾越來越多的勝利向統治階級發出了警告。統治階級的每一次的政府都以向黨的鬥爭作為主要任務並且在這方面獲得英美帝國主義者心甘情願的贊助。在議會里多數派在山也特·齊雅特·丁的指使下阻撓了任何關於改善人民處境的決議。在這方面受帝國主義者庇護的統治階級的代表甚至採用非法的手段來裁減反帝議員的數目。這樣，後來的阿塞拜疆民主運動領袖阿塞拜疆議員畢席瓦利，和其他來自不在帝國主義者直接控制下進行選舉的北部省份的議員們的代表權就被宣布為無效。在議會之外山也特·齊雅特·丁的黨羽們的鬥爭採取了越來越露骨和越來越野蠻的形式，在鬥爭中他們越來越以法西斯的方式來對付所有的民主組織。他們暗殺人民黨黨員，襲擊工會和黨的辦事處。在耶斯特，一群收買來的流氓，在軍警各單位的支持下，於1945年2月3日縱火焚毀黨的辦事處；同樣事件也於1945年3月27日發生在伊斯法罕，這次他們還涌進黨主席的住所去謀害他，在伊斯法罕，山也特·齊雅特·丁的黨羽成立了一個所謂雇員與雇主的聯合組織，這裡面的份子拿着很高的酬報來干他們挑撥的勾當，並且被武裝着去迫害積極的工會會員和黨員。許多進步的報紙遭查封和禁止。在許多城市，如伊斯法罕、阿瓦士、哈馬丹、沙伊、賽姆納等地，迫害工人和搗毀工人俱樂部是司空見慣的事，因此工人被迫組織自衛。

這種內政的恐怖是由反蘇挑撥的重新活躍更為加劇。大戰結束前不久，伊朗反动派對納粹德國戰勝蘇聯的希望趨于破滅，統治階級以及帝國主義者認識到放肆的掠奪伊朗不僅受到人民黨日益增長的勢力的阻礙，也受到蘇聯在

伊朗不断扩大着的道德上的影响的阻碍。

苏联的友好态度和它对伊朗人民的，在最艰苦的战争年月里经过考验的无私的援助，以及红军在伊朗无可指摘的表现和绝不干涉内政等等使进行了二十年之久的反苏宣传在伊朗无地立足，使苏联的威信空前提高。和南部地区英国人搜刮伊朗自己已感不敷的粮食相对照，苏联政府供给伊朗人民以小麦、白糖和棉制品；甚至反动报纸也不得不 在 1941 至 1944 年间一再指出苏军士兵有纪律的表现和别国部队，尤其是美军的越轨行动的区别。

苏联的这种道德上的优势，这种足以加强伊朗人民反帝斗争的因素是反动派的眼中钉，于是他们除了恐怖手段外又展开了对苏联的放肆的诬蔑。反动报纸开始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指示下重新散播战前那样的毁谤苏联的种种谎话。

人民党完全明白这些恐怖和诽谤进攻的背景：帝国主义列强在进行巩固和扩展他们在伊朗的特权。事实上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都在上面已提到过的密尔斯包的斡旋下和伊朗政府极度秘密地进行谈判来攫取对伊朗北部和东南部石油矿的掠夺权。他们觉得沙埃特政府是一个热心的谈判对手，也觉得 1944 年 8 月 8 日关于以“门户开放”为基础的自由入境和无阻地攫取生产地区原料的华盛顿条约是一个扩张要求的外交工具。这种扩张要求在政治上受到以人民党为代表的伊朗群众的阻止，在外交上受到苏联的阻止。人民党在议会中代表伊朗人民要求废止一切特权，而根据 1921 年 2 月 26 日伊苏条约已经放弃所有它在伊北地区的权利和特权的苏联则提醒伊朗政府，上述条约，是不准外国在这部分地区获得特权的。

这个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秘密談判的泄露，配合上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卡夫塔拉德色在德黑兰所采取的步骤引起了全国地区的强烈抗議風潮，这浪潮冲倒了沙埃特政府，从政治舞台上扫除了伊朗的真正掌权人山也特·齐雅特·丁并迫使美国牽綫人密尔斯包离开伊朗。这是人民党的一大胜利，人民党議員随后就对巴亚特的少数內閣表示贊同。巴亚特表示反对他的前任人的政策；可是虽然巴亚特的作为落后于他的諾言，他在三个月的任期后，于1945年4月初仍做了多数派和伊朗国王的陰謀的牺牲品而讓位給八十岁的哈契米，如果說巴亚特曾企圖反抗議會的多數派而施政的話，那么哈契米是在企圖反抗大多数人民而施政。經二十天議會內激烈的辯論，劳动人民群众，以他們在議會內的先鋒为代表，迫使他下台。

統治階級于是就物色“强有力的人”，他們認為沙德便是这样一个人。他是資格最老的反动派之一，曾于1907至1911年，伊朗資產階級革命期間以法官的身份負責处决無数伊朗爱国志士。他的受命組織新閣势必更要加剧当前的政治緊張局面。人民党和自由派的反对党鑒于議會多數派决心要把沙德抬出来，只有采取阻撓这一着，一当沙德进入會議厅要給大家介紹他的閣員时，人民党議員和自由党人便离开會場，这样全場就不能进行表决而沙德政府势必在未經議會通过的情况下执了几个月的政。

沙德的使命和目的是顧复人民党。閣員會議授命陸軍參謀长，那个我們已經領教过的，臭名远揚的阿尔發將軍，去向人民党和工会进行恐怖总攻击，在伊朗北部地区到处組織了武装匪徒，受着秘密代理人和大地主們的指揮，他們向有組織的工人团体，特别是人民党黨員和他們的办事处

进行謀害和縱火。1945年8月人民党在德黑兰的中央办事处和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大厦被軍隊和宪兵单位占領。党机关报“領袖报”^①和工会报刊“胜利报”以及四十种其他的报章被禁止。同时他們还动員了游牧民族来反对党，拿武装匪徒的胡作非为作借口，他們在1945年7月对伊斯法罕宣布戒严令。二百多个人民党员被逮捕，党办事处被軍隊占領。在馬詹德兰阿尔發將軍的恐怖匪徒襲击了沙伊城这个紡織工業的中心，并且縱火焚毀了工人区。

工人們不但沒有被这种恐怖吓倒，反进而采取对抗步驟。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其他城市的大規模示威游行中，劳动群众向政府有組織的恐怖行为提出抗議并且要求沙德下台。在馬詹德兰，工人們起而反抗并給阿尔發將軍的武装匪徒以歼灭性的打击。他們占領了馬詹德兰和葛尔干的許多城市并在政府权力机关撤逃的地方担任起保衛治安和公用事業的任务。

在伊朗各省統治階級的恐怖活动再也沒有比在阿塞拜疆發展得更瘋狂野蛮了。当这省人民团結在畢席瓦利領導的新建立的阿塞拜疆民主党的周圍而向政府、議會和伊朗国王打电报提出他們的要求时，沙德首相在1945年8月15日表示：“对于这种电报和上千个类似的电报我根本置之不理。”但是他不久便看到，这种蔑視群众的呼声本身包含着危險。这种藐視的态度在1945年11月引起了阿塞拜疆人民在阿塞拜疆民主党領導下的暴动。所有的民主組織，人民党也在內，都投入了这个民主运动。在1945年11月20和21日召开的會議上阿塞拜疆人民，以来自該省所有地区的

^① “領袖报” (Rahbar) 是人民党最早的机关报，后改名为“真理报” (Razm)。——譯者

七百四十四位代表的名义，要求在伊朗国家的范围内实行自治，举行一个省议会的选举，组织一个人民政府来自治管理省内一切事务并且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学校教育。在接着举行的、伊朗历史上第一次也有妇女参加的几次选举中，选出了这个省议会的一百零一个议员，这议会于1945年12月12日首次召集会议并给阿塞拜疆成立了一个自治政府。畢席瓦利被选为这省政府的主席。同样的政府也在加西·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在库尔德斯坦成立。

沙德镇压民主运动的努力的失败迫使这个“强有力的人”下台。统治阶级把希望又寄托在哈契米身上，哈契米想把阿塞拜疆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但当这一着失败后，他不得不在两个月之后下台。

于是统治阶级看出人民的力量不容完全忽视，因此他们便把政治生命中各个不同的力量单位集中起来使成一个总力量，这个力量足以给一个以后的，他们心目中的方向转变大开方便之门。这种总力量的具体代表是盖凡姆·埃斯·薩丹乃。

他的竞选使人民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人民党总书记拉德馬內什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对这事作了一个经党批准的声明，声明里说：“反动派和殖民统治者們企图利用弱点及严重的危机把我们国家完全拖进一个反苏集团中去，在全国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体并采取敌视人民的措施，这种措施无疑地有给我们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抱着建立对苏友好关系，攻击国际处理伊朗问题，不完全赞同统治阶级的独裁倾向和办法，并拥护不顾一切地消灭对苏关系不明朗，把阿塞拜疆问题当作伊朗内政，须以和平方式解决这种立场的”盖凡姆势必“引起议会反对

派和我們的注意。”根据这些理由“我們的議員們同意盖凡姆的竞选是那时候唯一可能的竞选，同时他們也完全知道他的反动的思想根源并且認識到，基于他过去的政治历史是不能担保他会滿足民族的要求和热望的。”

統治階級只是因为眼前的危机而才認為盖凡姆还不太坏的，这一点可从英美干涉使危机減輕后所表現的情形看得出来。仗着議會中有英美撑腰的多数，統治階級就想阻止成立一个以盖凡姆为首的政府。直到動員了人民群眾，他才能当上首相。在他1946年1月的政綱附件里他已表示要到莫斯科去和苏联政府商談悬案。

人民党許給盖凡姆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要看他在实施他向議會提出的政綱时努力的程度而定。事实上在他执政的初期，看起来他似乎要和民主組織合作并和苏联树立友好关系。一系列的內政改革——关于这些改革，我下面还要談到——以及1946年4月4日和苏联訂的关于开办一个苏伊合股石油公司的协定都豫示这样的一个方面，按照这个协定，伊朗在头二十五年内获公司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九，在后二十五年内获百分之五十。这个协定加强了伊朗人民对于他們偉大的邻邦的同情，因为苏联的建議与只允許給伊朗百分之十六的收入的英伊石油公司的表現之間的差別是瞞不过广大群众的。此外，苏方的認定阿塞拜疆問題是伊朗的內政問題，和苏軍从伊朗的撤退都揭穿了帝国主义者所說的苏联对伊朗的“領土要求”那一套話的扯謊挑撥的真相。

4月2日政府根据內閣會議的决定宣布阿塞拜疆人民的要求是合法的。伊朗政府和阿塞拜疆临时政府在德黑兰和大不里士进行談判后，在1946年6月13日簽訂了一項条

約，这条約的十五点是建立在4月2日的指令上的。

这一重大的，使阿塞拜疆农民成为他們所耕种的土地的合法主人的措施另因一項关于普遍减低地租百分之十五的指令和一条劳动法的頒布而得到一定的补充。

所有这些成就要是沒有人民党方面的支持将都成为不可能。这点在伊朗劳动人民看来是毫無疑問的，因此这些成就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使动员群众要求社会正义和民族独立得到进一步的开展。

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在农联内环繞着“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进行。工会运动自从石油工人工会組織加入了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之后也增强了冲击力，而民族运动則籠罩着全体人民并在强有力的示威游行中提出了“伊朗屬于伊朗人民”，“打倒殖民地統治”！“宣布英国人石油特权無效！”，“伊朗人民独立民主斗争的領導，人民党万岁！”等口号。1946年5月1日的示威游行也在这些口号下进行，这些示威，据官方估計，有七十多万劳动人民参加。

民主运动蓬勃的高漲当然引起英美帝国主义者們極度的不安，因此他們想尽办法来阻撓它，他們利用久已經常用來对付抗命的政府的游牧民族作鎮压工具。現在为了用他們来对付劳动群众，那个声名狼藉的英国秘密勾当的代理人，茄可克少校糾合了一些来自苏塞斯坦地区的不足道的阿拉伯酋长，成立了一个所謂“联合会”。1946年6月23日，这些部落酋长举行了一个会，会上他們提出苏塞斯坦自治和加入伊拉克的要求。他們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遵照英国人的旨意来压迫盖凡姆，使他改变政策；同时对民主組織，特別对工会进行武装襲击来阻遏工人群众的活动能力。

这袭击造成了上面提到的 1946 年 7 月 15 日的流血事件。

当所有这些煽动由于党和工会的警觉而告失败后，英国的工党政府决定用武力支持英国石油托拉斯。1946 年 7 月 17 日有三艘战斗舰出现在波斯湾而同时英国军队在阿巴且对西柏的伊朗边境布下了障地，英方并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石油地区情势有新的发展而使英国利益受到威胁时，英国巡洋舰将采取行动。这种威胁也使美国石油大王计划起行动来。乔治·阿侬，杜鲁门的私人朋友，当时美国驻南斯拉夫公使，赶到德黑兰，用外交手腕来支持英国的炮舰威胁政策。美国这样做，不但是因为他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基于 1944 年 9 月 24 日在伦敦签订的英美石油协定，和 1946 年间由秘密谈判产生的英美协定。

阿侬看清楚，要把群众和盖凡姆分开是很难的，但是非把盖凡姆和群众分开不可。他发现首相的出身，首相的阶级性的惧怕群众是他的这种努力的有利条件；事后证明，阿侬并没有欺骗了自己。

1946 年 7 月盖凡姆成立了一个他自己的党，“民主党”，这在他起先也不过是使他在未来的竞选里达到目的的工具，可是后来，特别是当压倒多数的群众投向人民党后，越来越成为反动派的渊藪，因为群众的这种倾向使他感觉到个人努力没有前途，虽然如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仍赞同盖凡姆的提议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为了”正如中央委员会在 8 月 4 日的一个公报里所表示的那样，“粉碎那些始终在和民主运动作消极抵抗，其目的在剥削和虐杀劳动人民的份子的阴谋”，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瞩目于伊朗国王和一些丧失了所有权的，在阿塞拜疆和其他地方策划武装暴动的大地主。此外中央委员会所着重的是要通过发展工业和进行

教育、衛生、法律方面的改革等实际行动来証明党不但能批評而且也能做出建設性的工作来，人民党还要通过在这个伊朗的党和阿塞拜疆的民主党以及盖凡姆的民主党之間建立起一个联盟来替未来的新选举的共同綱領打下基础。

人民党党员只参加了七十三天的政府，可是他們在反抗內閣會議內大地主代表的破坏活动中所表現的勇敢行动将永远不会磨灭地留在伊朗劳动群众的記憶中，人民党閣員所管理的經濟、教育和衛生事業各部門內都根絕了偷盜怠工等事情，誠实的官員得到鼓励，浪費現象被消灭。尽管財政大臣反对，教育部仍額外爭取到六千万里尔，衛生部爭取到两千万里尔供支配。国民經濟大臣号召国营工厂工人提高生产，工人們热烈地响应这号召。在人民党閣員任职教育部期間，教师的社会处境大大地改善而学校中教席的数目也增加了一万两千个。向来連那点有限的經費也从未用尽过的衛生部也动員了一切可支配的物力来提高国民健康。

所有这些足以徹底改变伊朗情况的措施使帝国主义者日益感到不安，早在联合政府成立后的头几天內英国軍隊就从孟买开到伊朗边境，英帝国主义者也并不隱瞞他們的軍事干涉伊朗的企圖，1946年8月5日英国外交部發言人声称为了应付人們很乐意看到它被避免的事件，“采取防衛措施是必要的，如果伊朗政府能維持秩序，就沒有引起不安的理由”，8月8日英国外交部在一公报內更詳細地說明这种軍事行动，这里英国政府承認軍事干涉的目的不在維持秩序而在保障石油利益。同一公报內还着重指出，伊朗石油“对未来的世界福利須起一重要的作用”，同时英国的代理人加剧了对在苏塞斯坦的阿拉伯游牧民族的挑陵，伊拉

克的反动报纸要求把这地区归并给伊拉克，这些部落的一些酋长打电报给阿拉伯联盟要求支持他们，“反抗人民党和争取苏塞斯坦自治”，在这些捣乱勾当中美国人还夹杂了些謠言，說人民党正在策划夺取政权的政变。

为了竭尽挑撥之能事，据美联社消息伊朗駐华盛顿公使在8月5日还發表声明，說苏联把军队集中在北部伊苏边界来答复英国军队的駐扎南部，这是一个毫無根据的臆說。

不顧或正鑒于伊朗人民对于帝国主義者的逐鹿一致表示憤慨，盖凡姆对他自己的勇气，或正确一点說，对人民运动的力量害怕起来，这个运动他不願意看作是一个摧毁性的浪潮，而只願意看作是一条从容不迫的溪流，其强度正足以带动他的个人野心計劃，也不向他的閣員們諮詢，他就向华盛顿和倫敦提出一备忘录，保証决心“不使石油公司利益受損害”，他要求英国军队从伊朗边境撤退来作为交換条件，为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平息輿論，特别是左派的”。

盖凡姆的讓步态度鼓励了帝国主義者直接提出撤除政府內人民党閣員的要求，他們是挽美国駐德黑兰公使乔治·阿侖作代言人的。帝国主義者同时还策动巴哈第亚族和喀許喀埃族的叛乱来加强这个要求，这要求的滿足势必使盖凡姆脱离群众因此丧失了他未来的选举前途。

早在8月中旬关于英国的秘密事务員在巴哈第亚王公駐在地，伊斯法罕积极活动的警报已在德黑兰获得証实，8月底政府获得一項文件，是关于一次在巴哈第亚領地上开的“馬熙家會議”的，会上有駐伊斯法罕英国总領事特洛特参加。他們策划在9月24日各部落联合向政府發动叛

变，由臭名远扬的英国代理人做后盾。巴哈第亚人须占领伊斯法罕城，喀许喀埃人须占领设刺子城和伊朗南部的各港口，摧毁党和工会的组织并提出这些地区自治的要求，苏塞斯坦的孤立将使他們能做到使石油地区脱离伊朗，并入伊拉克。

虽然获悉了这种计划，盖凡姆却只以拘捕了几个巴哈第亚人的酋长为满足，这样，9月24日喀许喀埃王公們果真按计划开始暴动，在占领卡齐伦和布什尔后，暴动者就转向设刺子。盖凡姆絕没想到去加强的那点单薄的守軍，只作了些微弱的抵抗，于是叛徒們几乎能毫無阻擋地向居民肆虐，劫掠，杀害，縱火焚毁城中各区。軍队受了他們的美國顧問的影响，对这事竟作壁上观，而盖凡姆首相則一味依賴着他的亲英派（作战部长），国防大臣把人民党閣員們对采取紧急措施的坚决要求置之不理，却把宝贵的时刻浪费在和跟叛徒們有勾結的文武官員的談判上，在这个时候暴徒們却从英国船上源源得到武器彈藥的补充。

最后盖凡姆竟違反了內閣會議的決議同意游牧部落酋长自治的要求并表示准备許給他們和以前許給阿塞拜疆民主党人一样的权利，他甚至还向他們保證辞职并組織一个沒有人民党参加的新閣。

他以同样的方式阻止了关于一个他的党和不同民主党派的共同选举綱領的商談；不但如此，他的那个反动派已占上風的党甚至已發展到向人民党的組織，向工会搗乱，治安机关对这事特別予以庇护。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閣員不可能繼續和盖凡姆內閣合作；于是在1946年10月16日依照中央委员会一項決議，全体退出政府。次日盖凡姆向国王提出辞呈并立即受命組

織新閣，这样就証明了盖凡姆已和統治階級妥協并拿民主勢力对他的信任来換取統治階級的信任，从此他被驅使去和扶植他上台的力量作不妥協的斗争。

曾在盖凡姆閣內的伊拉茲·爱斯剛德里在他概述人民党的历史中講到人民党的發展时說：“英美帝国主义者加在像盖凡姆那样一个人，那样一个由于封建出身和階級利益而不可能真正同情群众运动的人身上的压力是不会不起作用的；如果人民党和民主組織好好利用 1946 年初的有利条件而逼迫盖凡姆貫徹新选举的話，也許这样的一种失敗可以避免。太相信盖凡姆会本着他的国际义务并依据 4 月 4 日的伊苏协定在極短期間举行选举和过高地估价了盖凡姆和国王之間的意見分歧，使民主运动失去寶貴的时机，而使反动派有机会在外国的支持下团結起来組成一条共同反民主陣綫”。

現在盖凡姆和他背后以国王为首的大地主們占着优势而可以用双倍的力量来向劳动人民进行斗争了，在馬詹德兰、吉兰和苏塞斯坦軍警方面向党 and 工会进行着新的恐怖行为，党和工会的俱乐部和会所一再遭受破坏，好几百名工人遭逮捕并剥夺职位。在馬拉叶，这个进行强大农民运动的小城市，有十个农民遭杀害。

所有这些暴行無非說明在准备对阿塞拜疆进行侵略，这事在 1946 年 11 月 25 日正式实现，盖凡姆借口政府和阿塞拜疆的协定中某一段已遭破坏，下令軍隊占領桑疆城，过了几天接着来的便是向阿塞拜疆进襲的命令，这回用来掩飾的話是軍事行动只是在保障該省的自由选举能順利进行。

这种行动完全是在美国駐德黑兰公使乔治·阿侖的完

全同意——如果不是指使——下进行的，不久以前他曾
在一次谈话中公开表示，伊朗政府为了保障选举而派遣军队到阿塞拜疆的决定是很自然的并且得到美国政府充分的支持。这种支持并不希奇，因为关于一方是英伊石油公司另一方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之間的一項秘密合同的談判，面临着結束而有关的合同的簽訂应在1946年12月26日举行，因此必須排斥阿塞拜疆的不但阻碍英国石油公司在南伊朗的利益而且也妨害美国托拉斯的利益的行为。英国人已暗示外界准备用駐伊朗边境的英国军队占領伊朗。12月3日英国外交部的一位發言人威胁着說：“英国公民生命财产如遭受危害，英政府相信有理由作单方面的决定。”

所有这些威胁一点都沒有影响到阿塞拜疆人民用同样的手段来击退伊朗政府军的軍事侵略，和为保衛他們来自德黑兰和大不里士之間的協定的权利而斗争的决心。对于伊朗情势和帝国主义者企圖作了一番正确的分析后，阿塞拜疆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認識到，在阿塞拜疆的一場剧烈的抵抗会引起一次全伊朗的内战，这内战势必招致外国军队的干涉而危害到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縱使这些極端的后果不实现，一場内战也将給予帝国主义者以他們所希望的、使石油区脱离伊朗的机会。既然这样的一种脱离对于伊朗的革命的反帝运动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阿塞拜疆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便决定作暫时的撤退。1946年12月12日省代表大会在党的全体领导人員出席之下就作出停止武装抵抗的決議。

关于这項決議，伊拉茲·爱斯剛德里写道：“这个对伊朗民主运动意味着一次絕大讓步的决定仍然有它極端严格

的革命邏輯，是依据着对于国际形势和伊朗那一时期的斗争的特殊情况的正确分析而作出的”。

“伊朗军队”的“胜利进军”是一幕恐怖的兽性的发泄，这批军队在敌视人民的头子的率领下已堕落成为一支英美的雇佣军。脱去军纪约束的乱兵劫掠，残杀，破坏，奸淫，他们跟那些受地主雇用来扑击农民、杀害农民、奸淫他们的妻子、烧毁他们的房舍的武装匪徒毫无差别，这班由封建主动员来的暴民在帝国主义的秘密代理人 and 伊朗军警的指挥下胡作非为了十五天之久，男人们在他们的妻女面前受到虐待狂的摧残，他们被挖去眼睛，砍掉手足，有七百六十多人遭绞杀和枪杀。

人们谈到这些暴行时不得不起许多满怀着伊朗无产阶级最后胜利的信心而从容就义的伊朗工人领袖们的英雄气概。例如工人达达希·他奇沙得，当他已站在行刑架上时，转过身来向人民高呼民主和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还有阿西米将军和他那二十六位青年朋友，他们脱离了伊朗军队赶到大不里士去声援阿塞拜疆的人民运动并且歌唱着在行刑队的枪弹下倒下来。还有那年青的弗来因·埃不拉希姆经过六个月最残酷的拷虐都没有屈服而出卖他的祖国和党，却英勇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这些例子都是伊朗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但对于党，对于伊朗的民族运动将永远成为一股灌输人们以永久的责任感和不可战胜的希望源泉。

屠杀阿塞拜疆爱国志士的罪魁祸首是乔治·阿侬，这个杜鲁门的私交，他称这种有组织的谋杀为“自由选举”，没有他的同意，国王和盖凡姆不敢做得这样绝灭人性。除他外国王便是历史上的主要被告，所有这些谋杀事件归根结

底都出于他的个人命令，这是某一位重要的政界人物向我担保着說的，他的姓名我不能宣布。

恐怖籠罩了全国，統治階級的爪牙开始在各处向进步力量进行迫害，監禁和放逐的事件不断地增加。在德黑兰党的机关报“領袖报”和工会的报刊“胜利报”都遭禁止，在喀斯文，葛尔干，班达沙和設刺子以及許多別的城市盖凡姆的“民主党”党羽和宪警联合起来搗毀人民党的办事处，在伊斯法罕两百多的工人被逮捕，在德黑兰好几百不願加入由政府組織的新工会的工人被解雇而流浪街头。

一整年之久反动派在整个战綫上肆虐，却不能消灭民主运动，1947年9月美国“牛”許瓦次考夫接着赶往阿塞拜疆領導起一个运动，在这一次行动里两万多个阿塞拜疆民主党黨員被捕进伊朗南部的高兰姆沙尔集中营。

經過这些准备工作后反动派觉得他們的力量已經強得足以在伊朗进行“自由选举”了。他們把伊朗人民的最愚蠢却又最殘暴的叛徒和統治階級的最卑鄙無耻的代表送进議會，議會于1947年6月17日宣告開幕，于10月22日宣布伊苏条約無效。

人民党却始終存在着。固然四十家報紙已遭封閉，但是立刻有許多新報紙用別的名称出現了，新出現的報紙所維護的宗旨正是先前被封閉的報紙所擁護的，而先前的報紙就是因为維護这些宗旨而被封閉。于是統治階級就試想新的方法来最后粉碎人民党，尤其当乔治·阿侖在1947年1月通知伊朗政府，說明只有在人民党和工会在伊朗政界中完全消灭的条件下伊朗政府才有获得美国貸款的希望时，他們对这种方法更感到迫切需要了。

当人們發現从外面把人民党赶跑的企圖無效时他們就

轉而試圖從內部來摧毀它。他們把一個實際上從倫敦找來的“受過馬克思主義思想訓練的”煽動分子弄進黨內；這人拉攏了一些好發牢騷者、胆小者和動搖分子，他的戰略是要用所謂“自由批評”來破壞黨組織。做這些一半是被政府的報復手段吓倒的分子的號筒的，便是那個已經提到過的教員馬列基，他極力利用一部份黨員的動搖性來實現他自己的個人主義的目的。他們用“改革者”或“先鋒”等名義結成集團而把一切都用來打擊黨員對於黨領導的信任。

這個“受過馬克思主義思想訓練”的牽綫者和他的傀儡馬列基在黨內所能憑仗的基礎是有限制的，因為經過軍警的野蠻的鎮壓手段，許多期待着黨眼前就要得到的勝利而加入黨的機會主義者又都脫離了。雖然這樣一來黨內反黨分子的活动圈子已很狹窄，這個情況對於他們還是有利的，因為，有些被警察機關追捕的黨的真正領袖已不再能公開地用自己的政治力量給分化者們以決定性的打擊。

分化者企圖把阿塞拜疆運動失敗的責任加在人民黨中央委員會頭上來要求中央委員會引咎辭職而把黨領導的一切任務轉移給包括八個黨員的一個小組，其中大部分還得由他們來推荐。

1946年12月20日中央委員會在一次秘密會議上對這些企圖加以分析。雖然這些分化分子的意圖是非常的明顯，中央委員會仍決定不跟他們作最後的鬥爭，這是不使一種關於黨內鬥爭的流言，危害到黨對於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擁護者所進行的解釋進程，因為他們對阿塞拜疆的失敗感到失望。並且黨在這個時刻也還沒獲得關於這些離間者和帝國主義分子直接勾結的最後證據。因此中央委員會，鑒於有些領導人員暫時還不能夠執行他們在黨內的職能，

就在这次全体中央委員出席的会上决定：

1. 对分化分子企圖瓦解中央委員會和要求信賴他們的候選人員的建議表示不接受。

2. 中央委員會把取權移交給一个由七个黨員組成的执行委員會。执行委員會委員須由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全体委員，暨德黑兰省委員會五个委員选举。

3. 临时执行委員會須由中央委員會三个委員，監察委員會三个委員和德黑兰委員會一个委員組成。

4. 召开一次所有党的積極分子的大会，来分析和解釋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各項決議。

在这个接着便举行的党的積極分子大会上，大多数出席者一致表示同意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并坚决地击退分化分子的詭計。

临时执行委員會的选举在1946年12月25日举行。随着这次选举人民党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頁。正如党总書記拉德馬內什博士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由于1946年12月事件后的艰难条件，1947年初临时委員會第一个号召是有一些严重的錯誤。除了对党直到那时所完成的工作的錯誤估价，过估了反对派不合事实的批評，它也錯誤地估計了当前足以危害党的繼續發展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思想上的偏差，不过这些錯誤都还不是根深蒂固；执行委員會在1947年1月9日借选举新議會的机会所發出的另一次号召中都加以改正，党正式宣布：党将抵制这次选举并将不承認由这次选举产生的新議會是合法的。

在大部分的省城里軍警当局解散了当地的委員會，拘捕并流放了許多党的領袖，但在德黑兰党一直还維持着合法存在；統治階級相信，在伊朗首都对于党可以不采取会引

起麻煩的禁止手段。他們相信，伊朗有組織的群眾運動最後終會被擊破，而人民黨也不會再在這個國家的政界上起決定性的作用。

擺在臨時執行委員會面前的第一項任務便是團結一切分散了的力量，並且使組織適應新情況。黨逐漸在對一個新的地下時期作準備。很快地有一個新的報紙在總書記拉德馬內什領導下以“馬尔多姆”的名稱代替了已查封的“領袖報”而發刊。和各省建立緊密的連系獲得成功，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和省的聯繫只能用地下的方式，基本上做到了鞏固黨的組織。六個月之後黨又已在德黑蘭和別省份掌握了十二家以上的報紙，黨的內部刊物還不算在內。在阿塞拜疆事件發生後一年內，黨又獲得並鞏固了一大部分已失去的地盤。黨能夠重新把它的力量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並且又能在新興的有組織的人民運動中處於領導的地位。這情況表現在人民群眾向由美國人支持並監督的所謂七年計劃所作的鬥爭中。

這一切進展都已獲得了，雖然分化分子還繼續着他們的破壞勾當並想盡辦法來摧毀黨，他們曉得時間拖長於他們不利，於是他們就鼓動短期內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想在大會上最後實現他們的計劃。

直到現在，黨領導對這個集團一直採取保守的態度，為的是保護黨的統一，為的是給同情分化份子和他們的號筒、馬列基教員的健康的知識分子以覺悟的機會；可是當分化份子在1947年初舉行的德黑蘭會議上竟然做到把他們的一些黨羽打入德黑蘭省委員會的領導機構中去時，這就使臨時執行委員會覺悟到，有必要採取斷然的措施的時候到了，同時破壞分子在德黑蘭委員會內已獲得可以系統地展

开他們的反党宣傳和破坏党的工作的据点。临时执行委员会就对分化分子的首領們作了一次檢查，党馬上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文件足以有力地証明这些分子的破坏陰謀和他們跟帝国主义代理人員的勾結，这样一揭發，“那受过馬克思主义思想訓練”的挑撥者和他的帮手馬列基就無路可走，只有轉入公开向党的統一进攻之一途。

这件事發生在1948年1月3日，这回分化分子以“伊朗群众社会主义小組”的姿态表示了自己的立場，保留了“人民”这个名詞，他們就想挑撥人民党黨員和久經斗争考驗的党的团結来达到他們卑鄙的目的。执行委员会用这样一个决定来答复这种出卖党的行为：它要求每个黨員——除了已經不在党內的馬列基教員外——对党表示忠誠；同时执行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德黑兰全体党的积极分子大会来討論分化分子所發表的声明。执行委员会發言人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分化分子的行动意味着一个有背景的对党的陰謀进攻，他們已通过向执行委员会散布謠言来系統地造成一种不信任的空气，几乎所有出席的人都站到执行委员会的一边而要求对叛党的分裂企圖采取坚决的措施。在一次普遍征詢德黑兰党组织全体黨員意見时，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八經征詢的人都批判了破坏統一的党的陰謀，其余的人則要求补充性的解釋。在一次特別會議里他們听到了这种解釋，于是在这些少数的黨員中間絕大部分的人也都跟分化分子划清了界限。1948年1月6日在执行委员会一个決議的內容中有这样一部分：

根据执行委员会所得到的确鑿無疑的情报和所作的不容推翻的断定，分化活动是一个已在党的內部，由“前衛者”秘密集团分子，在馬列基的指使下策划了一年之久的陰謀

活动的結果，其目的是在从内部打垮党并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前进党”为幌子的煽动性的組織。分化活动是党内帝国主义代理人秘密活动的結果，这些代理人非常精通地懂得怎样去利用一切思想上的偏差和个人主义的以及个人野心的倾向来直接和間接擴張势力。这样，分化活动本質上就是一种出卖党的行为而参与这活动的人都已有意或無意地做了出卖党、党的战术和党的战略的行为。

这个揭發在党员中間，特别是在那些由不足五十个知識分子做骨干的叛徒集团还根本沒有取得据点的省份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执行委员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严厉申斥分化分子的陰謀。

这批分子却在这个时候以“伊朗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名义成立了党派。人民党宣布党和这个集团毫無关系并且指示党员們断絕和这些薩拉盖特、尤霍克斯和勃魯姆之流的“滑稽把戏脚色”的联系，抵制他們，并且到处揭發他們。馬上就有一些别的民主組織也表明反对他們的立場。联合工会总会的一个声明坚决表示：在这样一个时候，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向伊朗自由运动和工人組織进攻并用尽方法来消灭伊朗民主运动的时候，总会認為任何在伊朗工人和自由战士中間进行的分裂活动，不論它怎样微小，都是有危害性的。总会因此对于这个声明（“前衛者”的声明）的起草人所采取的行动表示遺憾和不同意，总会支持人民党，人民党在它輝煌的斗争中替工人阶级一切合法的要求辯护，并且六年来一直表現着对于伊朗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正义的态度。

經過了这样的孤立化和被揭穿了替反动派作工具的叛逆的本質，分化分子集团就立刻銷声匿迹。那个英国挑撥

分子也就回到倫敦，而他的幫手馬列基便轉到伊朗工人階級最凶惡的敵人陣營里去安身。

統治階級及其同一聯盟帝國主義者這一次的消滅人民黨的企圖就以這樣的一個失敗而告終。黨通過這一次鬥爭甚至更顯得堅強了，並且獲得的結果是，所有伊朗的自由鬥士都加倍地警惕起來並且更緊密地團結在伊朗自由鬥爭的黨、人民黨的周圍。

人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948年4月25日在德黑蘭開幕，作為這次偉大的勝利的標志，這次大會由伊朗各地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參加。這個在半地下活動的條件下舉行的代表大會肅清了反黨思想的最後殘余。

總書記拉德馬內什向全體代表做了總結報告後，代表分為六個商討小組進行大會的主要工作，他們詳細地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特別是與這次分化有關的問題，以及宣傳問題，教育問題，婦女問題，還有財政問題，新黨章和監察委員會的職能，以及黨在工人、農民和青年群眾中的工作問題。在深入的討論這些問題之後商討小組擬出有關的決定，再交付全體代表討論，然後付表決。

總書記拉德馬內什在他的不斷被歡呼聲打斷的報告中分析了國際局勢及其對於伊朗情況的反應，然後對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的四十四個月內的工作作一個回顧，他的報告主要的是在分析人民黨在議會工作中的政治路線，阿塞拜疆問題，英美帝國主義者對伊朗內政的干涉，人民黨黨員跟政府的合作和執行委員會的成立，此外答复了許多黨員提出的，直到那時他們還不完全明了的問題。同時總書記做了一個非常嚴格的自我批評並且證明，偉大的成就只是由於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及其同盟者的不可征服的犧牲精

神而获得的。

大会作了一系列的党章修改，这样党章就能适应新的情况，吸收新党员的条件更严格了，保证人的责任明确了，候补期由三个月延长到六个月。新党章在原则上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证党的先锋的本质，即是，党的行列内只容纳觉悟最高的社会进步力量，至于对社会觉悟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劳动人民只给他们以跟民主的群众组织合作的机会，同时在新党章里民主集中的原则和党内民主的原则更巩固地确定下来。

贯彻着一个一致的斗争精神的代表大会从开除两个党员这件事上表明了保护党的纯洁的决心，这两个党员有一段时期是他们省里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并曾表现出一些缺点，大会最后选举出以拉德马内什博士为首的新中央委员会。

这里似乎可以简短地介绍一下这位伊朗独立运动中杰出战士的历史，他于1905年生在了希疆城，这个有名的封建主盖凡姆的茶业中心，他的父亲是一个中等地主，念完家乡的小学后他就在1922年到德黑兰去，那里他进了一所高级学校，直到1927年至1928年伊朗政府派遣第一批一百个学生到欧洲去时，拉德马内什也在里面，他的路线是经过莫斯科到法国，在莫斯科他有机会和其他的伊朗学生在列宁墓前正式地献上花圈，在格兰诺不勒附近的阿奈西他在一所供住宿的学校里学会了当地的语言，接着他就在卡恩直到1932年读完了工科大学，然后在巴黎念物理学来继续他的科学教育，1936年答辩了他的论文“关于石英在高温和受着紫外线的影响下的电导能力”，并且“得到奖励”。此外他也在巴黎科学院公报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研究，他在亨利

邦因嘎雷学院考他的物理学考试，在这学院里除了别的先生外，有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路易·得·布劳歇里埃和有名的保罗·郎之万都是他的先生，这个学院以进步的倾向著名，这种倾向体现在郎之万和约里奥—居里这两位教授身上，1936年2月拉德马内什回到德黑兰，过了一些时候他在德黑兰的工业大学里当教授，六个月之后，1937年2月，他就遭逮捕。

他十六岁的时候已开始他的政治活动，那时，在1921年，他以一个武装革命斗士的姿态，在吉兰的起义群众行列里参加战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德黑兰，加入了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他是德黑兰大中學生組織的奠基人之一，并且以大学生的身份在设刺子、布希尔和在一些南伊朗港口城市作出了重要的政治工作，在欧洲期间他和伊朗的革命学生团体发生联系，这些学生在那时主要的是在柏林聚会，这样他就结识了伊拉兹·爱斯刚德里，在德黑兰他和爱朝尼博士发生政治上的联系。

1941年，当同盟军进入伊朗的时候，他便从监狱里解放出来，9月里他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了人民党，此后他便一直是党的领导分子，他是第一次德黑兰委员会的委员，也是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作为党的组织领导者他建立了党的青年组织，作为联合工会总会的会员他巩固了党和工会会员群众的联系，在第一届代表大会和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他都作了总结报告，第二届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他为党总书记，1943年至1945年他是伊朗议会中党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46年石油工人罢工期间他代表联合工会总会参加国家混合委员会来调停工人与英伊石油公司间的争执。

無論黨把他擺在什麼位置上，他始終表現出極度堅強的原則性和對人民的高度熱愛，當1945年內閣首相沙埃特跟美國石油公司的代表們談判的時候，他叫沙埃特答辯，他並且表示，伊朗人民有充分的能力和辦法來自己進行他們的石油工業，“我們沒有必要向外國人讓步，我們，我們人民黨，是反對任何讓步的”，人民用同樣的忠實來酬報他的忠實，1948年夏天他在德黑蘭附近的一個村子里，法夏姆被一群受陸軍參謀總長拉茲馬拉和伊朗國王雇用的匪徒襲擊，由於兩位製造廠工人沙布尼和阿發基的警惕，他逃脫了這一次狙擊，1949年當警察包抄他的房子，要逮捕他的時候，阿發基又拯救了他一次，拉德馬內什事後表示：“我把我的生命歸功于這位工人，而我将把我这条生命完全獻給工人們，直到最后一剎那”，從那天，1949年2月5日起，拉德馬內什一直過着地下的生活；關於他的消息唯一傳到外間的，便是他在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向參加大會的人們轉達伊朗人民黨的战斗敬礼，可是伊朗人民並沒有忘記他，直到今天他們還反復體會他的許多話，這些話給他們在爭取獨立的斗争中添上力量和信心，例如他在議會里，當英國人在石油工人罢工期間想對政府施壓力時，所說的那句驕傲的話：“伊朗人民將用話來答复話，用拳头來答复拳头。”

現在讓我們再回顧一下上屆人民黨代表大會吧！這次大會標志着一種坦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一連几夜的討論中代表們作出了一系列的決議，指出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的四十四個月內黨領導所表現的許多缺點。例如有一項決議分析了黨和蓋凡姆的關係，指出，對於黨和蓋凡姆合作表示同意在當時的情況下不是無庸考慮的，以後黨對蓋

凡姆的斗争則是正确的，还有人民党黨員在盖凡姆政府內的战略也受到批評，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个号召受到非常尖銳的批評，人們認為：“第一个号召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危机的印象下，含有些缺点和不清楚的地方，虽然可以承認，执行委员会并没有把这一次号召作为它的行动方針，可是仍必須強調提出，代表大会認為这次号召是一个錯誤，并且，党領導必須就在这种严重艰难的期間显得更有骨气，更頑強，更严峻，正如它时时指示的那樣，”在一个特別決議中，对于党在宣傳，报刊，訓練新干部，組織和監察委员会方面的工作以及在發動工人，青年，农民和妇女方面的工作指出了方向，农民問題特別受到注意，在決議中特別揭示出，党在农民工作中沒有确定任何教育的和組織的目标，特別重要的是那些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陰謀和干涉伊朗內政的討論、決議和決定。在这个問題上大会支持总書記的报告，总書記在报告中揭發了帝国主义者的詭計并且指出，他們用什么假面目来掩飾他們反人民的和煽动战争的企圖。他強調指出，美国和英国采取的一切反动措施都是利用反共口号来反对全世界人民的独立运动，这个口号有好几年工夫也一直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口号。他指出，所有帝国主义的“計劃”，如杜魯門計劃和馬歇尔計劃，都只是以奴役人民为目的，对于人民說只意味着飢餓，灾难，不幸和最野蛮的压迫。他提醒大家注意乔治·阿侖对伊朗內政的無耻的干涉，着重指出，阿侖的一切努力，都是借着伊朗統治階級的帮助来为美国石油大老板謀利益，把伊朗人民的最后权利都剝夺掉。他駁斥了华盛顿方面关于所謂無私的政策の謊言，就拿美国駐德黑兰公使，乔治·阿侖，对于阿塞拜疆問題、石油問題和盖凡姆政府的發言和声明为憑据，这些

都是美国政府自私自利的干涉伊朗内政的有力的证据。因此大会一致谴责了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并且一致表示反对1947年10月6日的伊美军事条约，这个条约使伊朗军队受美帝国主义的监督，因此把伊朗变成一个被保护国。

这次大会巩固了党的基础，加强了党员之间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团结，它给党以新的推动力，增强了党的战斗毅力和牺牲精神，确定了党在伊朗独立运动中的保护者和领导者的地位，在反抗社会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的堡垒的作用，在这个斗争里统治阶级和殖民统治者的一切阴谋都一再被粉碎。

但是反动派却没有放弃他们摧毁党的企图，在英帝国主义者从内部破坏党的计划失败后，美国强盗便担当起领导侵略的任务，这种侵略现在用最卑鄙的恐怖方式进行。上面已提到过，美国强盗们从事过暗杀党总书记的活动，但由于两位工人的警惕而遭失败，当总书记在1948年秋天的一个报刊会议上揭发了伊朗军队中美国“顾问”在对党的恐怖活动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并因此证明党组织已获悉帝国主义的秘密事务和间谍工作的诡诈阴谋时，帝国主义者便会同伊朗大地主们作出决定除去假民主的面具而公开禁止人民党。为了找一个借口，他们搬演了一回谋杀伊朗国王的把戏。

1949年2月4日，当三万多党员在爱朗尼博士墓前集会并重申他们对党和爱朗尼博士的思想的忠诚的信誓时，有人向在大学里参加庆祝典礼的国王放了一枪，凶手是一个雇用来的，意志薄弱的无赖，行凶后立刻被预先调派好的军官击毙。国王仅负一些轻伤，虽然计划是要把他打死的，因为国王没有死，阴谋的程序就有点打乱了；本来是要以国

王的死作为全力向聚集在爱朗尼博士墓前的人民党员作集中袭击的信号。进攻者要在装甲车的配合下把集会的人们包围起来，然后要“激于”对他们“所爱戴的主上”的死的“可想像的义愤”而把在场的群众屠杀得一个不留，但现在既然没有可依据的理由去激动“人民的愤怒”，原定的计划也只有修改一下。无论如何这一枪已足够成为大规模逮捕和恐怖狂潮的“根据”了。

就在同一天夜里仅德黑兰一地就有好几百个党员被逮捕，在其他地区有好几千人被逮捕，其中有八个是人民党的中央委员。第二天内政大臣在议会中宣布，人民党参与了暗杀阴谋，因此他决定禁止这个党。接着这个禁令而来的便是向所有能被国家机关缉获的党员施以最疯狂的司法迫害。大约有十三个逃脱未被捕的党员，其中有几个是中委，被缺席判处死刑，如拉德马内什、爱斯刚德里、工会总书记礼萨·罗斯特，以及他巴利和克夏瓦博士等也都在里面。

为了顾及党员的安全，我现在不能进一步叙述党的地下工作情况。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从今以后人民党的历史和伊朗独立运动的历史已打成一片。我一开始已经讲到的伊朗自由运动志士的英勇事迹足以证明党并没有死亡，从伊朗政权下的监狱里救出八个当时被捕的中央委员。拉德马内什博士在1952年10月第十九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和1954年3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出现证明了人民党受迫害的领袖并没有被恐怖吓倒也没有沉默下来。我想在这里援引人民党总书记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的几句话，这些话对判断人民党今天在伊朗自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有指导性的。

“美帝国主义以締結苛刻的軍事協定和經濟協定的方

法，以派遣軍事代表團和經濟代表團的方法來掠奪我國的財富，他們在伊朗市場上大量傾銷自己的陳貨，公開地、粗暴地干涉伊朗的內政，阻礙伊朗人民的發展和進步，竭力鎮壓伊朗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

“美英帝國主義者對待我國如對待殖民地一樣。他們竟無視伊朗人民已經覺醒並正在警惕地保衛着自己民族利益的事實。伊朗人民再也不害怕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對他們的威脅。他們一定要把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堅持到最後勝利，消滅帝國主義者在伊朗的巢穴，並且無疑問地，要把帝國主義者從自己的領土上驅逐出去。……現在的伊朗政治首領阻礙着伊朗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伊朗人民黨進行着消滅帝國主義在我國的勢力和本國反動勢力的頑強鬥爭。人民黨不斷揭發現今伊朗政治首領的不徹底的政策和阻礙作用。只有伊朗人民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伊朗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黨，才是伊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隊。”

從總書記的話里可以看出，鬥爭的尖銳化，新的政治形勢和帝國主義者對伊朗的侵略使黨面臨着新的任務，因此人民黨的一次新的代表大會在今天將無疑地要擬具出一個新的行動綱領和一個新的黨章，這次大會將重視這個事實，那便是，群眾們早在1953年8月的事件里，在人民黨的領導下，已響應建立一個民族共和國的新口號。

自從人民黨遭禁止以來，正如我所說過的，人民黨的歷史已和獨立運動的歷史打成一片，獨立運動是下一章所要討論的題目。這裡可以肯定地說，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的口號已經實現：“人民黨是伊朗人民群眾運動的動力，是提高伊朗人民群眾的覺悟的工具。”

第六章 伊朗人民爭取民族 獨立與和平的鬥爭

伊朗的歷史從十九世紀開始以來就是伊朗人民反對殖民主義者，反對英帝國主義者的秘密陰謀的一場長期而頑強的鬥爭。英帝國主義者由於他們貪婪無厭的掠奪欲望一再地執行了奴役伊朗的新的、罪惡的計劃。他們力圖順利地榨取伊朗的國家財富和擴張他們在亞洲的勢力範圍。他們不惜用陰謀和武力來扼殺伊朗人民的民族解放的意志並且為了達到他們反對伊朗人民獨立意志的目的，他們肆無忌憚地像指揮他們的軍隊似地來指揮他們在伊朗統治階級中的代理人。他們的公使館，領事館，經濟組織和文化機關，他們在設刺子和伊斯法罕的學校，他們的波斯帝國銀行和英伊石油公司——所有這些機關的唯一目的就在於保證一小撮英國壟斷資本家對伊朗進行殖民地似的剝削。

大多數的伊朗人民都親身感受到這種殖民政策所帶來的痛苦的後果；所以伊朗全體人民除了以國王為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和買辦資本家們之外，在 1952 年都贊成摩薩台博士——合法的伊朗首相同英國斷絕外交關係的決議，這並不是奇怪的事。這種外交關係對伊朗來說，有半世紀多的時間只意味了痛苦和窮困，殺戮和壓迫，罪惡和卑鄙。他們已經做到伊朗國內真正的統治者是那些英國壟斷資本的代表，英伊石油公司的經理和他們的助手。他們直接地或通過他們伊朗的同盟者來“任免”議員，大臣，會長，省長，將軍甚至國王。一個大臣不願做他們想做的事，這位大臣就得

倒台；一个国王不服从他们，就会发生政变把这位违抗者从宝座上推下来，这些都是家常的事。

伊朗人民憎恨英帝国主义者并且把一切灾害都归咎于英国统治者，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事！这种憎恨从很久以来就变成了一种本能。在伊朗朴实的人们眼中，英国殖民统治者对一切不幸都是有罪过的，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夸张的事。是的，就连谷物歉收或者蝗虫侵袭田地甚或一只驢子在街上踢了过路人一脚，朴实的伊朗人都会揣想在这件事后面有一个英国代理人在作祟。“在这种场合中，这些朴实的伊朗人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对的”，当我和一位有势力的伊朗人谈起这种本能性的憎恨时，他这样说。这种憎恨从本能发展到自觉的地步时，它对帝国主义压迫者将会更加危险。

在摩萨台垮台后被捧出来压在伊朗人民头上的萨希迪伊朗傀儡政府遵照美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又重新恢复了同英国的外交关系。美帝国主义者还想在伊朗的石油生意中保持他们的英国竞争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完全能够从英国人那里但是却不能从伊朗人民那里把伊朗的石油抢劫过来，如果伊朗人民一旦成为伊朗石油的真正的主人的话。美帝国主义者参与英国人的掠夺，但是他们的假面具已经撕下来了。同时他们终究也要失败的。因为伊朗人民争取他们民族独立的斗争历史证明他们懂得怎样同那些反对他们自由和权利的敌人进行斗争。

伊朗被拖入欧洲强权政策的势力范围是开始于1800年当拿破仑计划和俄国的沙皇保罗一世一起去攻击英国在印度的世界霸权时。拿破仑想获得伊朗国王法塔里的支援的企图失败了。英国人从印度派遣了一个代理人到伊朗，这

是某一个馬尔孔，他通过礼物和諾言使国王和英国人簽訂了一个条約。这个条約不但反对法国人，而且也反对阿富汗人。这时阿富汗人正在为保衛他們的国土而反对英国人。英国有責任在(伊朗)和法国作战时給伊朗以軍事和經濟的援助。但是当1804年英国人讓他們的同盟者在第一次俄伊战争中处于困境时，法国人就利用伊朗宮廷的不滿，建議法塔里廢除伊英条約而繼續反对俄国占領佐治亞的战争和参加在印度的反对英国人的战争。法国人从1806年5月起同俄国开战。法国代表姚培在这次談判中虽然沒有获得什么成就，但是很快地在1807年5月拿破侖和伊朗公使达成了反对英国人和俄国人的芬肯斯坦条約。

当加尔台將軍在根据这个条約来到伊朗时，形势的發展已經超过了这一条約所規定的軍事目标；在这时拿破侖和沙皇之間已經簽訂了得尔西特的和平条約。加尔台却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同国王簽訂了一个貿易条約。这一条約保證了法国領事、商人和臣僕有特別权利和优先权，并且給伊朗套上了第一条殖民鎖鏈。

另一方面英国却答应如果伊朗繼續对俄国战争願給国王以經濟援助。在这种提供援助的后面英国的企圖首先是削弱伊朗，使伊朗在財政上依賴英国，从而获得对英国在亚洲地位起重要作用的这一地区的領導。事实上于1811年来到伊朗的英国大使尤斯利曾带来六十万托馬（約等于四十五万英鎊），用这些錢来偿付整整三年中在高加索戰場上所流的血。俄伊战争以伊朗的慘敗而告結束；同俄国相比較的伊朗是落后的从战争一开始就决定了伊朗不可能获得胜利。哥勒斯坦和約中訂明把俄国軍隊所占領的全部地区划給俄国。同时，俄国貨物的輸入限制只征百分之五从

价稅，由此在伊朗开始了以后的稅率監督。

英国人于 1814 年利用(伊朗)对俄国敌对的情緒，而通过了一个新的条約来巩固他們自己在(伊朗)国内的地位并且允諾伊朗国王每年二十万托馬专为应付一場对另一个欧洲强国的战争——当时只有俄国才是这样的一个强国，还允諾支持伊朗关于調整伊俄边界的要求。这一条約是英国人的陰謀，他們煽动伊斯兰教教派去反对基督教的俄国。这一条約和伊朗在 1820 年对土耳其的胜利，誘惑了伊朗的統治者去进行第二次俄伊战争。这次战争于 1828 年 2 月以俄国的胜利和土克門蔡条約而告結束。这次条約把領事裁判权引入了伊朗；并把伊朗变成一个附屬的半殖民地国家。英国由于沙皇的胜利暂时丧失它对伊朗中央政权的影响而努力想再从后門进来，把它的魔掌伸到經常考慮到他們独立的酋长和民族公侯的后面——俄伊战争对他們的脱离中央政权是有利的，特别是伸到东伊朗的公侯們和隶属于(伊朗)国王的海拉公爵后面。沙皇俄国認为它在土克門蔡条約中获得的成果通过中央政权可以得到保持，所以就唆使伊朗国王来懲罰反对統一的諸侯們的代表海拉公爵，使海拉完全屈服。战争于 1833 年爆發，曾一度由于儲君的死亡和委任新的皇位繼承人而暂时中斷，到 1837 年又被新的国王繼續下去。英国，如上所述，是站在海拉公爵的后面，和伊朗断絕了外交关系并且于 1838 年以最后通牒来威胁伊朗从海拉撤退它的軍隊。英国首相派尔梅斯东并不满足于伊朗軍隊的从阿富汗撤退，而是更进一步地要求伊朗給英国像沙皇俄国在土克門蔡条約中所获得的同样的权利。

这样，伊朗就变成一个完全的附屬国了。在这以前还只有几个俄国商人享受治外法权，而現今連几千个住在南

部港口的印度商人也以英国臣下的身份为自己要求同样的权利。伊朗人不再是自己国土上的主人。随便哪一个欧洲的無賴都比一个正直的伊朗人有更多的权利。伊朗人和欧洲人之間的爭执事件也由欧洲領事来决定。

同时，不但欧洲人处身于伊朗法律之外，就連許多商人也依靠殖民統治者的特权的庇护而拒絕服从伊朗的法律。直到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止，有許多伊朗商人伪称自己是俄国或英国的臣下除了得到别的利益外，还获得了对官方免交捐税的利益。这样的結果是本国的伊朗商人不能同这些“外国人”竞争和貿易逐漸地轉入这些买办家的手里。在今天这种情况还部分地存在着。

伊朗人从十九世紀后半叶伊朗的失敗中認識到他們的旧的战斗方法和生活習慣不能够使他們反对欧洲政策势力，来保衛自己的独立，認識到他們必須采用侵略者的策略和武器。一些伊朗政治家到欧洲各国去旅行对这种看法也起了作用，可是他們只看到在欧洲生效的方法，却没有看到在这些方法后面的力量。他們限于他們自己的社会想像，不能理解新的力量在欧洲早已出現，封建貴族和大地主們不再是操縱农民生死权的主人，资产阶级已經掌握政权，并且在他們已經引出来新的力量。所以那些看得很清楚的伊朗政治家認為和改良派妥协以及讓社会的基本問題，即大地主和农民之間的关系的問題仍然存在的这些情况必須要改变。

米尔查—塔基汗·阿米尔—納撒是一个厨司的兒子，他曾經以年青軍官的身份参加过一个外交代表团到过彼得堡。当他在納斯尔—埃特—丁国王即位后于1848年被任命为宰相时，他企圖把伊朗或多或少地按照欧洲的模样使

其現代化。他企圖稍稍調整伊朗的混亂的財政，首先是想使伊朗工業化，並且把那些相隔很遠的城市用新的公路和鐵路聯結起來。他替現代的中學奠下了基石，甚至做到了建立起一所現代化的大學。實現阿米尔—納撒的計劃是不會符合英國人的趣味的，因為正如同英國人自己所解釋的一樣，一個被混亂和無政府狀態所撕裂的伊朗是維護他們在印度的利益的最好工具。所以他們促使國王不信任他的宰相，最後於 1851 年就派人謀殺了阿米尔—納撒。

在阿米尔—納撒死後，英國人想加強他們在伊朗的勢力。但是當 1853 年俄國和英國的戰爭——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時，伊朗國王企圖粉碎英國於 1841 年套在伊朗身上的鎖鏈。他於 1856 年開始征伐海拉，同年 10 月占領海拉城，這意味着伊英戰爭的開始。英國軍隊於 12 月奪取了波斯灣的布希爾港口，4 月里阿瓦士也被敵人占領。

征伐海拉是伊朗政府反對殖民勢力和推行獨立政策的最後一個嘗試，是以完全失敗告結尾的一個嘗試。從這時候起在英國和伊朗之間再也沒有過具有國際公法意義的戰爭。就算英國軍隊以後還向伊朗人射擊，那麼他們也是以那時反對伊朗人民的伊朗政府的同盟者身份來做的。就連資產階級革命時候也是如此，例如當 1909 年 3 月起義者解放了伊斯法罕，布希爾和本得阿巴斯等城市時，英國人襲擊這些波斯灣的海港。

1857 年標志着伊朗歷史中的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那就是一直持續到 1951 年石油工業國有化時的“和平侵入”時代。隨着伊朗人民拒絕對英美帝國主義者的要求讓步，在伊朗歷史中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和平侵入”的政策對殖民統治者來說意味着購進巨量

的原料，意味着他們的資本在伊朗投資和他們的利益範圍在伊朗擴張与巩固。对伊朗來說，它却意味着痛苦、奴役和政治上的隶属。在这一时期里，統治階級和它的政权机器——国家已經作为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而公开表示把国家的財富以最高价格卖给每一个外国資本家。外国的資本家获得了特权，他們为此先給大地主，然后再給大資產階級的买办貸款。这些人，人民必須侍候。外国的銀行，工厂企業和商业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們和大地主、汗、富庶的教会、所有这些寄生虫的代表以及国王等結成了一个非神聖同盟来反对人民。他們由于和这些人的兄弟般的亲睦而以最殘酷的强力来回答每一次人民的反抗。

英国在伊朗“和平侵入”的第一个步驟是1864年关于建筑一条从伊朗西部边境的哈納金通过德黑兰到布希尔的电报綫的特权。接在第一条电报綫的后面有一根第二条从德黑兰到伊朗北部边境的陀尔法的电报綫，它把德黑兰与俄国和倫敦联結起来。第三个特权是于1875年在伊朗国土上擴張了三条电报綫，其中两条是联結国外的，一条是联結国内的。所有这些电报綫几乎都是由英国軍官用伊朗的錢造成的。

这个电报网对加强巩固英国人在整个伊朗国土，特别在南部几省中的势力和地位起了作用。企業中的职工除英国人和印度人外，大部分是伊朗人，他們以英国臣下的身份享受了治外法权。电报局是国王和他的公侯們的舌头和耳朵，但却是被英国人所操縱的一根舌头和一只耳朵。本国各省中沒有一个伊朗官吏能够和允許将任何反对外国統治者利益的事項报告給中央政府。假如發生暴动的話（这些暴动無疑地大多数是由英国人为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而煽

动起来的),那末这一个或者那一个电报局就会偶然地由于“技术上的緣故”而停止工作,同时德黑兰就对外面的真实情况不知道或知道得很迟。在所有其他的职员住在贫苦的粘土小屋里的时候,美丽的、空气流通的和大多数凉爽的电报局的石头建筑物却座落在一所花草盛开的花园里。电报局长沒有責任向国王报告消息。假如一个罪犯被国家的保安机关所追踪,他能够在处于英国政府保护下的电报局里找到几乎永远是安全的避难所。因为电报局的建筑物是英国的神聖区域,沒有一个伊朗人可以任意地踏入这一区域。

英国的殖民势力一步一步地侵入到伊朗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里。1872年英国人制訂了一个完全奴役伊朗的总計劃。这个被英国政治家自己称为“巨大的”計劃当时虽然沒有被实现,但是也沒有被放弃,它的不断的执行証实了英国政策的目的。

按照这个計劃,一个加入英国籍的某位尤利烏斯·特·路脫男爵可以获得专利权在伊朗建設铁路和公路,开掘石油和其他的矿物,实施再植林計劃和建設工厂、运河以及其他的灌溉装置。他用总额大約二万英鎊的錢获得了二十五年之久的伊朗所有稅务局的管理权,并且为了上述所有的这些权利,他可以在七十年期間只以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純利付給伊朗的統治者作为报酬。这个計劃是如此巨大和如此地引起居民的反抗,以致規定的特权必須被取消。英国人等待着;1889年,他們逼迫伊朗国王承認原来的那个男爵有专利权建立期限六十年的所謂波斯帝国銀行。他們用这种特权几乎取得像他們通过1872年的特权而获得的那种經濟上奴役伊朗国土的同样可能性。銀行有在伊朗唯一發行支票的权利,并且以此来制訂国家幣值的高低。銀

行决定外国匯款的匯兌率，并且銀行随着伊朗石油出產的增加而繁榮起来，在这方面幣值的操縱給銀行带来了巨額的利潤。一个銀行的分行网就控制着國家的全部經濟。男爵先生用什么方法来致富，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作証：貧苦的伊朗农民在德黑兰附近的喀斯文拿到支票，他到首都用这些支票来买貨物。他在路上即使沒有碰到一个劫路的強盜，也就已經喪失了他的錢的一部分，因为他的支票只在喀斯文才有效。他必須在德黑兰把这些支票去貼現，可是支出的錢已經比支票票面价值少了百分之几。銀行具有随时随刻掌握伊朗人民命脉的暗勢力，那末为什么銀行的这种暗勢力会比上述的銀行幣值兌換具有更大的勢力呢？这是因为銀行对許多有勢力的人放出很多的信貸，而如果銀行和倫敦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需要反对伊朗的利益时，这种信貸就是一种压制債戶的有效工具。即便波斯帝國銀行不是經濟上奴役伊朗的唯一的工具，它毫無疑問地也是最有效的工具。銀行通过私人信貸所取得的勢力，最后又通过給伊朗國家的信貸和貸款而提高到無可估量的程度。第一次貸款的事件說明了很多的問題。1890年一家英國商行获得了对全伊朗的烟草專賣权。伊朗人民的抗議于1891年得到一个有勢力的教會人士的支持。这位有勢力的教會人士声称这家英國商行所賣出的烟草是“不干净”的。沒有一个伊朗人抽这种烟草。这次事件可以看作是伊朗群众第一次抵制英貨的事件。是的，农民和小商人把他們儲存的烟草燒了，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國王都沒有烟草可抽，因为他的侍从們把全部儲存的烟草都已毀掉。面临群众的抗議，國王只得宣告專賣权無效，再以五十万英鎊賠償給这家英國商行而了事。國家沒有这笔錢，只得向帝國銀行貸款，这給伊

朗招惹了以后的貸款，使国家在經濟上全部被奴役。不久以后，南部伊朗的全部稅务局就抵押給英国人。1914年伊朗欠沙皇俄国和英国六百八十万七千英鎊，这笔欠債的利息就相当伊朗全部預算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多。

英国的石油探測一方面發展成为奴役和掠夺伊朗的最有效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發展成为教导伊朗人民去認識英帝国主义者殘忍的掠夺欲望的最有效的工具。英国的石油探測是英帝国主义加在伊朗人民身上的奴隶鎖鏈的最后一环。

下面这个故事听来真像“天方夜談”中一个童話。某一个威廉姆·克諾斯·达西来到太陽升起来的和獅子的国土（指伊朗）对国王說出了誘惑人的建議：“地上所有的一切應該屬于你，而地下所有的一切則应屬于我。”这就是伊朗国王以两万英鎊的代价而以特权許可英国的达西工程师的基本原则。

这笔生意夺去了伊朗半世紀的自由，搶走了伊朗人民的面包，判決了他們飢餓死刑。它吞噬了血的河流而变成英国势力的基石，最后当伊朗人民感觉到加在他們身上的鎖鏈，宣告特权無效和把石油工業国有化时，英国势力的基础發生了动搖。

这种特权給达西在全国，除北部五省以外，获得勘探和开采石油資源的权利。从特权生效的第一日起，淳朴的伊朗农民，巴哈第亚族农民就反抗外国佬在他們的土地上寻找宝藏，阻止勘察和鑽探及石油的貯存和运输。在那时，英国人就已經采用一种秘密的方法，他們后来把这种方法發展得非常完善，这种方法今天还是构成他們殖民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他們以参加到这个新建立的工

業的權利來賄賂部落酋長，而這些新的伊朗股東為了保護他們的、同時也是侵略者的利益，就會用火和劍來和他們自己的人民作戰。所以某個伊朗人對石油問題的態度就變成伊朗人民識別英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的一個標記。誰稱贊由第一批探測而成長起來的英國石油生意的作用和擁護英國石油生意，誰就一定是一個英國代理人。這個基本原則在伊朗人方面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應用了。如果有人主張伊朗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應採取反對英伊石油公司的鬥爭的形式，那也一點不錯，因為這種反對英伊石油公司的鬥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含有反英的性質，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又有了反帝的內容。伊朗封建主與帝國主義剝削者的經濟聯繫同時又給這種鬥爭以反封建的性質，並且與此還給予那種不可戰勝的力量，這力量就在於一個國家的民族和社會要求的合流之中。

在達西的背後有以當時的海軍部長溫斯頓·丘吉爾為代表的英國海軍部撐腰。達西在一家私人商店里從伊朗國王那里詐取了特權。他對伊朗政府連最起碼的通知都沒有，就於1905年把“他的商行”變成一家股份公司，即英伊石油公司。英國海軍部購進了英伊石油公司大部分的股票。公司的股本總數大約二百萬英鎊。

我們這裡還想再一次地肯定，這種特權應作為伊朗國王和英國工程師達西之間的一種私人交易。這一事實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伊朗從來也沒有承認過英國政府是立合同的對方，根據這一點，英國政府的干涉於1951年也被摩薩台政府用法律給駁斥了。只是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才同意和英國國家的代理人作為英伊石油公司的代表來進行談判。

从英伊石油公司财产盈亏表的发展上，不但可以看出它的产量的增长是惊人的——从1908年开始生产，1909年就已经可以出口第一批石油，而且还可看出这家公司的权力的增长也是超人的——它的惊人的财政力量使它成为伊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者。如上所述，英伊石油公司是于1905年用一笔约二百万英镑的资本建立起来的。1914年它的资本已经提高到四百八十万英镑，到1951年总数估计约二亿英镑。1913年公司的纯利达六百五十万英镑，在1948年，正如摩萨台博士1951年10月在安全会议上所宣称的，纯利已达到了六千一百万英镑。在六千一百万英镑中，伊朗只有九百万，相反地，英国政府以抽税的形式却拿到二千八百万，而那些从未见过伊朗的英国资本家也得到了二千四百万。从1905年到1932年英伊石油公司注册入账的纯利达一亿七千一百万英镑，其中伊朗只有得到一千一百万英镑。1951年英伊石油公司出产三千万吨石油，从而得到的纯利超过一亿五千万英镑。公司的股东是这样地富有和值得尊敬，同时他们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肥胖，他们不会随时随地企图对伊朗人民再来一个小小的欺诈了吧。可是1931年伊朗只得到三十万零六千八百英镑，而前一年却有一百二十二万八千英镑。政府对这一点感到惊讶，同时因为政府没有权力去审查英伊石油公司的账簿，所以伊朗政府要求通过一个英国保管人来检查。这位保管人肯定公司方面欺诈了伊朗几十万英镑。举例如1949年公司得到的纯利虽然比全部伊朗预算还高，可是伊朗的净利却从来没有超过二千万英镑。按照美国报纸“每日指南报”的估计，英国人从伊朗输出石油的总值超过伊朗国家的收入几百倍，超过伊朗所有劳动人民的收入几十万倍。公司的这种惊人的金融势力是以

一种巨大的政治势力为条件的。它是通过各种权利如購进土地，建筑铁路，开拓港口和机场，架設电话，电报线，設立無線电訊局及自己的警察、学校和社会保險而扩大的。所有这些特权原来仅只限于少数的工业中心，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伊朗的国家机构都在英伊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的检查之下。英伊石油公司是伊朗国土上的一个小国家。英国国家秘密警察头等角色伪装为英伊石油公司的职员，他們的使命是扼杀每一个工人运动和每一个民族自由运动的萌芽。如果没有得到英国經理或他們的代理人的同意而要想委任石油中心——苏塞斯坦省的一个小警察长，这簡直是不可能的。“自由选举”只讓少数几个可能妨害英国人的政策的議員选入議會。而假如某个議員不受英伊石油公司的統治者的欢迎，他要登上一个大臣的地位，那可算是絕無仅有的事。如果一个大臣一旦由于这个或那个緣由而表示出違抗的話，那末他馬上就会被免职，或者是連声息全無地被排除掉。

摩达萊的遭遇就是如此，他是一个具有違抗性的教会人士，死于卡拉脫堡垒中，因为他于礼薩国王专政的最初几年中在国内起来反抗英国人的活动；台摩太西的遭遇也是如此，他是伊朗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是礼薩国王多年的宮廷大臣和亲密助手，他被捕而在獄中被謀杀，因为他根据苏联历史学家伊凡諾夫的确証为保衛伊朗的权利而反对英国人的貪欲；还有薩达·阿薩特的遭遇也是如此，他是前任的国防大臣和巴哈第亚族的會長，他也是在牢獄中被暗杀的，因为他不願接受英伊石油公司的股票，不願变成接受英国人的命令的人。这些情形都是著名的司法案件，凶手們只在独裁者崩潰后才被伊朗法庭判决。劊子手們是从独裁者那

里得到謀殺的命令的，而独裁者知道他对他的英国主子負有什么責任。

从本世紀开始以来，这就是說从石油工業开始發展以来，英国在伊朗的政策就全部以石油問題为中心。按照斯大林对現代資本主义基本經濟法則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所下的定义是：“……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証最高利潤的战争和国民經濟軍事化的办法，来保証最大限度的資本主义利潤。”維護英伊石油公司的权利和特权是保証英国壟断資本主义生存基础的必要前提。

伊朗的被拖入欧洲强国的势力爭逐場中使一个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长加速了将近一个世紀。以前民族資產階級一則由于封建桎梏，二則由于殖民統治者的扼杀使它的發展受到了阻碍。在1905年到1911年伊朗資產階級革命时期中，民族資產階級依靠不滿的、殘酷地被剝削的群众，企圖掙脫这种桎梏。俄日战争的結局意味着一个亚洲民族对沙皇無边的权力要求的第一次胜利，它鼓舞了亚洲各民族，其中也有伊朗人民，来集中所有的力量反对殖民地的压迫，反对阻碍那种生产力發展的封建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在历史上已經过了时，它想倚靠殖民統治者来苟且維持下去，因此就成为自己民族权利的叛徒。

伊朗人民反对国内和国外压迫者的群众运动引起英国和沙皇俄国在1907年8月把他們的帝国主义的要求限于一个划分伊朗为两个势力范围的条約。当1909年伊朗人民武装起来反对穆罕默德·阿里国王，企圖从嗜血的封建地主和外国代理人的桎梏下把自己国土解放出来，并且已經有伊斯法罕、布希尔、本得阿巴斯和大不里士等城市被解放的

时候,英国的军队开入伊朗,占领了伊朗南部的港口,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军队进入了大不里士。名义上他们讲是为了保护他们臣僕的生命,事实上他们却是要保持以伊朗国王为首的、隶属于他们的大地主们继续做他们的利益的代理人。可是他们一定得放弃国王;国王就退了位,在俄国找到了避难所。但是当旧制度重新恢复时,侵略者并没有想到离开这块国土。他们在伊朗一直停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不是发生一桩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给整个人类历史指出新的方向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惊醒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使伊朗群众也开始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的话,侵略者是会被随便哪一个伊朗国王批准他们驻扎在伊朗的。

在克伦斯基政府崩溃之后,工兵代表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公布关于和平和宣告所有不是在同等权利的基础上与各民族签订的条约无效的法令。1917年11月24日列宁和斯大林的“告俄国和东方所有劳动的伊斯兰教徒书”被发表,其中这样谈到伊朗:关于分割波斯(即今伊朗)的条约已经被撕破和消灭了。一俟战争谈判结束,军队就撤走,并且保证伊朗有权自由决定它的命运。

1919年7月26日,苏联外交部公布了一道对伊朗人民和伊朗政府的通报,通报中说:年青的苏维埃国家放弃所有沙皇俄国从伊朗抢夺过来的权利和特权,取消所有伊朗不以同等权利的地位所签订的条约。其次苏联政府放弃沙皇俄国对伊朗政府贷款的偿还以及所有的商业特权和投降条款所归定的权利。苏联政府还通知伊朗人民和伊朗政府:苏联政府把俄国信贷银行,俄国铁路,所有被俄国人统治的邮局、电话和电报线无偿地移交給伊朗人民。伊朗人民开

头似乎不能相信这样行为高尚的贡献，可是他们很快就看到它的实现。苏联军队离开了伊朗城市，不久，苏联政府缴还了沙皇帝国通过武力、压榨和阴谋而在伊朗获得的一切权利和地位。苏联的这种磊落豪爽的政策引起伊朗人民不可想像的热情，以致从属于英国的伊朗政府不得不违反他们自己的意志，于1918年就承认苏维埃俄国，并且还在同年7月里和第一个苏维埃代表订立条约。

英帝国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政府的榜样，刚好相反，他们认为现在伊朗的北部领土也不受束缚了，现在可以把整个伊朗并吞到他们的帝国里去。是的，他们甚至企图到巴库的油田和中亚细亚的产棉区，来实现他们的梦想，把伊朗变成一个反苏的战争根据地。在1918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就已经企图实现这一计划，他们把顿斯坦维勒将军所指挥的军队遣送到北伊朗。这支军队一直侵入到巴库，谋杀了二十六个阿塞拜疆的委员。它被斯大林称为“吃人者”的军队。

伊朗的统治阶级从1828年或从1833年以来是必须按照英俄两国帝国主义的意旨来行动，那末，从1918年以后就只有英帝国主义还毫无顾忌地指挥伊朗的政府、大臣、议员、将军和国王来随着它行动。这一时期开始于福苏·埃特·达莱政府，结束于拉兹马拉政府，1946年当人民党的三个党员加入内阁时，由于联合政府三个月的任职时期而完全中止。正好在英帝国主义者受到被压迫民族的打击而在他们的美国“同盟者”的紧身外衣里苟延一时的時候，美帝国主义者首先想参与进来，获得统治的霸权。在伊朗历史中，随着摩萨台政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虽然由于1953年8月19日的事件而中断过一个时期，但是它却不可能被取

消。

自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英国殖民統治者在伊朗确实是少了一个帝国主义的竞争者，可是現在他們碰着了一个新的对手——从百年的睡梦中觉醒过来变成具有民族意識的伊朗人民。一直到現在，英帝国主义者如果曾相信維持印度最好的办法是一个混乱的伊朗，是一个国土上居住着穷苦的和最愚昧的活人的国家，是一个沒有交通、沒有学校和医院的国家，那末，現在他們会相信变革是不可能避免的。英帝国主义者这时觉悟到这种变革本身可能包含着对保护英帝国主义的利益的危險。英国于1919年与福苏·埃特·达莱政府訂立一个把伊朗变成一个英国的保护国的条約，它現在遭遇这些危險。在英国統治下完全奴役伊朗的旧的計劃已經于1872年通过对尤利烏斯·特·路脫男爵的一系列特权而实现过，这个旧的計劃現在以另一种形式在这一条約中庆祝它的复活。英国人若是在那时曾經买得伊朗国王的同意的話，那末他們这一次又以十三万英鎊賄賂了內閣首相和他的內政大臣。但是他們这一次仍然失算了。在全国土地上掀起了一个比那时更激昂的抗議。这次抗議变成了一个群众运动，它日益扩大，并且把农民、工人、大学生和中学生、商人和手工業者团結成为一条战綫，以有力的示威游行要求取消这个条約，要求政府辞职和阿麦特国王回国。英国的专家們为了“改編”伊朗的財政制度和軍隊，在期待批准条約的时期就已經来到德黑兰，他們沒有在条約的基础上开始行动；議會面对着伊朗人民反对条約的广泛的反抗，拒絕批准条約。英国人当然从伊朗政府要还那笔总数十三万英鎊的白費掉的賄賂。

在这同时，紅軍在苏联境內給予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

重的打击，当苏联政权在北阿塞拜疆建立以后，苏联海軍就把英国侵入者一直追到伊朗海岸，并且在炮火下取得了他們的陣地。在英国軍官命令下的印度人和伊朗的哥薩克拒绝对紅軍作战，撤离吉兰，以致英国人的軍事陣地也不能坚守，他們最后不得已只有从整个伊朗撤退。

这些事件鼓舞了阿塞拜疆和其他地区的伊朗自由战士去解脫外国佬和他們的伙伴的桎梏，他們在1920年6月强迫政府下台。新的內閣由于害怕一次普遍的起义，不敢承認1919年的条約，并且在群众的压力下和苏維埃政府討論关于一个由苏維埃政府所建議的伊苏条約。就在第八次全俄苏維埃會議上，列宁公布立即要签署苏伊友好条約。条約就于1921年2月26日在莫斯科簽訂了。

这一条約的簽訂和1919年英国人强迫伊朗簽訂的条約比較起来，就是一很好的榜样来辨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原則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原則的不同处，因此这一条約的批准对英国殖民統治者來說，意味着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他們現在觉察到，由于伊朗人民群众的觉醒成长，要想直接建立一个殖民統治权是不再可能的了。但是他們却無論如何不想放弃他們恶魔似的計劃，为了建立一个反苏的伊朗和維护他們帝国主义的利益，特别是維护他們在石油工業中的利益，他們繼續施展一种間接統治的老办法。只有統治階級，那些大地主們才会像他們的工具似地为他們服务，这些大地主們到現在为止还是出賣民族的，但是，他們只有在人民被剝夺了民主权利的时候才能存在，这一点英国人是知道的。

因此英帝国主义者就組織了1921年2月21日的国家事变。山也特·齐雅特·丁一个肮脏卑鄙的英国人的代理

人曾經作为唯一的新聞記者在他的微不足道的报纸上拥护过1919年的条約，他在这场国家事变中攫取了領導权，依靠一批已經几个月沒有得到軍餉而不滿的士兵的帮助占領了德黑兰，奠下一个专制独裁的基石，一直到1941年同盟軍占領伊朗时为止。

新的政府为了迷惑民众把所有的民族要求和人民的希望列在它的政綱里。它答应取締那些吮吸人民鮮血的寄生虫和貴族，答应提高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促进商業、工業、交通和文化的發展，还答应把土地分配給农民。这些諾言不过是些好听的措詞而已，英国人把这些美丽的措詞授意給他們的傀儡，因为这样他們才能保持住他們的地位。事实上摆在英国代理人山也特·齐雅特·丁和他的共謀者礼薩·汗少将面前的任务是要他們作为伊朗統治階級和英帝国主义者之間的代理人，来反对国内的民族和革命运动，来消灭国内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組織，来使伊朗反对苏联而孤立，和来阻止十月革命解放思想越过伊朗而推进到亚洲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推进到印度。反抗吉兰、胡拉桑和阿塞拜疆的自由运动并不是一桩难的任务。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运动仅只是反英运动，而且还不能在范围广大上感动那些剛剛从他們狹隘的階級想像中觉醒的农民来参加到运动中去；同时产业工人照数量來說，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反对国内外敌人斗争中所有的民族力量联系一起。所以这时政府只要給当时民族思想的最坚强的支柱——商界和手工业者——施加压力，就能把运动分裂和消灭。

到1922年礼薩·汗以这种方式把他的統治巩固到那样的地步，以致把所有軍事和行政力量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成为操縱他下屬的生死的絕對主人。他是英国人的代理

人，并且費尽心力想永远成为他們的唯一代理人，因此他同样冷酷地把他的有野心的同謀者像他政治上的真正敌人一样杀掉。他曾經采用一些謀杀手段，有些謀杀事件的主謀人后来証明就是他。英国人知道他們在他那里可以得到什么，所以把他的一切罪恶粉飾称为反对“国家敌人”的“民主”政策，其实这一切罪恶要說成是由于政治动机，倒毋宁說大部分是由于卑鄙齷齪的自私和貪婪無厭的欲望。依靠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他們称贊专制的篡位者的“民主和进步的精神”。这位专制的篡位者在有关帝国主义的利益时是“坚强的”，而在攸关伊朗的利益时却軟弱無比。当土耳其要求亚拉拉特区域的战略上重要的地区时，他投降了，并且不加考虑地放弃了伊朗的土地。

他所执行的一些改革，并不由于他有見識，而只是英国殖民統治者的聪明罢了，因为英国殖民統治者知道很清楚，他們的傀儡完全能够鎮压，但却不能够消灭伊朗的自由运动。伊朗的自由意志的火焰燃燒得愈来愈旺盛。伊朗人不願意在他們的土地上再存在着英国的銀行，再裝置着英国的电报綫，再駐扎着外国的軍隊。他們不願承認卡特亞倫王朝所接受的外貸，尤其是想看到取消卡特亞倫朝的統治者所批准的特权。在人民的压力下，必須有些讓步，于是英国人在1928年到1938年間讓伊朗自己建筑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縱貫伊朗的鐵路，讓他們改編軍隊，以及从英国發行銀行以二十万英鎊的代价把發行权轉讓給伊朗国家銀行。在德黑兰建立了一所大学，还遣送大学生到欧洲。第一批自己的工業萌芽产生了。1928年5月20日，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条約，所有的外国人是在伊朗的法律制裁下。

表面上看来，英国人好像已經喪失在伊朗的那种影响，

但是較有經驗的觀察家却能从某些現象的后面看出英国的統治。有經驗的觀察家看清楚，北部的鐵路綫在一个沒有人迹的地区，在一个几乎可以說是沙漠的地区里突然結束，这只是为了阻止伊朗对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密切的經濟关系。較有經驗的觀察家还知道是誰站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反苏协定的后面，是誰对巩固伊朗的大地主和新兴資本家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法令感到兴趣。朴实的伊朗人曾經讓礼薩·汗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政策把他們引入到歧途，他們在1933年認識到：这位独裁者是在照料誰的事务。我曾經講过，伊朗人民判断某个伊朗人，是根据他对石油問題的态度的。現在1933年礼薩·汗在这一問題上把自己的假面具暴露在全体伊朗人民面前；他开始“追求石油而發臭”。这一年他在民族主义的大声疾呼下宣布廢止石油特权——为的是在短时期后把石油特权再延长三十年。这一叛变要耗費伊朗人民巨量的血汗。

在1941年8月25日反希特勒同盟建立以后，同盟国的軍隊从南北两部开入伊朗担任保衛伊朗国土的时候，英国人被迫放弃礼薩·汗，因为他在为他們的服务中太过份地反对苏联啦。礼薩·汗必須辞职退休。随着礼薩·汗的退位，这二十年的个人独裁也就結束了，在英帝国主义者的操縱下，他的独裁只改良了一半——当然是以英国的帝国主义利益的标准，瓦解了伊朗的家长封建制度，却是沒有在經濟上解放农民。

随着同盟軍的开入，在伊朗的历史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新的阶段是以美国人積極干涉伊朗国家的生活为分界綫的。9月16日独裁者退位，他的兒子——今天的伊朗国王——宣誓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来管理国家，并且要

弥补他父亲破坏法律的罪过。1942年1月29日，伊朗、苏联和英国之間簽訂了一項条約，条約里規定苏联和英国这两个强国負責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把军队撤离伊朗。条約中有一条規定，为了进行反对納粹德国的战争，同盟国有权可以把其他同盟国的军队开到伊朗。依照这一附带条款，“美国同盟者”来到了伊朗。战争结束后，他們以“軍事专家”的名义在伊朗停留下来，因此接着別人之后美帝国主义在伊朗也获得了地位。

取消独裁制度后群众的反应，迫使西方列强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就放弃他們的民主的假面具，迫使他們对伊朗人民指出他們在伊朗的帝国主义目的随便怎样都不会改变。在二十年的独裁制度时期，剝削的加深，权利的被剝夺，特别是能够担任劳动群众的导师和领导的工業無产阶级的兴起，这一切使农民趋向于革命运动。至于权利的被剝夺是由新富的地主所倡导，由封建地主所仿效，以及由經濟發展所促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民群众由于宗教束縛和封建忠誠还不敢拒絕地主的“权利”，那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民对地主的封建的忠誠关系已經松弛或者已經取消了，他們就能够憤怒地决定拒绝对地主繳納“租稅”，他們現在准备革命行动，和所有的劳动者一起等待着，实行他們口号的自由信号，他們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对大地主！那年秋季政治犯被釋放，成立了工会和农民协会，各报纸最后能够說出他們的意見，資產阶级民主政党和工人政党产生，1941年10月人民党建立起来了。

帝国主义者很快就認識到他們如果不阻止伊朗的群众运动，他們会完全丧失他們在伊朗的势力。因此他們用可靠的办法来破坏伊朗的群众运动，为时不久，伊朗的政府又开

始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自由选举”又把大地主，买办资本家和摆动于他们之间的投机份子带进国会。伊朗的内閣首相担任以前独裁者所担任的代理人的角色。由于美国人在1942年占领伊朗南部，并且管辖南部港口和接管外伊朗的铁路，这种干涉伊朗的行动，使代理人的地位复杂起来。以前代理人这一角色在重大的事件上只要和一个幕后操纵人——英国人——商讨，但是现在这些新的“上台者”却要两个幕后操纵人来商讨；美国人跟在英国人的后面来到伊朗，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英国人的政策有许多矛盾，只在反对伊朗自由运动的战斗口号下才一致。

美国士兵给伊朗人民一种“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印象，他们还教导伊朗人民说美国兵有权享受美利坚联邦合众国所要求的最高待遇。他们第一次表示给伊朗人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腐败。后来的“军事专家”于战争时期以魔术的手段满载卡车装运军库中变得很少的物资，使成千的商人和投机家把他们包围起来以求得大量的汽车轮胎和其他东西。美国的正义意义可以从德黑兰的主要街道上的那些街头小顽童身上显示出来。这些小顽童贩卖美国的香烟、皮鞋或者旧裤子。他们被美国的军事警察逮捕起来，而那些也许就是先前把货物卖给他们的美军兵从他们那里把卖给他们东西再重新拿走。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兵夜间撞进德黑兰的街头而并没有美国的上司来干涉；因为他们的上司也由于同样的“任务”而不能来干涉。仅是当一个喝醉酒的美国兵夜间冲进一个妇女房间里，而这位妇女又刚好是德黑兰一家最大的报纸的编辑的太太时，美国司令才觉得有必要公开地表示他的遗憾。

虽然如此，美帝国主义者却并没有忘记他们原来的任

务，也就是排挤英国人和取英国人在伊朗的統治地位而代之的任务。1943年美利坚联邦合众国强迫伊朗接受一項貿易条約，这个貿易条約可以使对美国的貿易不受任何檢查，并且讓巨量的他处沒有銷路的美國貨像潮流似地流入伊朗，如旧衣裳，尼龙品和人造品，假首飾和玩具等。1944—45年，伊朗和美国的貿易达伊朗全部对外貿易的百分之二十五；伊朗的美金外匯为了昂貴的領帶、香水和穿旧了的褲子大量地流回美国。

1943年，一个美国的軍事顧問团来到德黑兰，这个軍事顧問团規定工作到战争結束就完成任务回国，可是它到战争已經結束好几年的今天还逗留在伊朗，并且甚至还扩充了人員。它監督着伊朗的軍隊。这个軍事顧問团的任务于1947年10月6日在伊朗的国防部长和美国公使乔治·阿侖間簽訂的一項条約里被規定下来。任务广泛到那样的程度，以致伊朗政府很长时期不敢公布条約。在这一条約第十二节这样举例說：“軍事顧問团团长和在他命令下的团員有权为了發揮他們正常的作用而監察伊朗的軍隊单位和軍事組織。負責的軍官們要給軍事顧問团的監察以方便，凡顧問团所要求的一切計劃、文件、報告和通訊都可以供給顧問团处理。”人們不相信，伊朗的軍隊現在会真的現代化和被改編。軍事顧問团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从伊朗土地出發准备一个反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战争，在于对苏联进行特务活动，在于为一个新战争而在伊朗堆存战争資料，在于組成和扩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点，这一切就像做生意一样。

除了我們已經認識的那个屠杀阿塞拜疆自由战士的許瓦次考夫將軍，屬於伊朗国内最狠毒的美帝国主义的代

还有我們已經提起过的作为伊朗政府的財政顧問而做了許多暴行的密尔斯包。他把伊朗国家的財政搞混乱后，于1945年就从伊朗消失，直到我們在1953年8月的事件中才又重新碰見他。他是8月事件的幕后操縱人。

当密尔斯包在1942年来到伊朗的时候，他对伊朗人民來說就已經不是一个陌生的人；早在1922年他就作为財政专家而在伊朗活动过。那时他曾經是伊朗政府的官員；他对美国委托人的职责只是考察美国托拉斯将来侵入伊朗的最好發动点。从1942到1945年他以和伊朗政府沒有关系的华盛顿和华尔街的特派員的身份出現，他的任务是研究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經濟战略的計劃。依靠美国的軍事势力，他可以具有連一个伊朗大臣都沒有的全权。他在他的活动开始时就已經有权規定預算計劃。有权檢查整个国家支出，有权提升或貶謫国家官員和呈遞法案，所以他在半年之后由于增加的全权而获得操縱整个伊朗經濟的真正权力，并且甚至还干涉到伊朗的內政問題。他手下有大約五十个美国官員，这些美国官員中有一部分人战前在伊朗就因酗酒和犯罪而声名狼藉。他用毫無顧忌地用賄賂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的話；并且通过分配紙張的优先权和其他的恩惠来使反动的报纸隸屬於他。两年以后，他使得伊朗的經濟那样的混乱，以致有几个他的伙伴拒絕再繼續和他合作。紛乱达到那样程度使美国政府在普遍的抗議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945年2月把他提前召回。

美帝国主义者公开插足来爭取伊朗的权力，有一个时期也使一部分伊朗自由陣綫混乱起来，伊朗的民族資產階級起先認為他們在美帝国主义者身上找到了反对英帝国主义者的盟友。在这里，对过去的回忆就容易起作用，如伊朗

曾利用沙皇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而从中取得一些利益之类的回忆；可是事情发展到有关帝国主义存在问题时，这种渔人得利的想法就是错误的了。美国人确实进行了一场顽强的斗争，想把英国竞争者从他们在伊朗国内古老的原料地位上排挤出去，而英国人也确实用一世纪来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来抵抗美国，可是，每当他们鉴于帝国主义竞争得不到什么结果而只是互相抵消反让伊朗人民的民族力量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随时会联合一致的。所有为争取自由和社会平等而斗争的人民必须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的抵抗，不可把他们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帝国主义者彼此间的矛盾上。指出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错误地估计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一桩严重的错误，伊朗的资产阶级时常犯这错误而给国家带来损害，很可惜，我们还将看到连摩萨台博士也因这一错误而遭到失败。在危急的关头，在相互竞争着的帝国主义者看到他们的利益被受压迫的人民所威胁的时候，较弱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对较强的帝国主义者让步，为的是不使所有的一切都丧失。1947年以前石油斗争进入它的激烈阶段时是这样，而今天还是这样；美帝国主义那时为推销伊朗石油而组织起来的国际集团胜过了它的英国竞争者，同时也毁灭了伊朗资产阶级的空想。

早在1946年，英伊石油公司就对美国石油家的压力让步，并宣称把他们产品的百分之二十卖给美国的资本家，同时美国的资本家有权通过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一条油管把这些石油抽出。为了不过度满张其弓，美国的石油康采恩不是通过直接的压力来达到他们以后的目的，而是间接的通过伊朗政府；当时伊朗政府的领袖加瓦首相不愿国会多数的反对而满足美国的愿望，那时国会大多数议员还是为

英国服务的。这是因为他相信在美国人方面可以更好更稳固地达到他的野心的目的。

加瓦作为人民党大臣从政府里辞职以后，在他下野和复职当内阁首相之后推行了罪恶的政策。我们在前一章已经分析过这种罪恶的政策，它在美帝国主义者前完全投降，在外交政治方面，更变本加厉。他支持华盛顿的活动，通过贷款巩固美国在伊朗的地位；他开始那个所谓七年计划，据说这个七年计划将通过一项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财政援助”而得到发展；他在1947年1月请美国的专家们到德黑兰，据说这些美国专家在“计划”伊朗经济时是非常“有帮助”的；他在1947年10月延长伊朗与美国的军事条约，并且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就让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美国军事物资输入伊朗，就让美国在伊朗的土地上建立起美国的根据地；他很快地就做好了他的美国委托人对他所要求的一切。

在这样的观点下，我们也可以了解他在1947年12月关于英伊石油公司的石油特权所采取的步骤。我曾经讲过，美国人用直接和英国石油企业集团谈判的方式已经在伊朗的石油工业中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现在美国人想依靠盖凡姆的帮助来扩大这个桥头堡。伊朗人民要求伊朗的石油是伊朗人民不可分割的财产，他就利用这种要求并根据国会通过的符合伊朗人民要求的决议，在1947年12月的最后几天里对英国公使宣称他认为重新审核英伊石油公司的特权的时候已经来到。

到这时英国人知道不是开玩笑。这种暴民政治对英帝国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一种被认为是焰火的火花会非常容易地引起人民意志的爆发。英国人使出家奴，他们指示他们的代理人去激烈地公开打击盖凡姆，指使隶属他

們的國會議員表示抗議，并以这种方式来威逼从屬美国的內閣首相下台。

盖凡姆事先还通过廢除伊苏条約而实现他的牺牲伊朗人民利益的罪恶政策。苏联政府的态度沒有由于美国的代理人破坏条約而动摇，苏联政府的态度又一次地証明了他們的和平意志和他們尊重其他国家，即使是小国家的权利，它在伊朗人民面前来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挑撥者和他們的侍从盖凡姆的真面目，从而起了重大的作用。

虽然排除了盖凡姆，英帝国主义者仍然不能使伊朗人民要求廢除英伊石油公司的特权的运动沉默下去。他們虽然把作为盖凡姆的后任而接管伊朗政府的哈契米捧上来做領袖，做一个維護英国利益和反对美国利益的領袖，但是这些領袖却不可能把愈来愈严重的国家形势扭轉过来；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須維護伊朗的利益而反对两个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以后开始了一个政府頻繁更迭的时代，一个內閣首相下台，另一个首相上台，只是不把政权交給人民，这就說明了两个帝国主义的利益在竞争。伊朗人民現在不讓自己給这种換湯不換藥的办法受到迷惑；以人民党、工会和民主的群众組織为代表的劳动群众不再反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傀儡，不再反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伊朗生活的現象，他們在帝国主义本身上認識出他們的主要敌人，因此他們首先要反对的就是帝国主义，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現出来。伊朗国家的經濟状况的發展非常悲惨，可以說一日比一日糟糕。这种悲惨的發展把那些中立的资产階級日益广泛地喚醒起来，使他們也認識穷困痛苦的原因，使他們也参加了民主組織的斗争。商人、手工業者、知識分子以及甚至一些有民族意識的大地主們都宣称拥护民主与

和平的陣營。統治者對付人民群眾高漲的憤怒除了用愈來愈激烈的報復居民的办法外，別無良策。新的監獄不斷地增加，統治者甚至模仿法西斯的方式建立集中營。伊朗市場上美國貨物的泛濫完全證明是一種對美國資本家的幫助。麵包、肉類和油脂的價格升高，糖從市場里消失。從美國來的進口貨的膨脹以及與此同時出口貨的縮小使國家的預備金不斷地往外流，除此之外在各種不同的委員會和機關里的美國“專家”還消耗着國家的預備金。1949年正如已經提起過的那樣，美國把價值二十億九千五百萬里爾的貨物輸入到伊朗，相反地美國卻只購進價值一億二千二百萬里爾的伊朗貨物。僅在1949年的頭九個月里就有八千二百四十噸以上的棉花從美國輸入伊朗，這一數目超過伊朗每年的消費量達三倍之多。結果是伊朗的幣值崩潰；1946年還是三十六里爾對換一元美金，而1953年8月一元美金的兌換率就標價為一百四十二里爾，現在則搖擺在九十五和九十八里爾之間。這種發展大大地繁榮了不正當的勾當，使正直的營業却凋零下去。僅僅1950年的一個月里登記破產手續的就有二百起。

從1948年夏季哈契米政府下台後，許多臨時政府都不想改變這種混亂的情況。作為英國或美國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他們自然不能消除混亂的原由，消除帝國主義對伊朗國家的壓迫和剝削。所以他們企圖用盡一切殘酷的手段來鎮壓成長着的群眾革命。因為對人民還保留着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反動的活動，所以在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僕從們方面就發出臭名遠揚的尋求“堅強人物”的口號。參謀長拉茲馬拉通過他肆無忌憚的對民主運動的處置，特別是通過1949年2月4日對伊朗國王的謀殺，就以這種堅

强人物的姿态出現。这一“謀杀”如我在前一章里已經講过的，給反对一切民主的力量，特别是給反对工会和人民党的苛虐暴政提供了借口。

虽然在二月事件，那就是說在謀杀伊朗国王和慘虐地对待劳动人民和他們的組織之后的几个月，伊朗有了“安宁和秩序”；虽然英国人在伊朗国内原来的統治者拉茲馬拉身上和首相沙埃特身上找到听命的助手，可是他們却始終不能一劳永逸地占有伊朗的石油。他們和沙埃特准备了一个条約；按照这一条約，伊朗政府可以由于开采石油多得一笔少得可怜的金錢，使它放弃修改石油特权的願望；虽然英国人情願把巴林群島讓給美国人，可是使美国人放弃他們要求的努力仍然不是白費；美国人要求至少获得伊朗石油工業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帝国主义間这种拉鋸式的斗争沒有給他們任何一方带来值得称道的利益。随着帝国主义間的斗争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謀杀。竞争着的一方想用政治謀杀来排除对方的势力，同时薩希迪將軍的名字在这些政治謀杀案方面愈来愈頻繁地出現。

所有这些謀杀行为和秘密陰謀导向一种經常的人事更迭，可是却不能根本上影响事件的进行，因为伊朗自由运动的一致觉悟起来的力量柑制着每一个新的傀儡。这种自由运动絕沒有由于人民党的被禁止和血腥的鎮压政策而削弱；在經濟危机的压力下，一直到現在站在一旁的人民階層也参加到自由运动中来了，統治者的殘暴恐怖政策把运动焊接为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并使自由运动充滿了团結精神。这种团結精神不讓竞争着的帝国主义任何一方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而自己却愈来愈新地显示出自己的优越。

下面一件事是朴实的伊朗人具有新觉悟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人民党党员告诉我的：一个汽车司机利用他的运输任务把非法的报纸“马尔多姆”带到南部非法活动着的党组织那里。他说：“我几乎有一年之久在德黑兰—设刺子—布希尔这条路线上驾驶，在许多城市的任何一家酒店里把报纸包交给党的通讯员。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客栈的老板作为小市民对运动还很疏远，所以必须不能给他觉察到什么。有一次党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犯了错误，我要作为联络员派去一个同志，而这位同志在这地区是以“左倾者”出名的，所以客栈老板揣度出我的任务。当我下一次又投宿在这一家客栈时，老板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态度，并且不引人注意地命令我立刻离开他的房子。我虽然还能在一个调车点完成我移交报纸的任务，但是我认为暂时不到这家客栈去是适合的。一年半后我又到这家客栈去，这一次没有带报纸。老板立刻认出了我。这一次他却友好地问候了我并对我耳语说如果我有报纸在身边的话，我应该非常小心才是，因为宪兵部队的特务暴行非常疯狂。今天这位老板是我的代理人；他从我那里取走了报纸，再把报纸交给党小组。”

在这种发展中反映出全体伊朗人民自从二月事件以来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于打破以前对英国统治者不可战胜的力量那种虚构的恐惧而促成的。英国统治者虽然施出一切手段和方法，仍然不能消灭人民党。虽然每一个政府都允诺在最短的时期内结束人民党的“叛国行为”和“怠工行为”，虽然每一个新的警察总监都宣称一定要驱散党组织，党却仍然在群众中坚持地继续她的宣传工作，党的报纸“马尔多姆报”和“战斗日报”^①（这份报是针对青年的）却更加

規則地繼續出版并且日益地在群众中取得更大的影响。

对人民党领导人所进行的公开而又虛假的控訴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这一控訴为的是在人民面前毀謗人民党和动摇人民党党员。十三个党的領袖在控訴中被判死刑，另一批則被判長年的有期徒刑。被判死刑的人中，有一个人根本不存在，他的“犯法行为”是由警察特务所捏造的，从这一事实中最有效地表现出处理手續的性質。这种控訴案是被告人变成了原告人。被告的人民党領袖中有耶斯地博士、加撒米和姚达博士，他們揭露了作为外国剝削者助手的伊朗統治階級，揭露了已被推翻的独裁者的反对国家民族利益的罪恶。这些罪恶在1933年的耻辱条約中达到了最高峰。他們証明了美帝国主义者想通过国王而英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拉茲馬拉將軍以威胁和諾言来使人民党改变它保衛祖国利益的唯一政策。他們又揭露了英国的石油貴族們的計劃，他們想利用一个新条約来实现当时被伊朗人民所駁斥了的1933年耻辱条約的条件。

被告者的英勇举动变成了一座照明的灯塔，使伊朗的群众充滿最激昂的斗争情緒，被告們驕傲的供詞为人人所傳誦。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們要求一个在控訴中当辯护人的教授對他們作一次关于控訴的講演；这一次講演就是称頌犯了“重大叛逆罪”的被告們的爱国主义的一首詩歌。国会在这种情勢下不敢批准上述在倫敦簽訂的条約，国会議員并在1949年7月27日的第十五次国民議会的最后會議上拒絕結束关于条約的辯論，把責任推到第十六次国民議会上。这样首先就是英国人不能实现他們的願望。

① “战斗日报”前身为“領袖报”(Rahbar)。——譯者

这一失败并没有使英国人气馁。国会的优柔寡断在石油问题的展期上表现出来，这使英国人更多地希望通过适当的布置暗中在第十六次国民议会中创造接受条约的更好前提，主要是使民主的组织不可能公开地参加选举，因为它们的每一个候选人马上就要被逮捕。虽然这样，选举运动却变成了一次巨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所以每一个候选人，首先是在德黑兰，被迫表示他对石油问题的态度，据说新的国会要把石油问题作为第一个和最重要的问题来决定。当然没有一个候选人敢于自己承认拥护这被各方面所非难的条约，但是他的拒绝的方式可以使伊朗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来判断他的诚实性。谁要假装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谁就要被群众当作“纳傅蒂”（石油代理人）而唾弃之。

一个在摩萨台博士领导下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小组在德黑兰组织了“民族阵线”，这一组织的目的当时只是阻止和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新条约。在一些真正的爱国者之外，也有一批野心家想借此来保证他们被选而参加的，此外，参加的还有一些企图在“民族阵线”的队伍中开展抵制和间谍活动的代理人。在这些代理人中也有萨希迪将军，他是被美国人选拔出来对付英国的代表拉兹马拉将军的。

1949年秋举行第十六次国民议会的选举，英国人对第十六次国民议会的批准他们的石油愿望以及与此排除美国竞争者和扼杀伊朗修改石油特权的愿望寄以很大的希望。伊朗人民的反抗阻止这些希望的实现，同时也破坏了美帝国主义者的活动。选举机器是操纵在反对党的手里，那就是说操纵在萨希迪将军手里，他们后来把他安置为德黑兰警察总监。因此，一个坚强的反英小组选入第十六次国民议会，在这个小组里有一批议员，他们不但反对英国的要

求，也反对美国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六次国民議會是在德黑兰議員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薩希迪的前任，德黑兰警察总监是亲英派，在选举时于夜間用亲英的选举票塞滿了选举箱，因此，以大多数德黑兰居民为后盾的反对党提出抗議，使德黑兰的选举被宣称無效。

在这些情况下，在国会里产生一种势力比例，使任何一方不能得到决定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者利用这种休会期間来加强他們的軍事和經濟地位。1949年11月中，伊朗国王去美国旅行，讓国会的活动到他回来为止一直停頓着；当他回国后，他讓国会的活动完全符合美国的目的。这次旅行的直接結果是1950年5月在华盛顿簽訂的耻辱条約，这一条約在根本上扩大了美国的軍事任务。美国代理人的間諜活动，特别是伸張在伊朗与苏联交界的边境区域上，在第四点計劃的伪装下进行的間諜活动得到了很大的擴張。

选举运动松弛了总參謀长拉茲馬拉用警察和軍隊的刺刀、所保持的“安宁和秩序”。由于認識到他的削弱了的地位，群众又重新进行活动，他們在“比苏·阿楊第报”^①中找到了一个有組織的力量。沙伊，北伊朗的紡織工厂的工人开了头。他們在1950年4月开始罢工，因为政府想减少他們的物价津貼，理由是工人們是通过他們那时还是合法的工会“榨取”了这笔津貼的。罢工在宪兵部队的排炮下而告失敗，但是工人們在罢工中所流的血不是白流的。沙伊工人們的英勇奋斗变成了进行斗争的信号，这一斗争随着要求伊朗石油的国有化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 比苏·阿楊第报 (Bessuje Aiandeh)：出版時間較长的人民党机关报。——譯者

在这同时，許多非法的組織找到了對他們的活動有利的合法形式。所以“反殖民統治斗争协会”变成所有伊朗爱国者的一个集合地点，他們的合法的政治活动由于人民党的被禁止曾經遭受到阻碍。“伊朗和平战士的团结”变成了伊朗从来所沒有的最坚强的群众运动，二百万以上的伊朗人在斯德哥尔摩和柏林的宣言上签了名。工会成功地組織了“劳动人民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合法的斗争組織。連青年工人和大学生也組織起来，成为伊朗自由斗争中的一股坚强的力量。

在这些組織的领导下，反帝运动取得一个輝煌的高漲。群众不再把他們的要求限制在修改英伊石油公司的石油特权上面，不再限制在要求拒絕同英国人签订的新条约上。他們現在要求無代价地把英伊石油公司的所有事業移交給伊朗，要求驅逐所有美国专家出境，要求取消一切外国的特权和优先权，要求民主自由。

英国人面对着这样的發展，把最后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拉茲馬拉將軍身上。他在1950年6月成为內閣首相。他的势力范围由于民族运动的力量和美帝国主义者的陰謀而受到限制，在国会里他表现为他的英国經理人的辯護士，并以这种身份举行从前伊朗首相曾經講过的最無耻的演講。他采用帝国主义的一些宣傳謊話并指出伊朗人民的無能，但是他却不因此感到慚愧。他还認為只有資本主义体系才能發展生产力和人民的福利事業。这种說法被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揭破是虛伪的。

他的演講在这时并不能鼓舞第十六次国民議會来接受違反人民意志的新条约。国会成立了一个以議員摩薩台博士为首的委员会，来研究石油問題并根据第十五次国民議

会关于修改英国特权的決議来提出建議。在这种情况下沒有人敢談起批准 1933 年的三十年条約，因为批准与否本来只是同英国人有关；在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1951 年 1 月 11 日，国会被迫最后拒絕了新条約草案。

在这样的失敗之后，拉茲馬拉自然下台了。由于他仍旧保持官职，所以大家疑惑他依照英国的委托仍然要計劃一下打击，来强迫接收英国的要求。实际上他是在計劃迫使在美国支配下的国王退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礼薩·汗一样，自己成为伊朗的独裁者并清除美国在伊朗的势力。美国人以殘酷的手段結束了这种独裁者的梦想，他們拿一把手槍交給一个宗教狂信徒結束了拉茲馬拉，从而增加了政治謀杀的数目，这些政治謀杀是从 1948 年开始的。伊朗人当时虽然对拉茲馬拉的計劃还不清楚，但对薩希迪参加謀杀事件来去掉他的竞争者却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如果薩希迪認為，現在对他和美国政策已經扫清了道路，那他就錯了。伊朗人民的民族陣綫的成长是超过反对党議員的“民族陣綫”的狹窄范围的，此外在“民族陣綫”内部反英亲美的势力在国会中还不够强大到足以实现美国的企圖，“民族陣綫”的議員們在他們的演講和要求里总是要随便講几句反对美国政策的話以掩飾自己。相反的，进步的組織不再仅要求石油工業国有化，他們还要求把巴林群島上的石油工業归还給伊朗，要求廢除一切在不平等原則上同美国簽訂的条約。这种对美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导致普遍民族运动的一个暫时的弱点。下面一件事就可說明，伊朗和平委员会中两个會員，“民族陣綫”的議員，离开和平委员会，表示抗議，因为他們不贊成和平委员会反对一切战争挑撥者（美国的战争挑撥者在內）的斗争，而期待

着从美国战争挑撥者方面得到对民族斗争的支援。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看得清楚，同美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来反对英帝国主义者，这只能使被压迫的伊朗群众陷于更深的苦难。

在这种条件下，有一个人于拉兹馬拉被謀杀之后取得了政权，他既能适合美国人又能适合英国人。这个人叫阿拉，他在英国长大的，娶了一个英国老婆，他也参与过 1933 年的耻辱条约。他作为駐华盛顿的长期伊朗公使对美国統治阶層保持着最好的关系，因此，他受英美两方面的束縛，他就企圖調和这两个帝国主义竞争者之間的矛盾和冲突。

阿拉的这种努力沒有遭受到对方的爱。英国人想起他們可靠的老方法，企圖从內外两方面来把犹豫的阿拉政府置于压力之下。他們散布謠言說，波斯灣沿岸各阿拉伯王侯企圖建立一个阿拉伯国，伊朗国内具有油田的苏塞斯坦省据說也包含在内。这种謠言大家早就已經知道，所以就不再能發生效果。因此英国政府不能不攤开王牌，外交部代理人对下議院宣称英国政府絕不想放弃他們在伊朗的利益，伊朗沒有权利宣布 1933 年的条约为無效。这一“条约”沒有任何法律基础，它只是由当时的財政大臣在独裁者的要求下签署的，財政大臣自己承認他在签署条约上只是扮演“行动的工具”而已。英国政府在 1951 年看到，除了依靠这一“条约”外沒有任何达到他們的目的可能，这一事实使朴实的伊朗人也看出英国已經破产，証明了英国在战争时期的諾言不是由于气量大而是由于軟弱無力。

英国人把武器分給伊朗国内的游牧民族，企圖使他們符合英国的目的。但是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的憎恨是那么强烈，美帝国主义者的破坏活动又是那么有效，以致連封建

的汗們也不敢为了帮助英国人而惹火焚身。因此英帝国主义者的最后压迫手段只有派遣战艦到高兰姆沙尔和阿巴且。英国人以这种示威来威胁說要用軍隊占領伊朗。这一威胁沒有产生它的效果，因为伊朗人知道这样的措施包含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而英国战争挑撥者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感到沒有准备好。

对所有这些直接或間接的威脅、恫吓和陰謀的回答是国会在拉茲馬拉被謀杀的三十天后即 1951 年 3 月 20 日在群众的压力下决定了石油工業国有化的法案。3 月 20 日是伊朗春节的前一天，伊朗人几千年以来一直把新年的那一天当作新春来庆祝的。这一天好像不止是一个新春，还像是开始了一个伊朗历史的新紀元。全体人民兴高采烈，每一个人認为这一法案是一个胜利，从中产生了新的希望，并决定現在要更坚持为爭取伊朗人民从奴役和封建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的斗争。反殖民統治斗争协会成为代表全体伊朗人民意志的發言人，号召所有伊朗人，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以及所有的組織来組成一个共同的陣綫。

可是“民族陣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随着伊朗石油工業国有化的決議已經获得了最后胜利，以为对英国活动形成均衡的美国的相对重量会使英帝国主义者放弃繼續維持他們在伊朗的地位的企圖。民主組織警告不要过高地估計帝国主义間的矛盾，并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对削弱他們的英国竞争者或許会感到兴趣，但对亚洲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是不感兴趣的；因为这种解放会威脅美帝国主义在整个近东的利益。当某一国民族运动發展到能够抵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的时候，他們会同英帝国主义者联結起来反对民族运动，或者至少讓英帝国主义者放手鎮压民族运动。这

种預測在伊朗石油工業国有化決議公布之后被証實了。人民党和其他的民主群众組織变得那么强大，給伊朗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种那样的渗透力量，以致不仅英帝国主义者感到，連美帝国主义者也感到他們的利益受到威脅。一家英国报纸曾惊恐地指出說人民党所起的影响比政府还大。

当英帝国主义者企图压制民族运动的鋒芒时，他們的确沒有遭到美国竞争者的反对。他們知道伊朗人民的自由斗争的旗手是工人，所以尽一切力量来压制有觉悟的工人階級的中心——伊斯法罕、阿巴且和其他的石油工業的重点，借此来給民族运动以一下决定性的打击。在通过国有化法案六天之后，英伊石油公司撤回百分之三十的住宅津貼，正当工人希望改善他們处境的时候，来借此有意地引起工人的憤怒。本得一馬苏尔的工人首先开始罢工。很快地，阿巴且，馬斯吉—苏萊曼和阿哈德雅里其他石油工業部門的所有工人也都参加罢工。阿拉政府对石油区宣布戒严，軍隊在阿巴且向大学生和工艺学校的学生开了槍。許多年青的爱国者被杀害。这种血腥惨杀使居民無比地憤怒，他們燒毀了英国俱乐部，打死了两个英国人。工人們把他們被杀害的兄弟們的尸体擲在肩上，在市內示威游行。

全体伊朗工人团体举行总罢工；他們要求判決凶手，接受本得一馬苏尔的工人的要求，履行学徒們的要求和偿付所有工人的罢工損失。在石油区罢工的工人超过五万名，精炼厂几年来第一次靜靜地躺在那兒。由于海軍拒絕再向群众射击，所以从两个邻近的省分里把軍隊派遣到苏塞斯坦省。妇女們躺臥在街上，遮断坦克的通路。在本得一馬苏尔也宣布戒严时，工人們轉移到城前，为的是在那里举行他們的聚会。他們受到軍隊的迫害，軍隊把工人們回城的

归途阻塞起来。工人们终日逗留在田野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全体居民给他们送来水和食物。英国飞机散发下伊朗政府和一些“民族阵线”的领袖的传单，传单里要求工人们停止罢工而继续去上工。工人们没有让自己给弄糊涂。支援罢工的活动组织起来了。捐集了四十五万多里尔来供罢工者的家庭使用。罢工是伊朗反帝斗争的一个表示，为一切居民阶层所支持。当整个罢工持续到一个月以上时，小商们贷给罢工者的家庭生活资料。在这同时，美帝国主义者一点都不让步，为的是不使伊朗群众的民主活动发生效果。相反地，他们却帮助英伊的统治阶级来血腥地镇压伊朗自由意志，在受美国监督的军队的排炮下，无数的工人流血死亡，光是一天他们就逮捕了七百多工人。英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在伊朗否认伊朗人民的权利，同时英美的石油大王们却在华盛顿举行在他们之间分配这种权利的谈判。如果罢工以罢工者完全胜利告结束的话，那末这决不是由于美国的援助，决不是的。伊朗人自己迫使释放所有被逮捕的工人，迫使赔偿罢工损失，继续住宅津贴。工会更进一步地追究军队的惨虐暴行的责任，这里就证实了整个政府机器是和英帝国主义者合作的。

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鼓励了全体伊朗人民的斗争决心，揭穿了“民族阵线”的诡计，迫使国会“石油委员会”遵照民意来工作。这个以摩萨台博士为主席的委员会是负责拟出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办法，政府也应受它的决议的拘束。委员会于1957年3月29日通过实施国有化法案的九项决定；阿拉没有决心来执行这九项决定，并由于反帝运动的力量使他丧胆，他就辞职了。他本来受英帝国主义者的委托想利用“工人联合委员会”所准备的五月节企图最后一次来窒

息、杀戮反帝运动，为了这个目的他还宣布德黑兰戒严。可是石油委员会的决议教导了他，使他懂得比较好的办法是把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不值得感谢的任务让给另一个人。

当哈契米(前面已经指出过，他是英国的代理人)，准备担任内阁首相的时候，“民族阵线”的成员荐举摩萨台任首相，由于害怕群众，所有议员一致同意摩萨台，其中还包括最反对他的敌人在内，因为群众威胁说一个在石油问题上冷淡的甚或亲英的首相会促使他们采取革命的活动。一个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每一个命令的首相上台，这是半世纪以来破天荒第一次。

反动派不仅把摩萨台看作“比较小的灾区”，他们在赞同民族资产阶级最果断的代表的时候也还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着想：

第一，他们认为摩萨台(除一部分是对外)，是破坏力量要大于建设力量。反动派完全信任他有能力去破坏，把陈旧的东西推翻和毁灭，但却不相信他有能力去建设什么和策划将来。他如因此只想把瓷器店接管一个时期的话，那末已经走错了路！摩萨台无疑地会打破那么多的瓷器的；当他们——“优秀的”反动份子——重新把事业掌握在手里的时候，他和公众最后会轻松一下。大地主和他们的发言人都认定摩萨台永远不能实现九项规定，他迟早要被迫下台，如果他在尝试实现他的政纲时没有陷入任何阴谋而变成了牺牲者的话。

第二，反动派以为由于政府委托给摩萨台，能够最好地分裂民族运动。他们估计摩萨台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也许能够适合群众的反帝活动，但却不能符合群众的社会要求。他会被迫去镇压劳动群众，所以会引起人民党、工会和农民

运动对他的仇恨，会因此脚踏两只船头，同时却证实他自己“不可能”同人民的民族要求和社会要求结合起来。

如果反动派的估计是错了的话，那么却不是由于摩萨台。事实上在他以前还没有哪一个内阁首相像他的政府所做的那样，如此残忍地反对民主组织。在他的政府下，民主组织被害和受伤的人数是最多的。但是，人民党和民主的群众组织能够依靠群众在最近几年内特别成长的政治觉悟坚持民族运动的统一。它们不使群众感到诧异，明确地在对外政策方面支持摩萨台，在对内政策方面给予最尖锐的批评。由于正确地估计了当时把伊朗人民从一切压迫者解放出来所必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这些组织从来没有宣传过要求摩萨台下台，即在1951年7月15日事件以后也没有过。同时人民党由于正确地估计了它作为整个进步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从来也没有企图孤立摩萨台周围的小资产阶级集团，无论什么时候，它的口号是团结所有反对殖民压迫的反帝力量成为共同的广泛的战线。

摩萨台于3月29日担任内阁首相，是以国王签署石油工业收为国有的法案为条件的。反动派这种打算对于国王1951年5月2日的签署是有决定影响的。摩萨台的第一个号召是对伊朗的工人所发的。可惜的是他并不是由于对工人阶级同情，而是对工人阶级恐惧而发这一号召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教导了他，使他知道工人阶级是除伊朗军队以外伊朗国内最坚强和组织最紧密的势力。五一那天有七十万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伊朗的各城市中举行示威游行，其中有的甚至是在宣布戒严的城市中举行的。五月群众大会证明，伊朗的工人阶级成功地几乎把全体人民、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许多大地主团结在

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周围。他们证实了工人们有决心不仅仅停留在要求石油工业国有化的问题上。他们还要求立即把工业移交给伊朗管辖，要求废止收为国有的法案中一项赔偿公司的规定。他们宣称，五十年最恶毒方式的剥削，英国海军部违法地参加英伊石油公司，投资到超出伊朗政府权力范围之外的女儿公司中的资本，耗费了几十万人生命的英国暴力统治，由于帝国主义剥削而产生的人民贫困——所有这些就是无赔偿地征收公司和把公司移交到伊朗人民的正当理由。摩萨台不能忽视伊朗劳动人民的这种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却是他以后所有步骤的支柱，给他抵抗英帝国主义者一切力量。英国于5月19日致伊朗政府一份备忘录，备忘录里面反驳了国有化的合法性，并建议同伊朗举行旨在缔结一个新条约的谈判。其目的在于动摇摩萨台去承认1933年的条约。在伊朗政府认为1933年的条约是无效的，准备付出到英伊石油公司特权的真正期限——到1960年的赔偿时，英国股东却想取得期数到1990年的赔偿，来弥补他们的“亏缺”。

在摩萨台执政的头三个月中(1951年5月至7月)，连续发生的一些事件是这样的迅速，我想把它们用年表录出，是有意义的。

4月29日——摩萨台接受首相职务，批准原定的5月群众大会。

5月2日——伊朗国王签署国有化法案，英国向伊朗提出抗议照会。

5月8日——人民党在给摩萨台的一封公开信中，建议成立全体爱国主义者的、广泛的人民阵线，以便实现国有化法案。

5月13日——摩薩台覺得他有生命危險，躲避在國會大廈里，並且宣稱，在沒有實現國有化法案的九點計劃之前，絕不離開國會大廈。

5月16日——美國公使格拉蒂，通過外交手法，建議摩薩台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倫敦方面透露消息說，英國政府準備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德黑蘭，就伊朗同英國之間的糾紛進行談判。

5月19日——英國在照會中，建議接受“兩個有關國家”之間的談判。英國調動第十六傘兵隊。華盛頓在德黑蘭同倫敦之間進行調停活動，建議使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

5月20日——英國“星期日電訊報”，違背事實地聲稱，蘇聯軍隊集結在伊朗邊境。

5月21日——伊朗政府在給美國公使格拉蒂的備忘錄中，抗議美國干涉伊朗內政。——伊朗財政部長要求美伊石油公司任命參加英伊石油公司財產檢查委員會的代表。——國會議員馬基在國會里報告說，美國外交部長干涉了伊朗的內政。

5月22日——德黑蘭舉行示威遊行，反對美國的干涉陰謀。

5月2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要求舉行英伊會議，解決石油爭端。

5月24日——馬基在伊朗國會中正式宣布，蘇聯軍隊在伊朗邊境集結的消息，是不符合事實的、毫無根據的。——英國共產黨抗議以武裝干涉威脅伊朗。

5月25日——摩薩台在記者招待會上，闡明他一定要執行國有化法案的決心。

5月26日——美國駐德黑蘭公使把美國政府的一份

照会交给伊朗政府，美国政府在照会中抗议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

5月29日——摩萨台，同美国公使格拉蒂和英国公使谢普哈，在德黑兰举行会谈。摩里逊在英国国会中宣称：“我们能够承认某一种形式的国有化。”

5月30日——由于散布荒谬的消息并因污蔑伊朗，路透社记者和“每日快报”记者被逐出德黑兰——摩萨台再次同格拉蒂和谢普哈举行会谈——德黑兰居民为反对任何妥协政策而举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决议中，要求1)立即没收英伊石油公司；2)拒绝任何违反伊朗民族利益的赔偿；3)把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的有效范围扩大到由美国资本家在巴林群岛上所控制的对象。

6月1日——杜鲁门给摩萨台一封公函。

6月2日——摩萨台在伊朗参议院中报导道，他拒绝英国公使提出的，关于修改国有化法案的建议。他宣称，他准备同英伊石油公司的代表举行谈判，但绝不与英国政府的代表举行谈判，在不同意杜鲁门来信中所表示的观点时又说，伊朗准备同英国政府，就石油问题举行谈判。

6月4日——英国第十六伞兵队开到塞浦路斯岛。——摩里逊在英国国会中宣布，英伊石油公司的代表将动身去德黑兰。——伊朗石油顾问哈西皮在德黑兰广播电台广播说：“谁认为我们决定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措施，仅仅是出于财政的原因，那他就错了……。我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

6月5日——伊朗司法大臣阿米尔·阿拉就任新职，任苏塞斯坦省省长。他受委托就地征用英伊石油公司。——伊朗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中，对巴林群岛酋长擅自缔结国际

條約的狂妄行為提出抗議。

6月6日——卡夏尼牧師就與蘇聯的關係而回答美國國際新聞社駐歐洲社長金斯萊·史密斯時說：“在石油爭端問題上，蘇聯沒有給我們任何阻難。英國人散布謠言說，蘇聯慫恿我們走這一步。這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們對蘇聯這種不干涉我國內政的政策，表示感謝。”

6月8日——石油檢查委員會委員，在伊朗工程師陪同下，到達石油工業中心阿瓦士。

6月12日——摩薩台公布他給杜魯門的回信。伊朗首相在回信中宣稱：“我們有別的選擇嗎？除了國有化之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呢？”

6月14日——以傑克遜為首的英伊石油公司代表團同伊朗政府在德黑蘭開始談判。伊朗財政大臣法拉斯太代表政府，要求英伊石油公司把自從4月20日，即宣布國有化法案那天以來的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移交給伊朗政府。

6月15日——德黑蘭舉行群眾大會，大會的口號是：“不進行違背國有化法原則的談判！”

6月19日——英伊石油公司的代表，拒絕立刻移交所要求的收入紅利。他們願意預付一千萬英鎊，以及願意在繼續談判的條件下，從七月份起，每月付款三百萬英鎊。

6月20日——摩薩台宣布談判破產。

6月21日——伊朗各大城市舉行大規模的群眾大會。示威群眾結隊游行到英伊石油公司營業處，扯下公司的招牌。——摩里遜在英國國會中宣稱：“我們準備在必要時抵抗敵人。我們一定要保護英國公民的生命。”——艾奇遜宣稱：“在伊朗發生的事件使我感到不安”。——新成立的“國營伊朗石油公司”，給英國籍經理德拉克發出營業指示。根

据指示，全部出口的石油必須立刻用新的伊朗石油公司的名义开列貨单。——摩薩台在德黑兰要求国会投信任票，并且获得了信任。

6月22日——英国人拒絕給伊朗公司开装载石油的收据。

6月23日——英伊石油公司代表团团长杰克逊宣布，“摩薩台掌握政权多久，石油問題就多久不能解决。”

6月26日——摩里逊在英国国会中宣布：“英国油船将空载地离开阿巴旦。”他威胁說，从阿巴旦武装撤退英国籍职员。——“毛里求斯”号巡洋艦在阿巴旦市外的夏脫·埃爾·阿拉勃河抛錨。——英国中东司令罗伯逊將軍到达巴斯拉。——国营伊朗石油公司英籍經理德拉克秘密地离开阿巴旦到达巴斯拉。——摩薩台号召外国专家为新的伊朗公司服务。——四位美国石油公司的代表到达阿巴旦，受到伊朗政府的欢迎。

6月27日——一位伊朗国会議員兼石油委员会委員，在論及杰克逊6月23日的談話时宣称：“伊朗人知道，他們除了失去枷鎖之外再沒有別的……伊朗民族将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人。伊朗民族知道，今天沒有經濟上的独立就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誰認為推翻摩薩台就有可能剝削我們的石油，那他就大錯而特錯了。只有刺刀才能逼迫伊朗人民緘默。”

6月27日——艾奇逊提出要求：“伊朗必須使自己的态度受新的考驗。”

6月28日——摩薩台請杜魯門調停伊英糾紛。

6月29日——摩薩台同美国公使格拉蒂举行会談，就国际銀行准許借給伊朗二千五百万美元貸款問題进行談

判。——華盛頓方面公布說，十八個美國石油公司已經表示願意把石油供給大西洋國家，如果英伊石油公司不能履行其供給石油的任務。——德黑蘭的群眾抗議摩薩台向杜魯門乞憐，並且要求繼續執行國有化法案。

6月30日——在巴林群島上舉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大會上，對六個犧牲者舉行哀悼。

7月1日——英伊石油公司英籍經理塞登的住宅遭到搜查。很奇怪的是在這裡只發現有株連伊朗政治家的文件。伊朗政府保留在“適當的時候”把它們發表的權利。

7月2日——德拉克參加英國內閣特別會議。

7月6日——海牙法庭不顧人民波蘭和埃及的反對，作出決定，要求伊朗恢復5月1日即國有化法案執行前夕的原來的法權狀態。伊朗政府宣布不受這項決定的約束。

7月9日——德黑蘭居民舉行大規模的群眾大會，抗議海牙法庭的決定。

7月10日——杜魯門在答复摩薩台的請求時，建議派哈里曼去德黑蘭。他要求伊朗考慮海牙法庭的決定。摩薩台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關於這一點，現在已經太晚了。”

7月12日——摩薩台宣布，他準備會見哈里曼。

7月13日——一位石油委員會委員在阿巴旦說：“如果哈里曼先生所想的會談是阻撓國有化法案的執行的會談，那末，他就錯了。”

7月15日——哈里曼抵德黑蘭。為了在美國人面前顯示自己的權力，證明他是唯一的、能夠在伊朗防止“布尔什維主義”的伊朗政治家，摩薩台下令警察向徒手空拳的示威群眾開槍。

7月16日——當群眾重新出現在街頭，並且要求政府

归还他們的兒女的尸首的时候，哈里曼被摩薩台和伊朗国王接見。

7月17日——哈里曼在否認关于他即将起程离开伊朗的消息时說：“只要有必要，我就留下来。”

7月20日——哈里曼同伊朗国王举行第二次会談，会談延續了两个小时。

7月21日——傳說哈里曼提出了新建議。据說按照这个建議要成立一个专门銷售伊朗石油的英美伊公司。

7月24日——伊朗內閣批准哈里曼的建議，哈里曼把這項決議通知倫敦方面。摩薩台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宣布准备同英国政府代表談判。

在这个日历一覽表里，記載着一个幻想——資產階級的幻想的破灭。他們想在帝国主义时代里同帝国主义建立同盟的基础上来取得民族自由，因此把劳动人民群眾排挤在这个自由斗争外面。許多伊朗民族主义者不願意承認，伊朗人民爭取石油工業国有化的斗争、不仅是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石油貴族，而且也是反对美国石油托拉斯和反对世界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像这些民族主义者一样，摩薩台把美国政府也看作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于对帝国主义的性質的錯誤認識，对劳动人民創造性的力量的过低估价和对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惧怕，摩薩台認為可以不要伊朗人民的参加，就能使石油問題得到有利于伊朗的解决。階級覺悟的局限性使他决定以工人和农民的生命来买到美国人的恩惠，这样也就出卖了他自己的階級的希望。

在1933年“条約”簽訂十八周年这一天，八万伊朗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抗議美帝国主义者干涉石油問題，要求取消

伊朗把石油首先出賣給資本主義國家的義務——就在1951年5月29日這一天，摩薩台同美國公使就貸款問題進行談判，華盛頓方面對海牙決議的不公正的支持，沒有一次能夠使摩薩台放棄在華盛頓會有一個反對英帝國主義的無私的同盟者的幻想。他的階級立場使他看不見現實。要是華盛頓方面真的重視中立這個角色，而不想做“可笑的第三者”的話，那末它一定早就唾棄海牙決議，因為國際法庭就其章程來說，只有權利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爭執問題，而沒有權利處理一個國家同私人或者法人之間的爭執問題。在這個由美國政府造成的懸而未決的案件中，爭執的一方面是主權的伊朗國家，而按照聯合國憲章，它有權把自己的工業國有化，爭執的另一方面是一家私人公司。伊朗政府認為英國政府是與此事無關的，因此英國政府沒有任何權利把自己看作這件爭端的當事人。雖然如此，海牙法庭還是受理這個案件，並且作出決定：兩國不許採取措施，阻止國有化以前的繼續的正常生產。哈里曼在華盛頓支持海牙宣判的基礎上來參予這件案件，這就已經意味談判的不利，並且使伊朗的地位在倫敦方面的狂妄態度面前惡化了。

摩薩台不願意認識這個事實，伊朗人民群眾就越明白這個事實。7月15日，他們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反對以哈里曼為代表的美國大資本家干涉伊朗石油問題，抗議哈里曼企圖為國際銀行，也就是為了美國壟斷資本打开通向伊朗的道路。

有幾十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一直是保持着極端良好的秩序。由於群眾嚴格遵守紀律，法西斯匪徒在國會大廈前的毫無意義的搗亂行動，遭到了失敗。可是警察和軍隊突然從預先布置好的地方，向遊行群眾開槍。幾十個婦女、老

人和青年，躺在馬路上的血污中。但是，示威的群众并没有被吓退。工人和大学生迫使用坦克向人群进逼的軍警向后撤退，并且还在警察的槍声中，宣讀了其重点为我們大家所熟悉的決議。第一个發言人被射中倒下去。一个年青的演員立刻拿起帶有血迹的決議書，繼續讀下去，直到他也被射中倒下去。第三个人把決議讀完了。在国会前的廣場上，虽然有人企圖在夜里把血漬清洗掉。但是人們在第二天仍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血迹的地方。政府隱瞞了数以百計的死伤者的数目字，并且为了掩盖他們的滔天罪惡，把死亡的和重伤的人迅速地埋葬在公墓里。

保守派報紙“控訴報”，（其总編輯后来隶属于薩希迪政府）对这一意外事件作了下面的描写：“如果現在来断定这件事，即誰是对昨天流血事件負有真正責任的人，还太早的話，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示威游行的人都具有極良好的紀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示威游行的人，在警察的槍击之下，为了繼續向前走，退到国会廣場上。当示威游行的人們知道警察将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撓示威游行的时候，他們就决定在通向廣場的街道上示威游行。这时，人們就变成在書本里讀到的意外事件的見証人。一个正在宣讀決議的游行被槍射中倒下去。第二个人立刻登上临时講台代替他。这个人就是著名演員卡謝。不久，他也被槍打中，在扩音机前倒下去，但是，他用最后一口气的力量，把決議書遞給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在被击中倒下去之前，終於把決議宣讀完畢。”这家報紙繼續写道，当坦克向人群冲过去的时候，游行队伍中的妇女們露出她們的乳房迎着坦克走去，大声高呼：“我們用这些乳房养大他們。別开枪打我們的孩子，別开枪打你們的兄弟姐妹！”

伊朗人民反对出卖他们权利的英勇反抗，使民族独立运动达到新的高潮，最后终于使摩萨台政府中断它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同英国政府代表已经开始了的谈判。伊朗人民站在团结一致的反帝阵线上，抗拒英国谈判代表的无理的要求。反帝阵线不仅仅坚持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还要求从伊朗领海上撤退英国舰队，收回巴林群岛，废除同美国签订的一切战争条约，解除美国军事顾问，以及拒绝参加美国战争挑拨者所拼凑的，目的在于发动第三次大战的军事集团。保障伊朗民族的自由的要求，是同保障民主权利的要求，首先是出版、言论、集会的自由和罢工的权利，以及保障工人和农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要求密切地联系着的。

1951年10月，摩萨台政府中断它同英帝国主义的代
表的一切谈判。政府宣布所有的英籍石油专家的居留签证无效；他们必须离开伊朗，并且把管理权已经掌握在伊朗人手里的石油工业移交给它的合法的主人。英国人自以为时间是为他们服务的信念，欺骗了他们。他们想拖延谈判的企图一无所成，因此，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加强经济和政治压力。

早在双方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英国油船就拒绝装载由新成立的国营伊朗石油公司接收过去的产品。伊朗存在英国银行的存款现在也被冻结，这实际上是等于宣布封锁伊朗的贸易。由于美国政府的干涉，就连几艘意大利的和日本的船只也碰到了困难，这些船只只是得到几个美国石油大王的默许，企图从伊朗运出几千吨石油的。虽然日本和意大利的法庭接受了有关的船主的上诉，宣布没收是无理的侵犯，但是英美两国政府还是没收了他们的石油。在被

剝奪了任何銷售的可能性和缺乏容納新開采的石油的蓄貯設備的情況下，過不多久，伊朗石油工業就被迫停止生產。伊朗政府財政收入的虧缺，使已經很緊張的國家財政情況更加惡化，特別是在政府還必須繼續發放工資給五萬多名由於封鎖而閑着的工人的時期。伊朗的經濟情況一天天惡化，但是，英國人以為事情的發展將早晚迫使人民和政府投降的期望並沒有實現。眾目共睹的是停泊在阿巴旦市外的英國軍艦的大炮，也沒有吓退伊朗人民；因此，英帝國主義者在談判破裂之後於1951年10月把聯合國機構操縱在自己手裡。他們在美國的支持下，把伊朗石油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上。在這裡，蘇聯再一次地証明了它是各國人民的權利和聯合國宗旨的堅定的保衛者。它成功地指出，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是伊朗人民的內部事務，所以安全理事會沒有權力處理這個問題。英國人企圖利用聯合國機構來重新占有伊朗石油的陰謀，因此遭到了失敗。

他們利用世界輿論，向伊朗展開了大規模的攻勢，這種努力也沒有得到更好的結果。為了回擊這種進攻，伊朗政府發表了在舊英伊石油公司宣傳中心所發現的文件以及國家檔案處的材料，嚴正地指出英國干涉了伊朗的內政，指出英國通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賄賂了伊朗統治階級的成員。雖然摩薩台政府還遠遠沒有公布它所知道的全部材料，甚至還保留那些對接近政府的政治人物和美國代理人不利的文件，但是美帝國主義者在這方面已經吃了虧。

摩薩台和他的“民族陣綫”沒有能夠看到潛伏在伊朗人民群眾中的巨大力量，認為只有美國的“經濟援助”才能解決伊朗的問題，因此把自己的政策，甚至自己本人的興廢存亡都交給了美帝國主義者。正當他想要把美國代理人變成執

行他自己的政策的工具的时候，他自己却已經变成了美国的陰謀的執行者。美国駐德黑兰公使宣称，如果伊朗政府能够保証国内安定，美国政府准备給伊朗提供經濟“援助”；摩薩台毫不迟疑地开始按照美帝国主义的意願去完成这个条件；把越来越疏远民主力量，破坏示威游行，逮捕工人和大学生，禁止出版民主报纸，甚至采取最殘暴的手段去鎮压在各阶層人民中享有相当高的威信的和平运动，使政治局势尖銳化。

人民党和工会組織之所以仍然支持摩薩台，只是因为他們想防止民族运动分裂，因为在这种紧要关头之下，分裂将会給英美帝国主义者带来对伊朗人民的完全胜利。所以他們在国内鎮压政策方面坚决地反对摩薩台，但是，在反对英国压迫者的民族斗争中，却完全支持他；他們不断地力圖說服“民族陣綫”的最有权力和最有名望的代表人物摩薩台，使他認識到，反对英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只有在被理解为反对所有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进行时，这个斗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伊朗民主力量的这种責任感是一种資本。可是摩薩台却輕意地消耗了这种資本。对他來說，进步运动就好像一塊磚碼一样，为了在这个或者那个战斗中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放在自己的狭窄的目的的天平盘里。他認為一定要給美国人証明，只有他能够借他对英国的極端敌視，去抵制伊朗的民主运动，所以，他制造了街头的射击事件，用牺牲者的血証明他的权力。相反地，当他想反对美帝国主义者过高的要求的时候，他就自己組織示威游行，为的是表示他沒有能力答应这些要求。

这种政策迟早一定要遭到完全的失敗。民主力量，首

先是反对殖民統治斗争协会，一再誠懇地給摩薩台指出这一点。它們又建議摩薩台和所謂“第三种力量”的拥护者們組織普遍的反对帝国主义陣綫，共同協商它的綱領。但是，这个建議也是徒勞無益的。摩薩台对英美之間的竞争的錯誤估計，使他把一切忠告都当作耳边風。他以为自己会变戏法，其实他是坐在两把椅子之間，把伊朗人民从英帝国主义者手中夺回来的絕大部分东西交到美帝国主义者手里。

美帝国主义者首先从摩薩台的幻想中得到了好处。他的錯誤的投机，給美帝的第四点計劃，創造了开展特务活动的广闊的活动园地。他們在“援助”的外衣的掩盖之下，到处建立固定的基地，資助反动报刊，指揮法西斯匪帮。这些法西斯匪帮后来在一次暴动中，推翻了摩薩台政府。第四点計劃变成極端反动分子的巢穴。薩希迪將軍的兒子是这个計劃的最重要的成員。宮庭督察长是1933年英伊“条約”的一个接生助手，而他的女兒是第四点計劃的一个倡导者，她負責在英国代理人同伊朗国王之間建立联系的工作。在第四点計劃的领导下，所有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完成了划一的工作，他們用法西斯的手段分裂摩薩台政府，最后又用暴力把它推翻。1951年12月5日，1952年3月28日和7月21日以及1953年8月16日至19日的流血事件，标志着英美帝国主义和伊朗反动派联合行动的各个阶段。

民主組織的代表团一再地給摩薩台指出，有怎样的危險正在威胁着国家。反对殖民統治斗争协会的几位杰出的战士在1952年3月28日大屠杀之后，同摩薩台的談話，是富有啓發性的。这一天，伊朗民主青年为了結束反对殖民主义統治斗争周，号召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当青年示威游

行者在斗争周闭幕会游行完结之后，准备回到他们的俱乐部的时候，一队警察命令他们解散，示威游行执行了这个命令。可是大部份人还是到俱乐部去参加原先定好的纪念会。一小时之后，武装警察在那里出现，毫无理由地袭击在场的青年，屠杀了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当一个代表团向摩萨台报告屠杀的经过的时候，他很愤怒，对代表团大声地喊道：

“对，这与我又有有什么关系？我并没有屠杀他们！”

“开枪的警察是您的警察。”

“不是，他们不是我的警察！”

“您是首相，因此，您对这件血案是负有责任的。”

“不对，军队和警察并不在我的管辖之下；他们接受另一个机关的命令。”

这番谈话暴露了摩萨台的矛盾，他因为错误地估计美国在英伊冲突中的作用而陷入这个矛盾中。他没有看见美帝国主义的作用，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消除美帝国主义者对国家武装力量的影响；他们通过伊朗国王，利用这种武装工具去反对民族运动，因此也就是对英帝国主义者的公开支持。但是摩萨台对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伊朗人民时，其利益上的共同点是仍然没有认识的，而仅仅认为这是伊朗国王的叛卖行为。这时，伊朗国王在美国代理人的完全同意之下，为了英国，也就是为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已经行动起来。摩萨台跟伊朗国王之间的冲突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冲突在1952年7月21日事件中达到了白热化，而萨希迪在1953年8月19日爆发的政变，使摩萨台遭到彻底失败。

帝国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并不能削弱伊朗的自由运动，

相反，反动派害死了几千条生命的血腥暴行，只能增长人民的反抗意志，只能加强人民党和統一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影响，它們当时对民族力量和国际势力的估計，以及在斗争的各个阶段所提出的口号，都証明是正确的。

它們最重要的功績在于使伊朗人民觉悟到必須把他們自己的自由斗争，同各国人民的自由斗争結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就認識到他們的剝削制度和压迫制度，在爭取自主权的附屬国家的人民及其本国人民的打击之下，是搖搖欲墜的，因此，他們渴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妄想战争中最后征服各国人民。如果說人民党和統一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建立了工农联盟之后，把伊朗人民爭取社会解放的斗争提高到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更高阶段的話，那末，他們現在又把把这个斗争引导到維持世界和平的新的斗争阶段。

把伊朗民族运动同世界和平运动結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伊朗的广泛的社会阶層都認為只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够使伊朗人民从帝国主义的枷鎖之下解放出来。甚至在进步的組織中也出現过这种思想，他們所持的理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并且使許多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此，他們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使各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鎖下，最后解放出来。由于始終一貫的宣傳，伊朗的和平运动使伊朗人民确信这种思想是錯誤的。伊朗的和平战士，指出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給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并且告訴伊朗人民，新的世界大战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在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能依附帝国主义列强間的矛盾，而應該把爭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同目前最强大的运

动，即世界和平运动结合起来。

伊朗和平运动的号召的声音，人们并不是没有听见。伊朗在上世纪所产生的伟大诗人马勒库许—许阿拉—巴哈尔，就是那些全力为世界和平服务的第一批伊朗爱国者中的一个，他用自己的语言的全部力量和他整个名望，终身献给了和平运动。许多有威望的人物，如前首相、大商人、议员、诗人、艺术家和将军，都在号召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上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签订五大国和约的柏林号召书上签了名。摩萨台在接受首相职务之前不久也签了自己的名字。1950年8月，十万多名伊朗人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了名，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十叶派的杰出的领袖夏勒斯坦尼主教，他在公告中号召他的信徒参加和平运动。卡夏尼神父表示赞同柏林宣言，为他所代表的信徒们作了榜样，这一事实的意义也是非同小可的。1951年6月，仅在德黑兰就有一百七十多名工程师、一百五十多名编辑、二百二十六名医生、一百七十名法官，包括总检察官在内、一百二十一名律师和五十四名艺术家声明赞同和平运动。

在伊朗的特殊情况下，动员群众的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必须考虑到，有百分之九十的居民不会读也不会写，而他们大部份人都住在农村里，因此，宣传工作大都不得不依靠口述来进行，同时，人烟稀疏的各个居民区之间的距离相隔很远，而又缺乏联系。虽然如此，人们为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宣言，征集了二百多万个签名，这都应归功于伊朗青年，首先应归功于青年工人和大学生们，他们不知疲劳地，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耐心地向农民讲解维护和平对他们具有何等的重要意义，上两次大战给人

类带来了多么重的灾难，新的世界大战将会带来何种苦难，使用原子彈和氫彈会带来什么結果，誰想發动战争，以及每一个人对防止这次战争能够做些什么事。我已經談到伊朗青年在农村中的动員力量，这种努力的代价在某一个和平战士为了它而付出生命时被估計得更高了。在德黑兰，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卖和平报的十六岁的男孩被打死了，他仅仅是法西斯凶手的無数牺牲品之一，我們認識凶手們的直接主使人，因为我們知道，特别是許多和平战士都是在巴博尔市在伊朗国王經常同他的姐妹庆祝放蕩的宴飲的伊朗北部被屠杀。从拉茲馬拉首相的談話中，我們也可以認識那些罪魁，当人們請求拉茲馬拉首相在柏林宣言上签名的时候，他說道：“如果我签名的話，英国同美国的大使一定会立刻逼我辞职。一俟我不再担任首相的职务时，我就一定在宣言上签名。”

伊朗的和平运动正在进行着一場非常有效果的、维护和平的斗争，也就是一场争取伊朗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这我們可以从“美国之音”自1951年以来一再地反对伊朗和平运动的煽动中看出。但是，帝国主义者并没有能够击潰和平运动；帝国主义者反对和平战士的煽动和挑衅，給劳动人民进一步地証明了反对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斗争的正确性和繼續这场斗争的必要性。

1952年的第十七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由于人民党和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被禁止进行活动，所以他們不能在这次选举中提出候选人。但是，反对殖民統治斗争协会以及其他合法的农民与工人組織和进步的党派在德黑兰組成了一个民族联盟竞选委员会。它提出了許多的候选人，大部份候选人是上述的协会以及和平运

动中的杰出成员。他们的竞选斗争是在一个纲领的指导下进行的，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重述这个纲领的全文，因为它是任何一个多多少少注意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的政府的最低纲领。

“1. 为维护伊朗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而斗争；消除任何帝国主义的影响，通过巩固伊朗人民在石油工业国有化斗争中的胜利来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伊朗的基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解雇在军队、宪兵部队和政府机关中的美国顾问；禁止英国的伊朗中东银行和其他类似的帝国主义机构（如第四点计划代表处）的活动。

2. 通过保持伊朗的中立政策和拒绝参加战争挑拨者的一切侵略集团来巩固世界和平；颁布反对一切煽动战争的法律；支持签订五大国和平协定的运动，支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以及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8.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和审核劳动立法和社会立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废除一切损害工会合法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和条例；实行普遍的八小时工作制；立刻执行减租措施，以及公布地主同农民之间在公平的基础上建立关系的法律；把国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通过农业银行给穷苦农民发放政府贷款；修建灌溉系统，疏治河流，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和取消政府官员的侵犯和干涉；禁止输入本国能生产的货物；禁止输入奢侈品；扩大工业银行给手工业者和企业家的援助；审核税法；通过票据交换来增加对外贸易，通过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来扩大对内贸易；在同外国竞争中保护民族工业，通过对工商业的援助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审核关税和扩张贸易；降低间接税和实

行进步的所得税制度。

4. 实行全国义务教育；把兵役期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降低选举年龄；取消一切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的法律和条例；反对独裁和专制主义，解散特别法庭和限制军事法庭对军人所犯的罪行的管辖权；取消损害法官的独立的法律；实行地方自治法；反对损害伊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外国贷款；保证各党派、工会和其他民主组织的政治自由。

5. 审核国家财政的分配比例，为改善保健事业、教育事业以及扩大建筑事业筹备足够的资金。

6. 批准保护母亲和小孩的权利的法律，以及保护国民健康的法律；禁止城乡中的童工。

7. 审核选举法和划分全国选区；根据宪法第二条的规定和人权宣言，保证城乡所有的公民的平等权利；改善国家公务人员的物质状况；把腐化分子从各个政府机关中清洗出去，公布聘请公务人员的法律原则。”

第十七届国会选举是美国式的“自由选举”，因而民族联盟竞选委员会几乎不可能为它的候选人宣传，而反动派在国家“保安机关”保护之下对民主组织施行毫无顾忌的暴政。虽然如此，民族联盟在德黑兰还是获得了大部份选票，约三万个选民投票选举民族联盟竞选委员会的候选人。按照欧洲的标准，这个数字好像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伊朗有这样的议员，他们被选为国会议员的选票还从来没有达到三千张的时候，这就是令人惊讶的数字。虽然摩萨台在德黑兰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选举流弊来取得对民族联盟候选人的优势，从而保证了他的“选举胜利”，但是这在外省却行不通。在民族联盟的每一竞选宣传遭到阻碍的地方，敌视摩萨台的统治阶级也利用相似的办法，保证它的代

表的选举。为了不让更多的反对他的政策的敌手进入国会，摩萨台不得不决定“暂时”中断这种太过“自由”的选举。

在这个由不完整的选举里产生出来的国会中，摩萨台看到一个对立的阵线。想推翻他的政权的意志在这条阵线方面不仅把一切反动派的直接代表联合起来，而且也把摩萨台当时的一部分拥护者联合起来了。因此，摩萨台的“民族阵线”的候选人在国会主席选举中未能战胜统治阶级的竞选人。而国会主席按照伊朗宪法的规定，具有相当大的权力，首先是在任命首相这点上。摩萨台思想上所依靠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反对伊朗的经济压迫之下，失去了继续追求自己的民族要求的勇气，竭力同帝国主义妥协，而摩萨台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帝国主义者企图孤立摩萨台，利用他们在军队和警察中的司令官的地位，对劳动人民群众的民族阵线施行血腥暴行，使他们唾弃摩萨台。摩萨台的阶级思想的偏见给帝国主义者提供了保证，他们知道他一定害怕同人民群众建立真正的同盟。

1952年7月下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伊朗的走狗们，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完全孤立摩萨台的目的。国会在选举过程中，遭到了严厉的责难。1952年7月18日，摩萨台在他的敌手交错的火力攻击之下被迫辞职，他的敌手很机灵地把他们对摩萨台的政策批评都集中在许多不容争辩的缺点上面。新的首相候选人的任命工作一般地是这样进行的：国会举行会议，各个小组提出他们的候选人，最后把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推荐给伊朗国王。由于人民党在伊朗被禁止之后，伊朗国内没有一个团结在一个固定的政纲的周围的国会党团，所以首相候选人就必须需要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用公开贿赂的方法取得多数票。未来的首相

必須通过各种各样的諾言来买到必要的选票；这一个議員坚持要求一个部长的职位，那一个議員坚持要求为他的兒子或者其他的寵兒找一个职位，第三个議員坚持要求一張进出口批准書或者其他的特权。如果我们想知道以后發生的事件，以及产生 1953 年 8 月 19 日的政变的特殊空气的話，那末我們必須知道这个过程。

早在 7 月 18 日，国民議會召开座談会討論任命摩薩台的繼任者的問題，拥护摩薩台的議員沒有参加这次會議。“民族陣綫”的代表召集片面會談，只要进行任命首相工作的国会大会不具有正式的性質，同时也沒有記錄文件，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反动的議員完全在私下，提出剛从欧洲回来的、臭名远揚的加瓦埃斯·薩丹乃出任新首相，在欧洲时，他已經为他的候选資格，用他全部特有的狡猾奸巧，作好了一切准备。在巴黎的时候，在他同一位人民党中央委員的閑談中，他甚至企圖获得遭受禁止的人民党的支持，但当別人指出他过去的叛变行为时，他遭到公然的擯斥。在德黑兰，他也竭力通过他認為跟人民党有連系的人士来同党的領導取得联系，但是，他沒有得到任何反应。7 月 20 日，伊朗国王批准他出任新首相。他在他的政府声明中毫不迟疑地表示說，他認為他的任务在于無情地鎮压民族运动的一切企圖，为此，“民族陣綫”的議員們，号召人民进行抗議斗争，但在同时，他們規劝人民保持平靜和秩序。面对这种情况，人民党、工会和反对殖民統治斗争协会，都看出了反对派正在进行一个大規模的陰謀活动，相反人民党等团体号召人民走向街头；自从人民党負起領導伊朗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工作以来，工人們及其同盟者第一次知道，不仅要自衛，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轉为进攻。在此后

的几天中，在反动派要发动政变时，统治阶级以布设好的坦克和机关枪，向民主力量提出警告。伊朗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1952年血腥的7月21日这一天。不仅在德黑兰，甚至在全国范围之内，燃烧着熾烈的愤怒之火；它比所有的坦克和机关枪还要猛烈；全副武装的军队同赤手空拳的群众、工人、大学生、小职员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不相称的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军队撤退了。薩丹乃辞职了，而“民族陣綫”的議員們又从他們安身的防空洞里走出来，装扮成胜利者，騙取真正胜利者的、即人民的胜利果实——权力，他們說，只要群众能安静的恢复工作，他們就答应实现人民的一切要求！摩薩台再度掌握政权——这是以几百个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而这些牺牲者的确切数字至今尚未公布。

第二天，摩薩台邀請反殖民統治斗争协会主席团到他家里，悬請主席团的委員們回去劝告人民群众恢复平静和秩序。一位主席团委員趁机問摩薩台道：“首相先生，在您的官邸前面站崗的是軍官。您的衛兵們就是在昨天向您的拥护者和我們开槍的人，就是在昨天謀杀了祖国最优秀的兒女的人。您信任这些人嗎？”不，他不信任这些人，但也不信任街头的群众。他只信任自己的外交技巧和帝国主义之間的冲突。群众对他來說只是一塊砧碼。

摩薩台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他利用人民的革命情緒，为自己爭到了赋予他各种权力的代理全权，他掌握这个权力只有六个月。在他之前，在伊朗还从未有任何一个首相或者統治者，曾經获得这种权力。他的法令不必經過国会投票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他除了享有(礼薩)国王違反宪法的規定而取得的其他权力之外，还掌握了任命国防部长的权力，因此，他想利用这一点来夺取国家武装力量的权力，其

实他已經在伊朗掌握無限的权力,也正是这样,他同国王之間的緊張关系,發展为公开的冲突。

現在,他的階級意識的狹隘性,非常显著地表現出来。他沒有認識到解放伊朗人民的条件在于消灭封建階級的統治,而認為加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为資產階級無限制的發展开辟道路,是解放伊朗人民的条件,因此,虽然要取消帝国主义的影响,但也要鎮压劳动人民的自由斗争。他沒有認識这种思想的矛盾,这就使他和無數的伊朗爱国者遭到厄运。

摩薩台在掌握了無限制的权力以后,并没有用它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即反对伊朗的統治階級,而是用它来反对人民群众,这就使統治階級能够去破坏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即反对其支柱的善意的計劃。仅从1952年7月以来,有二千多名爱国者被逮捕,十几名和平战士被杀害,几百名正直的伊朗人被流放。正当7月21日的大屠杀事件的罪魁們平平安安地坐在他們的宮殿里的时候,几个盲目服从上級命令的小軍官被逮捕了。摩薩台的这些措施都是指在迷惑群众,但是,当群众不願意再受騙,要求消除貧困的根源,同时看出他的行动是一种煽动群众的手段的时候,他便使用从群众的斗争中夺取来的政权来反对群众,这就使得反动派有机会来积蓄力量并把他推翻。对群众的害怕,也就促使摩薩台走上对国家起極大破坏作用的第二步。他害怕触犯統治階級的特权,因此也不可能在群众面前指出这种特权給国家經濟發展带来的致命的后果;虽然群众已經亲身尝够了这种恶果,但是,他还想通过对幣值的操縱,来掩盖国家財政上的恶劣状况。根据“知識报”1954年7月17日的消息,他在一年中印發了三十几亿里尔新鈔,

这样就使得在他組成政府时已很严重的通貨膨脹更加恶化了。这些措施的结果,使1953年8月的生活資料指数(假定1936年为一百的话)上升为九七一,房屋升到一一七四,电灯和暖气升到四四二,衣服升到六九四,全部生活費用升到九七四。在这同一时期中,生活費用上升将近十倍,而工資只增加两三倍。对集大权于一手的摩薩台來說,增發鈔票是合法的,而操縱幣值却使他把武器放到敌人的手中,而当他對濫發鈔票保守秘密的时候,他这样做也許是因为对美国的“援助”,或者对美国“援助者”的忠告的信任,因此这种武器也就变得更危險了。

摩薩台企圖在自己的目的受到限制和受資產階級束縛的情況下,粉碎帝国主义者越来越多的陰謀,就他的步驟來說是不缺少某种技巧的,而它們都被敌人击败了,因为他们知道在棋盘上摆的是什么棋子,除摩薩台有無限制的执政权力,敌人还保留有决定性的潜在权力:大地主的經濟力量,大部分高級軍官同他們有裙带关系,国王宮庭以及同外国帝国主义代理人,特别是与美国壟断資本的代理人的众多的个人和事务上的联系。摩薩台打算說服国王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不想讓人民攆走国王。1953年3月初,伊朗国王确实按照摩薩台的“善言劝告”,准备“暂时”出国,但在他动身前几分鐘,由于大地主、軍人集团和反动神父的政治活动,他終于拒絕出国。摩薩台的計劃失败了,在由軍人集团組織起来的法西斯匪徒們的迫害下,他只好躲避到国会里去,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敢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对付聚集在薩希迪將軍周圍的反动派,如果他已經擺脫了自己的階級偏見而和伊朗的劳动群众联合起来的话,那末,他就会那样做了。

摩薩台长期的徘徊和动摇不定，使帝国主义者能利用国王宫廷、軍人集团和帝国主义在国会中代理人的活动，实现了他們用非法手段所达不到的推翻摩薩台的計劃，通过政变推翻了伊朗的合法政府。从1952年7月至1953年8月，一再地發生陰謀活动，薩希迪將軍在各种情况之下都参加了，因为与这些陰謀活动有关，薩希迪暂时被扣押起来，但是，由于他的广泛联系，这种联系一直伸到与摩薩台直接接触的人中去，可是直到1953年8月，当这个叛徒最后达到政变的目的前，他还是逍遙于法外的。

規模越来越强的反对国王的群众大会，象征着民族群众运动的尖銳化，他們都知道，国王就是封建势力中最頑强的敌人，也就是帝国主义者活动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保护者。民族运动的加强，已經使资产階級感到害怕，而他們在“民族陣綫”中的代表們，正在等待适当时机，好从火車里走下来，这火車的終点站将不再由他們决定，而将由劳动群众来决定。摩薩台的部长們也有同样的感触，这使他陷于孤立，如果他現在已經与人民建立了真誠的联盟，他的孤立就能变成他的力量了。同时，他又把人民群众放在他的狹隘的目标的秤盘上，1953年7月，在人民的支持下，他解散了国会，在这个国会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居优势、而这个国会实际上是沒有工作能力的。

虽然农民沒有机会参加民意測驗，对群众作宣傳工作的時間又太少，但是，还有二百多万名伊朗人，支持摩薩台的行动，这种行动給統治階級敲起了警鐘，他們将失去对事情發展的任何影响，因为他們的議員被排斥出去了，使那些怀有同样恐惧心里的资产階級最后脫离了摩薩台。资产階級的忠实的代表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或許也預料到

资产阶级的民族目标同社会目标之間，还存在着矛盾，因此宣告退却。以镇压一切民主組織的“民族障綫”，夺取了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它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之下，放下武器，把障地交给反动派。

反动派毫不犹豫，在8月初就开始发动推翻摩薩台的新政变。经过与外国的代理人、美国特务及其顧問們深入商討后，国王首先到拉姆沙尔、里海南岸的一处痒养地，把他的叛乱总部从那里迁移到他在克拉尔达西特市的城堡里，从这里，国王的随身衛队队长那西里上校，同美国駐德黑兰大使館和隱藏在一个美国軍事顧問家里的薩希迪將軍取得直接联系。叛乱的准备工作，到8月18日，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国王在那西里的陪同下，又回到了德黑兰，政变規定在8月15日、星期六，在国王的衛队和駐在德黑兰的其他各个軍团的参加下，从这里开始。但是，一些民主团体在8月14日，揭露了这个計划，使叛乱者不得不把他們的計划延迟一天。到8月16日夜間，那西里上校把国王的一道諭令轉交给摩薩台，勒令他辞职。这道諭令是違反宪法的，根据宪法的規定，国王沒有权力命令首相退职。摩薩台命令逮捕那西里上校，政变也因为失去技术领导而告失敗。国王在当天夜里逃到克拉尔达西特再从那里乘坐其私人飞机到巴格达。

群众举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庆祝他們从帝国主义者的最强大的联络官手里解放出来，并且搗毁国王礼薩·巴列維的紀念碑。8月18日，民主力量举行了大規模的群众大会，表达了人民对摩薩台政府繼續执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而提出下列要求：

1. 解雇所有美国軍事顧問，把他們从伊朗驅逐出去；

2. 在全国范围内解散第四点计划组织；
3. 废除同美国签订的一切政治的和军事的协定；
4. 放逐所有美国的代理人；
5. 把所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从国家的重要机关中清洗出去，并且在法律上控诉他们。

摩萨台对群众的热情又感到毫无办法，他对群众的害怕心里和想利用美国帝国主义者作他的活动的同盟者的企图，使他决定在必要时，用暴力解散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精神的群众大会。反动派借助这个决定，照旧开始了他们的反攻，反动派控制了保安机关的一切重要的职位，还掌握了一个自愿听候指使的重要的工具、德黑兰警察总长、萨希迪亲密的合作人。警察和军队开始逮捕几百名爱国者，支持由反动派纠集的法西斯武装匪徒，并且说这些匪徒的暴行是以一种有组织的发动为借口，在8月19日占领了国家的全部重要机关。当国家广播电台短时间的沉默之后，在下午两点钟左右，由美国军事顾问指挥的军队，占领了广播电台大楼，这个广播电台在很危急的期间，丝毫也未提到政变的事，下午六点钟左右，保卫摩萨台官邸的，忠于政府的兵士实施抵抗；这三四百名兵士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他们对宪法的忠诚，但后来他们被击败了。萨希迪宣布自己是伊朗首相。当时在罗马的伊朗国王，举行记者招待会，招待各国新闻代表，并且批准萨希迪出任首相。作为美国国务院喇叭筒的美国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在1953年8月28日这一期杂志中，在叙述了这次事件之外，还证实了美国为了保卫帝国主义的利益也是这次叛国阴谋的同谋者；它写道：

“受美国训练的伊朗军队和国家警察，乘坐美国制造的卡车，开进德黑兰。军人用谢尔曼坦克和美国武器，赶走了

穆罕默德·摩薩台首相，夺取了政权。”

使薩希迪及其集团能够夺取政权的君主法西斯武装政变，是华盛顿“实力政策”的产物，实力政策在于镇压各国的民族运动，占领它们的原料产地，以及最后煽动一次反对和平阵营的新战争。1953年7月，艾森豪威尔宣称，为了消除威胁着美帝国主义者，在伊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原料掠夺的危险，美国将竭尽全力，来阻止亚洲和中东各国解放斗争的扩大。1953年8月19日，杜勒斯清清楚楚地把1953年8月19日伊朗事件称为同美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军官的军事政变，大家知道，美国“牯牛”将军许瓦次考夫，是这次政变的技术顾问，从8月18日至22日，第四点计划组织的办事处，变成叛乱者的参谋部，美国驻伊朗公使汉德逊在政变中发挥了他的作用；在政变的第一阶段的开初遭到失败时，他很明智地离开了伊朗，而当政变出了岔子的时候，他又急急忙忙赶回德黑兰，再度协助把已断线的叛乱的线网接好，在国王颁布“罢免”摩薩台的谕令之前，他就知道薩希迪将军将被任命为摩薩台的继任者。薩希迪集团有义务执行三个重要的任务，这个集团，可以不顧伊朗的民族利益和人权而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完成这些任务，这就是：

1. 镇压伊朗的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2. 把伊朗的石油交给英美帝国主义者，作为出卖伊朗民族利益的保证；
3. 把同苏联有二千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的伊朗变为反对苏联和民主国家的战争根据地。

我们将在最后一章里看到，薩希迪集团对帝国主义唆使人交给他的任务的完全情况，我们也将看到，伊朗人民的自由斗争在继续发展着，并且具有胜利的保证。

結 束 語

我已經在前面几章里，向讀者介紹了伊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伊朗同盟者——統治階級的自由斗争，这斗争五十年来一直是伊朗历史中占統治地位的一部分。我想，我已經給讀者指出过，在这半个世紀里，几乎所有的伊朗政府，都是这个或者那个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机构，忠誠地为統治階級服务，用欺騙和暴力来迫害和鎮压伊朗人民群众的自由意志，只有作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摩薩台政府，在他同政府所代表的階級的目标相一致的时候才多多少少表达了这种自由意志，但是，由于階級的局限性，至少客观事实上是这样的，它終于把伊朗人民的民族利益奉獻給了帝国主义。卑鄙和狡猾、胆怯和殘酷——这就是伊朗差不多所有的統治者的基本特点，这些人在前面几章里我們都已經提到过了。但是还没有一个把伊朗的民族利益廉價地出賣給帝国主义剝削者的人，像以伊朗国王和他的“首相”薩希迪为代表的，目前还把国家放在他們的皮鞭之下的集团那样的卑鄙和狡猾、胆怯和殘酷。代表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劊子手們由于害怕伊朗人民而互相勾結起来了，他們得到害怕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英美帝国主义份子的支持总算遵照帝国主义份子交給他們的最重要的托咐把伊朗人民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有組織的呼声抑制下去。但是，一再响起来的个别的呐喊和用来窒息这呐喊的、令人难于想像的殘酷手段証明伊朗人民的自由意志并没有被扑灭，而是在地下翻騰着，总有一天，自由的劊子手們会在熾烈的火

焰中毀灭。

按照伊朗国王的私人命令所制造的暴行，比起希特勒时代世界上所周知的野兽般的残酷，只有过之而無不及。德黑兰第二坦克师团的营房变成了正规的拷打所。在夜里，被逮捕的爱国份子被拉到这里来；为了从他们口里逼出污蔑人民党和苏联的口供。他们剥夺了拘禁者的食物和睡眠，鞭打他们，从他们的指甲下面插进木针，然后用火点燃木针，他们把开水灌进他们的肛门，或者把一枚还很烫的煮硬了的鸡蛋，塞进他们的肛门，人们刮下受害者的肉，然后在伤口地方撒上盐，或者为了取乐而对一个被拘禁的爱国者进行法西斯主义的流氓式的侮辱，他们剃掉一个被拘禁的爱国者在右边的眉毛和在左边的鬍子，然后拉他去游街。到了后来他们逐渐采用这种办法：他们把被打死的受害者的血衣寄给爱国青年的父母亲，为的是使受惊的父母亲阻止他们的儿女再去参加政治活动。美国还提供了新的刑具，最使受刑者感到极大痛苦的是特制的钢盔。我想在这里从许许多多的罪行中举几个例子，受害者是工人、教员、医生、职员、新闻工作者、大学生和农民。

二十岁的运输工人法尔坦在监牢里被打死了。他们曾经用点燃的纸烟在他的皮肤上烧成各种图画，把秤锤缚在他的睾丸上。他的尸体被抛到卡拉杰河里，八天之后才被發現。

住在德黑兰的二十二岁的哲学系学生穆罕默德·尤許塔里在被捕之后被打死了。劊子手对他的父母亲說：“尤許塔里在前几个星期就被釋放了。”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的中指被审判官打断了，因为这个青年拒絕在陷害人民党的文件上签名。

恐怖得难以想像的司法机构与恐怖得难以想像的警察机构携手合作。警察机构的恐怖可怕得連薩希迪这样的坏蛋也不得不跟他們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所謂公审，在公审中贪污的法官把这个制度的政治敌人判处苦役监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法官当中进行了一次所謂“整頓”；因侵吞公款、贪污、吸毒和同性恋爱而被撤职的墮落法官，又恢复了工作，并且被派到省里去做法官，在那里，只要他們能殘酷地对付执政者的政治敌人，他們就可以为非作恶，滿足自己的犯罪的嗜好。这一点他們做到了。他們判处主張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新聞記者十年徒刑。参加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伊朗青年代表团团长阿甫卡里也被判处同样的徒刑，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团长卡朗戴里被判处三年徒刑。檢察官建議把伊朗和平委员会总書記瑪姆特·霍尔莫次判处死刑。

伊朗的执政者步納粹法西斯的后塵，1953年8月政变之后重演了“焚燒国会案”，有三个青年水手被判死刑，他們的罪名是受人民党的委托，放火焚燒“巴尔”号軍艦。水手阿努謝拒絕在槍毙的时候把他的眼睛包扎起来，他成了伊朗人民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和他們的伊朗劊子手們的象征。

1953年11月18日德黑兰衛戍司令部的軍队在首都的商業区搗毀了五十家商店，因为这些商人贊成摩薩台和反对迫害摩薩台。

1953年12月6日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課，抗議同英国恢复外交关系，軍队和警察冲进大学，开枪打死了三个大学生。

1954年3月12日夜里起至13日为止勒什特地方的監獄守警開槍襲擊赤手空拳的政治犯，五個囚犯被打死，還有不少人被打傷。年青的愛國者愛達姆杜斯特在死前說道：“我們的人民一定會勝利！”二十一歲的工人穆罕默德·秦奇在受了致命傷之後還用最後的、枯竭的力量高呼：“人民黨萬歲，打倒賣國國王！”勒什特地方的警察局長知道了自己的機關所犯下的罪行之後，在第二天自殺了，這種行為也許能證明他個人還有正義感，而且他再也不必害怕政府的懲罰，或者輿論的譴責了；自從薩希迪集團奪取了政權以來，全國所有的報紙和雜誌，都處在警察和總參謀部的秘密處的最嚴格的管制之下。只有那些不知羞恥地為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作辯護的報紙，才能幸免，但是，就連他們也遭到檢查的壓迫。

薩希迪集團為了滿足帝國主義的要求，在完成了第一個任務：鎮壓伊朗的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之後，在1954年3月，開始舉行“自由選舉”，組織國會來保證第二個任務的完成：把伊朗的石油交給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者。為了更穩當起見，執政者不僅把進步民主力量，如：反對殖民統治協會、工會和人民黨，從選舉中排斥出去，而且也把反對他們的一切資產階級力量排斥出去。在選舉前，許多自由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傑出代表、摩薩台政府的成員、商人、知識分子和以前的議員都被逮捕了。伊朗議會副主席拉沙維被捕下獄，因為他不願意放棄在職時所擁護的原則。摩薩台政府的外交大臣法特米躲藏了八個多月，終於在1954年3月被捕，為了要殺死他，他們對他策劃了一次襲擊；從警察局解到軍事監牢去的時候，他被人用刀刺傷了好幾處地方，這些傷口一直到他死的時候還使他感到痛

苦。后来他被判处死刑，人們必須把他放在担架上抬到刑台上去。甚至是反对摩薩台的人也被他們排斥在外面，因為他們从薩希迪政府的法西斯方法中，也看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危机。巴格海博士，薩希迪以前的合作人，在他的故乡基尔曼进行竞选的时候被捕了而且还被驅逐出境。

1954年8月5日在这种“平靜”的气氛中發表了在幕后預先策划的“解决”英伊石油冲突的公报，公报規定伊朗的石油将交給一个由世界上八个最大的石油康采恩組成的国际企業公会，其中有五个是美国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得克薩斯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此外还有英伊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法国石油公司。国王和他的“政府首脑”薩希迪，違反根据宪法通过的石油工業国有化法律，把伊朗石油工業的經營权又交給了英国和美国殖民統治者，而且“代表伊朗”放弃出售石油所得的收入百分之六十，根据国有化法的規定，伊朗的石油工業，必須由伊朗人单独經營，出售石油所得的全部收入以及开采得到的产品被宣布为伊朗不可变卖的權利。声名狼藉的前美国总統的兒子赫勃特·胡佛作为美国外交部的委托人，或者作为美国石油康采恩的代理人，在“調停”英伊石油爭論时建立了功績，这种功績在培代尔·史密斯辞职之后，得到了适当的酬报，胡佛被任命为美国副外交部长。伊朗国王为了美国壟断資本的利益所建立的功績至少也是一样大的，然而他只得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封賀电，他必須知足一点兒，賀电写得非常露骨，迫使国王在1954年8月8日的回电中，吱唔其辞地宣称，这个协定是“在目前国际形势下解决石油冲突的最好方法。”

其实,在8月底签字的协定,是一个侮辱性的条约,它只能强加在被束缚起来的人民的头上。这个协定规定成立两个联合公司,一个是石油开采联合公司,一个是石油加工联合公司,它们在伊朗政府同意之后开始生产,但是,公司的领导权却落到了帝国主义企业公会手里,因为在每个公司的理事会里,企业公会有五个代表,而伊朗政府只有两个代表。国营伊朗石油公司不成其为一个生产和出售的机构,而它的名字成了一个嘲讽,变成这两个公司的辅助机构,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处理环境卫生、马路和房屋建筑等问题。这两个公司决定伊朗石油的生产量和销售市场,英国和美国康采恩占有企业公会百分之八十的股票,因此在事实上这两个公司的代表支配着一切。由于禁止把石油产品销售给不受帝国主义势力影响的国家和为了避免“威胁”世界价格,必须垄断地节制伊朗石油生产;1950年伊朗生产了三千二百万吨石油,而根据协定的规定,在头三年中只许生产原油六千八百万吨,而炼油厂的产量在同一时期里最多只许三千万吨。为了逃避伊朗国家对它的业务活动的任何监督,他们宣布这两家公司是荷兰的企业,这一条附带条款卑鄙得连伊朗政府在正式宣言中不敢加以承认,而故意含糊其词地宣布说:“这两家公司是在伊朗注册登记的。管理机构的地址和活动地点将在伊朗,但是,它们是按照荷兰的法律组织起来的。”这个条约因此赋给国际企业公会广泛的治外法权,条约的有限期为二十五年,以后还可以再延长十五年,再加上已经过去的二十年1933年签订的“条约”的效力将延续六十年之久。虽然1933年的欺騙性条约实际上得到了实现,然而在条约上说英伊石油公司“放弃了”1933年订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利”,为此伊朗必须在十年之内

付給英伊石油公司二千五百万英鎊作为損失賠償。宣言估計伊朗在條約生效后的头三年中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万五千万英鎊，但是並沒有提及企業公会的可能盈利。相反，它規定用英鎊支付給伊朗，迫使伊朗把它的絕大部分的收入消耗在英鎊集团的国家里。

因此，这个條約表明自己是1933年條約的再版，其唯一的区别，是美国帝国主义者为了有利于英国壟断資本家出头干涉，参加分贓。美国豢养的伊朗报纸，硬說这个协定是符合伊朗的国有化法，与这种破綻百出的陰謀剛剛相反，伊朗人民三年来流血牺牲、忍飢耐寒所换来的权利，都被騙走了，使他們重新处在受帝国主义者救济的地位，而帝国主义者却用伊朗人民的財富养肥自己。外国同伊朗人民的国内敌人之間所訂立的协定，最后将和强加在伊朗人民头上的1933年訂的“條約”遭到同样命运，它一定会被伊朗劳动群众所粉碎。在伊朗的爱国者的心目中，这个协定不过是一张廢紙而已，总有一天，它会被抛进垃圾箱里。为了伊朗石油国有化法伊朗人民群众付出了巨量的血和肉，現在，他們不能無抵抗地放弃它。这一点殖民統治者是知道的；因此，正如人民党地下机关报“馬尔多姆”报导的那样，那些殖民地統治者急于要求得到“保証”，保証协定的条款不被人民破坏。

根据保証的义务，薩希迪集团在9月初，为了批准这个石油协定，准备了一次新的瘋狂的屠杀恐怖。为了压制伊朗人民群众对出卖国家利益的憤怒，为了恐吓国会，美国的走狗薩希迪，在国会討論石油“條約”的日子里，逮捕了六百多名軍官、宪兵軍官和警察，以及成千名公民，有二十四名被捕的軍官被“判刑”和槍毙，他还判处前外交部长法特米死

刑，判处前国会副主席拉沙維和前石油委员会主席無期徒刑。在史無前例的恐怖气氛中，在充滿了处决的命令的礼炮声中和被杀害者的呐喊声中，众議院在1954年10月21日“批准”把伊朗石油交給薩希迪的帝国主义买主。10月28日，参議院也“批准”这个协定，在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有几个参議員，如勒沙尼参議員，他們有勇气指出新的石油协定比起英伊石油公司剝削伊朗的条約还要糟糕。参議員第汪培基說：“国际企業公会将开采和提炼石油，而伊朗只能管理工厂的食堂。”政府将死心塌地为国际企業公会服务，而它的活动范围占去伊朗全部国土的一半和一些最肥沃的地区。因此，政府断送了伊朗的主权。

同这个叛卖行为相連系的还有帝国主义者向国王和他的同謀者薩希迪建議的为了执行第三項义务而实行的措施——使伊朗变成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战争根基地。根据这个方針，薩希迪政府同意参加由美国拉攏起来的土耳其—巴基斯坦公約組織，根据这个方針，美国軍事人員和美国特务机关在伊朗进行了瘋狂的活动。由陆軍、空軍或者海軍高級軍官率領的美国軍事代表团，几乎每个星期都來訪問伊朗，并且同有关部門进行秘密談判。仅仅在最近几个月中，美国地中海艦队司令，美国中东司令和美国武装部队机密处处长，在有关的“专家”的陪同下先后訪問了伊朗，并且參觀了港口，飞机場和伊朗武装部队。6月20日，美国空軍副总参謀长研究了伊朗飞机場的情况，7月8日，威廉·道格拉斯又一次在伊朗出現，他已經完成了扮演一个美国律师的角色的特殊任务，7月22日，美国軍事援外委员会主席，視察了伊朗全部軍火倉庫。自从美国外交部伊朗科科长訪問了伊朗，并且使伊朗参加土巴軍事

协定得到保证之后，这种活动大大地频繁起来了，伊朗被美国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包括重型坦克和飞机在内的洪流所淹没了。在法尔斯、伊斯法罕、库姆、麦什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在美国军官的监督之下，正在修建大型的飞机场。哈马丹市是一个缺乏最简陋的文化和卫生设备的地方，但是，为了修建一个军用飞机场就拨款五百四十万里尔。

这一切活动、建设和计划，都同伊朗军队没有丝毫关系，而只是表达了美国战争挑拨者反对和平阵营的战争计划而已。因此，在伊朗的美国特务最近的活动主要也都集中在伊苏边界上的北部省份。在结束了建立贝列维—阿斯塔拉公路边的军事基地的准备工作之后，人们已经计划在阿塞拜疆省建立新的基地，计划以不断扩大伊朗军队来增强防御力量，因此，大半以上的伊朗国家预算，都用在军队、警察和宪兵的身上。根据利用拿美国武器的外国军队来为美国的利益而扩战的原则，伊朗青年必须为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去流血牺牲。

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知道，伊朗人民是在竭尽全力反对他们的阴险的计划的；甚至伊朗的大资产阶级也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维持中立，以免在一次大规模的民族屠杀中，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只有一小撮受雇于帝国主义者的人，才谈论着伊朗应该参加帝国主义军事集团。面对着伊朗人民的普遍反抗，美国特务企图用威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在几个月以前，他们在世界舆论中，散布这样的消息，说：“美国已经把伊朗的某些地区，如阿塞拜疆、俾路支以及波斯湾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种暗示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土耳其一直就企图吞并伊朗最富裕的阿塞拜疆省，而巴基斯坦也很想占有伊朗的俾路支省。

艾森豪威尔答应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支持巴基斯坦对伊朗领土的要求的消息大大加强了上述的报导的威胁性。

就是我們把这些消息仅仅看做是謠言，那末隱藏在其后面的目的还是很清楚的，他們企圖在伊朗人民当中引起一种不安全的感覺，同时把伊朗参加帝国主义集团体系的論据交給帝国主义的伊朗走狗。不久，真的有一个伊朗議員，公开地为伊朗参加美国的中东战争集团作辯护，大談其西方列强对伊朗的友誼，可是国会并没有对他这种無耻的言行表示抗議。在參議院中，这些計劃也找到了它的支持者——參議員埃馬米，他是一个臭名远揚的英国的代言人，他說，現在人們可以談論战争挑撥者的有組織的征战了，原因就在于在战争的情况下，不言而喻，伊朗将是一个重要的戰場，但是伊朗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衛自己的利益，因此，一定要参加美国集团。这就是說，在現在就做好使伊朗参加美国拼湊的軍事集团的准备工作是恰当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伊朗走狗們不可能不知道，由美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軍事計劃不仅威胁着和平和世界安全，而且也違反1927年10月簽訂的伊苏条約。1954年7月8日的苏联备忘录至少为使他們注意这一事实，备忘录此外还強調指出：“美国駐伊朗大使韓德逊先生同伊朗首相薩希迪先生最近在德黑兰举行会談的特別消息引起了苏联政府的注意。在会談过程中，据說伊朗方面作了关于伊朗将参加美国在中近东的軍事行动的保証。

苏联政府就这一点，請伊朗政府注意伊朗对1927年10月1日簽訂的苏伊中立条約所承担的义务。根据这个条約，条約簽訂国有义务，無論是事实上或者形式上，不参加

旨在反对另一条约签订国的领土和领海的安全，反对另一国的完整、独立和主权的政治同盟和条约。（条约第三条）

伊朗政府关于伊朗有权同其它的邻国签订地区性的条约的答复，证明萨希迪政府不愿意使他的帝国主义主子失望。

像伊朗人民对待其他有关伊朗民族的问题一样，伊朗人民一定要说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句话！他们的代表不是伊朗国王和萨希迪，也不是那些从农民的贫困中渔利的众议员，参议员和部长，不是那些通过贿赂、走私和盗窃而发财的买办。伊朗人民是千百万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他们受苦和战斗，他们从干旱的土地里栽培出果实，开发大地的宝藏，在阴暗潮湿的茅屋里编织彩色缤纷的地毯，他们创造了价值，可是别人霸占了他们的财富。伊朗人民几千年以来创造了无数奇妙的艺术珍品，他们是古波斯之首都的创造者、伊斯法汗伊斯兰教堂的建筑者，是设刺子的金首饰的制造者，是耶斯特、卡汉和基尔曼等地的地毯的编织者、他们是伊斯法罕的细致的彩画家、尼夏步尔和土斯的诗人；他们是曾经抵抗过成吉思汗和秦默让的英雄，也将是抗拒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英雄。伊朗人民在他们的五千多年历史中，常常被迫保持沉默，但是，他们不会永远使自己保持沉默。不论战争挑拨者的计划订得如何周到，伊朗人民是这些计划的反面因素。在人类的伟大斗争中，他们站在和平与自由的一边，伊朗人民知道如何去战斗，他们最憎恨的敌人伊朗国王1953年8月16日那天在人民的怒潮面前被迫逃亡国外的时候，他一定体会到了这一点。在那时伊朗人民的斗争果实被窃了。但是，他们一定不会再一次受骗！